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工程惠安女：大躍進時期惠安女身體的

規訓與解放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Liberation of Hui'an Women's
Bodies in Great Leap Forward

張和強

He-Qiang Zhang

指導教授：張聖琳 博士

Advisor: Sheng-Lin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工程惠安女：大躍進時期惠安女身體的
規訓與解放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Liberation of Hui'an Women's Bodies
in Great Leap For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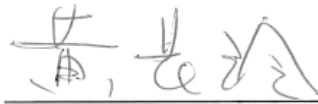
本論文係 張和強 君（學號：R04544029）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聖琳（指導教授）



黃長玲



畢恆達



所

長：



誌謝



又到了人生的一個階段，充滿了歡笑與汗水，也充滿了感恩。

兩年拿到城鄉所碩士學位，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也是我最大的驕傲。在台灣生活，不同的社會氛圍加強了我的辯證思維，讓我能夠重新思考原本在大陸習以為常的存在環境。在城鄉所學習，認識到了眾多厲害又熱情的師長與同學，讓我增長了見識，體認到了社會的多元異質。論文的撰寫，讓我重新去理解構成我身體的組成部分，不斷地與自己對話，重構了自己。

能夠跨越海峽兩岸完成這本論文的撰寫，一路上得到了眾多貴人與師友的鼓勵、支持與照顧。最重要的莫過於我的恩師——張聖琳老師，讓我成為她最快畢業的碩士班學生。在論文指導上，老師的循循善誘，給了我巨大的啟發，讓我能夠以不同的視角切入去看待問題，將研究瓶頸個個擊破。在實務操作上，老師的兩岸視野與兩岸合作，讓我在實踐中思考兩岸的差異，尋找可以相互借鑑的經驗。「任性衝、恣意瘋」，在生活上，老師像一個朋友，和我們一起歡笑，一起灑汗。老師是個良師也是個益友，帶領著我們走過研究生涯。

感謝黃長玲教授、畢恆達教授願意撥冗擔任口試委員，並在論文撰寫過程中給予鉅細靡遺的建議與指導，成為論文提升與自我反思的養分。感謝洪伯邑老師，在我田野遇到瓶頸時鼓勵我，給予我建議，讓田野能夠持續往前。

感謝同門博士學長振廷，在不同的時空下與我一同寫作，相互勉勵。感謝博士班的王瑤學姐、瑞真學姐，不厭其煩地，幫我修改論文，給予眾多論文建議，讓論文不至於有太多錯漏。感謝 305-4 研究室的幼涵、惟文，在論文撰寫過程中給予我許多生活上的關心和細心的提醒，使得我能夠安心地進行論文撰寫。特別感謝所辦的淑貴、秀妹、燦群默默地為大家服務。

感謝惠女水庫管理局工管股的駱明熙科長、惠女水庫壩區管理站站長以及其他工作人員，提供了眾多官方資料，並在訪談中給予我珍貴的經驗和建議。感謝吳延、楊亞嘗、張荷省、吳荷美、張淑美、蘇姜、艾亞抱、陳金梅、王荷棗、張份、吳亞花等阿婆，是她們的身體，生育了惠安人，建造了水庫哺育了惠安人，也是她們的身體，促成了這本論文的生產。

感謝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支持我、照顧我、包容我，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到台灣學習。要特別感謝我的妹妹，在田野工作上給我的巨大幫助。

感恩台灣，感恩台大，感恩城鄉所。感恩所有支持我、陪伴我、鼓勵我的人，願幸福安康。

2017.08 張和強於台大圖書館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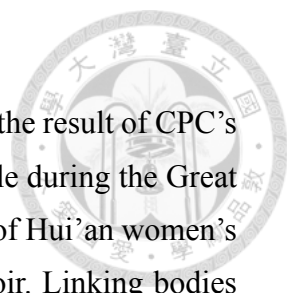
「工程惠安女」的形象塑造，是大躍進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控制的雙重結果，創造了以婦女為勞動主體的大型水庫建設歷史。將身體與工程連結，實質上是將身體與工程背後的許多結構力量——國家政治、地方社會、家庭習俗——相連結。因此，本研究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選擇水庫工程的微觀空間尺度，通過口述歷史資料，呈現婦女與國家的互動關係，探討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本研究以身體作為研究切入點，將身體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為權力控制和對抗的對象。

研究發現：首先，惠安女成為水庫工程建設主力軍，是國家「婦女半邊天」的政治環境以及惠安「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男工女耕」的社會性別分工傳統多重疊加作用的結果。其次，在規訓的層次，國家權力通過動員、競賽、強制的規訓方式，將婦女身體轉化為可調配的公共勞動資源，進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婦女身體的領導權」。然而，這個過程中女性男性化、階級化的婦女解放模式忽略了生理性別的差異，導致了婦女飢餓、斷經、傷亡的身體現實。最後，回到解放的層次，惠安婦女身上表現出來的「強制之壓抑」與「自願之喜悅」的疊加，即強制性規訓導致的反抗與自願的規訓轉化的交錯，是這場運動中「工程惠安女」身體解放的雙重張力。

一個帶著生產性與意識形態的「工程惠安女」身體，在工程場域的權力行使中浮現。國家關切的是「工程」的「婦女」特性，以此來完成惠安婦女身體的國家符號轉換——全國婦女解放代表。然而，這個國家整合婦女、規訓婦女的過程背後，隱匿的是「婦女」的「工程」特性，婦女身體差異被忽略，在工程中被過度使用，是這場身體悲劇的真正來源。身體與思想塑造、身份地位改變、生命傳承干擾，工程在惠安婦女身體烙上痕跡，成為「工程鐫刻」。

關鍵詞：大躍進 惠安女 國家與婦女 身體的規訓與解放 工程鐫刻

ABSTRACT



The image of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was formed as the result of CPC’s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on the peopl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ehind such image building process was the history of Hui’an women’s participation as the major lab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ig reservoir. Linking bodies with construction, in fact, is linking bodies with the structural forces represented b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national politics,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conventions. Therefore, based on oral historical data, this research, choosing a micro space size, i.e. the reservoir projec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to demonstrat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women and state, and discuss the discipline and liberation of Hui’an women’s bodies. Adopting “bod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research rediscovers the meaning of bodies, which was originally overlooked, to show that bodies are also the subject of power control and power confrontation.

It is discovered, firstly, that Hui’an women became the major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rvoir, was the outcome of various influences combined together, for example,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publicized the belief “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 (quoted from Mao Zedong, meaning that women are as capable as men in building the country); of the natural reality of Hui’an - nine years out of ten, this place has drought; and of the traditional “men to work while women to farm”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Secondly, in terms of discipline, the state power transformed women’s bodies into deployable public labor resources through mobi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forced discipline, to establish the “leadership of CPC in women’s bodies”. However, this kind of masculinized and proletarianized liberation of women neglected the phys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resulting in the bodily reality of starvation, amenorrhea, injuries and death. Lastly, back to the dimension of lib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this movement there wa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orced repression” and “willing pleasure” of those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In other word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resistance resulted from the forced discipline, and their voluntary discipline, formed the tension during the liberation process.

A concept of bodies of Hui’an women in construction that has the nature of production and carries socialist ideology thus emerged from the exertion of power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The state emphasized the female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to transform the Hui’an women’s bodies into a national symbol – the example of all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However, behind this process of organizing female forces and forcing discipline by the stat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overlooked. That physical difference was neglected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bodies were overused constitute the real causes of this tragedy. Shaping of bodies and minds, change of social status, and interference in reproduction, these were what had been left on Hui'an women's bodies, becoming the "engraving of constr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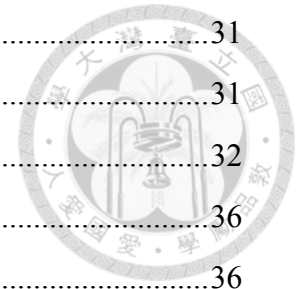
Key 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Hui'an women, state and women, discipline and liberation of bodies, engraving of construction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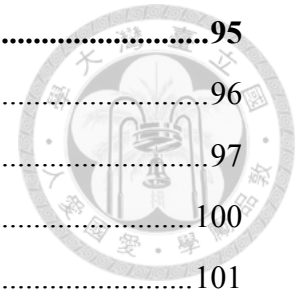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錄.....	vi
圖目錄.....	ix
表目錄.....	x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一、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與「婦女」.....	3
二、身體處境：「國家」與「身體」.....	5
三、身體現實：「規訓」與「解放」.....	8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研究內容.....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	13
一、惠安女研究概況.....	13
二、惠女水庫概況.....	14
三、研究方法.....	18
四、田野調查概況.....	21
第五節 相關界定.....	24
一、時間界定.....	24
二、空間界定.....	24
三、內容界定.....	24
第二章 惠女水庫建造與「工程惠安女」塑造的時空語境.....	25
第一節 水利大躍進：惠女水庫工程建造.....	25
一、水利運動的大躍進.....	25
二、惠女水庫工程的建造.....	27

第二節 婦女大躍進：惠安女工程參與.....	31
一、婦女運動的大躍進.....	31
二、以婦女為主力的水庫工程建設.....	32
第三節 工程惠安女：空間再現與婦女解放.....	36
一、「工程惠安女」與惠女精神.....	36
二、惠女水庫的空間再現.....	41
第三章 動員、競賽、強制：身體的規訓.....	47
第一節 宣傳與動員：社會主義勞動與婦女解放.....	47
一、意識形態的宣傳：「勞動光榮」、「婦女解放」.....	48
二、分配制度的改革：人民公社.....	50
三、動員策略：「黨團帶動」、「苦難回憶」.....	51
第二節 競賽與獎勵：新民歌與勞動模範的產生.....	55
一、勞動競賽的規訓與工程推進.....	55
二、身體的文化與武化規訓.....	64
三、新民歌的激勵與規訓.....	66
第三節 逃跑與強制：身體的拉扯.....	68
一、強制調動.....	68
二、逃跑與規訓.....	69
第四節 工程的婦女特性：身體的國家化.....	72
一、由「家」到「國」.....	73
二、「家」、「國」的拉扯.....	74
第四章 飢餓、閉經、傷亡：身體的現實.....	77
第一節：飢餓.....	77
第二節：閉經.....	79
第三節：傷亡.....	82
一、生病與受傷.....	82
二、死亡.....	86
第四節 婦女的工程特性：男性化、階級化.....	88
一、女性身體的男性化.....	88
二、女性身體的階級化.....	90



第五章 結語：在規訓與解放的夾縫中生存的工程惠安女.....	95
第一節 國家與婦女.....	96
第二節 規訓與解放.....	97
第三節 工程鐫刻.....	100
第四節 研究侷限與未竟行動.....	101
參考文獻.....	103
附錄一 口述紀錄提綱.....	107
附錄二 田野的聲音：重新審視惠安女.....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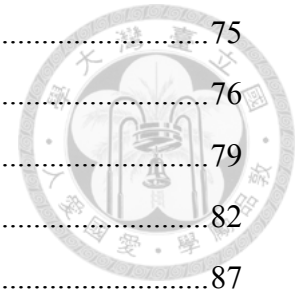


圖目錄



圖 1 文章架構圖.....	12
圖 2 惠女水庫在福建省的位置.....	14
圖 3 惠女水庫全貌圖.....	15
圖 4 惠女水庫衛星圖.....	15
圖 5 惠女水庫灌溉圖.....	16
圖 6 惠女水庫工程建造組織架構.....	16
圖 7 惠女水庫紀念廣場.....	17
圖 8 惠女水庫紀念館.....	17
圖 9 研究方法.....	18
圖 10 陳伯達親筆題字.....	28
圖 11 惠女水庫工程民工性別比例.....	33
圖 12 1937 年惠安男性職業分布圖.....	34
圖 13 婦女成為水庫工程建設主力軍.....	35
圖 14 惠女水庫指揮機構性別比例.....	36
圖 15 1960 年代水庫大壩及壩體鑲字.....	38
圖 16 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上被抹除的「惠女」.....	38
圖 17 惠女水庫主要紀念物分佈圖.....	42
圖 18 水庫名稱與鑲字演變.....	44
圖 19 第五總支部全體幹部合影.....	52
圖 20 群英比武大會現場.....	56
圖 21 惠女水庫大壩落成慶功大會.....	58
圖 22 莊明燕出席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59
圖 23 滑槽輸送土石.....	62
圖 24 推車改為拉型板車.....	62
圖 25 勞動競賽與身體規訓.....	63
圖 26 工地掃盲學習.....	65
圖 27 強制與逃跑的拉扯.....	72
圖 28 工程的婦女特性歷程圖.....	73

圖 29 「國」、「家」在婦女身體上的拉扯.....	75
圖 30 工程惠安女的規訓與反抗.....	76
圖 31 飢餓的身體.....	79
圖 32 閉經的身體.....	82
圖 33 傷亡的身體.....	87
圖 34 男性化與階級化的性別解放模式.....	92
圖 35 「工程惠安女」的形成.....	95
圖 36 「工程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	98
圖 37 惠安女的工程鐫刻.....	100



表目錄



表 1 田野調查進程表.....	22
表 2 口述紀錄狀況表.....	23
表 3 建國初期各年因水旱災造成的糧食減產.....	26
表 4 惠女水庫工程建設年表.....	29
表 5 惠女水庫重要工程概況表.....	30
表 6 惠女與惠女精神形成的重要事件表.....	4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對我而言，「惠安女」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詞彙。

我出生在福建省惠安縣，母親與祖母都是道地的惠安女，對於這個哺育我成長的群體，再熟悉不過了。母親是通過相親與父親結婚的，根據當地的風俗，在沒有生下小孩之前，必須一直住在娘家。母親的經歷正是整個惠安婦女群體的真實寫照。高中的時候，我離開惠安到泉州市唸書，當同學得知我是惠安人時，一定就會提到惠安女。奇特的服飾、勤勞的精神，那時候我才知道惠安女聞名海內外，同時也對這個群體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惠安女為何如此有名？她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婦女群體？這個問題一直留在腦海裡。

長期以來，受到社會主流論述的影響，建構了我們對惠安女「勤勞能幹」的形象認知。2013 年的時候，我進入了《江河知道》紀錄片欄目組，在紀錄案例上就選擇了以惠安婦女命名的水利工程——惠女水庫。這是一座由女性為主力軍建造的大型水庫，也正是這座水庫，讓惠安女從傳統從事農耕的家庭婦女成為全國婦女解放的代表，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一員。在這次的拍攝紀錄過程中，我們發現，惠女水庫的建造除了讓惠安女成為全國婦女解放的代表，同時也帶給他們極大的身體和心靈創傷。「那是淋到沒衣沒褲」、「偷跑就會被抓去批鬥」，在報導人的創傷敘事中，我越發感覺到我對於這個群體的陌生，心中對於惠安女的印象，開始解構，再次建構。

惠安女特殊的群體形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一直為人所關注。民國政府時期，惠安女是一個以「集體自殺」而出名的群體。新中國成立後，與政治話語相連的「勞動」與「武裝」取而代之，惠安女開始被納入農業現代化與國家化的進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時期，惠女水庫工程的建成使得惠安女被塑造成為國家尺度的「婦女解放」的代表。文革時期，由於政治原因，「惠女」二字成為禁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文化消費興起，以獨特服飾為代表的惠女文化逐漸成型。汪煒偉（2009：1）指出，惠女形象的變遷，實質上是國家政治與傳統性別文化博弈的外化，反映了國家政治威權主導下的女性解放模式的萌芽、起步、發展、高潮與消退的過程。長期以來，為人們所關注的惠安女形象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內容，其背後體現的正是國家政治、經濟政策與惠安當地社會、文化、日常生活方式複雜的相互作用。將其置入時間的脈絡，可以理解這個時代的孩子對於「惠安女」的認知，但尚無法窺見惠安女的真實身體處境。

人們所認知的「惠安女」都是正面積極的論述，然而，「惠安女」並非是一個整體的女性（大寫的 Woman），在不同歷史情境下與脈絡下，這個女性形象的詞彙有著被吸納、排除、挪用的種種（複數的 Women）。本研究將呈現的正是與政治論述極度關聯的，大躍進時期的工程惠安女。為什麼選擇這個歷史階段呢？是因為工程惠安女對於之前的正面論述，更能體現弔詭的悖論，更能體現國家與婦女之間的權力關係，更能解答我們這個世代的認知差距。無疑，「惠安女」形象的形構，與其所參與「惠女水庫」工程建造是無法分離的。惠安婦女被暴露在工程之中，從傳統受氣候影響的農耕場域，走入現代化工程的政治場域之中。從參與水庫工程建設開始，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身份，甚至她們的命運就已經緊緊地與工程、與國家聯繫在一起。在這裡，惠安女不再只是單純指惠安地區的婦女，更是具有全國婦女「解放」的政治意涵。

那麼，通過水庫工程的建造，惠安婦女真的「解放」了嗎？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生產，走出了家庭，擺脫了傳統的族權、父權、夫權。從官方的論述來看，某種程度上惠安婦女在這場工程建造中確實解放了。然而，口述紀錄中呈現出來的卻是國家強制與身體傷害，這樣的解放到底是怎樣的解放？這場水利工程建造背後，表現出來的是國家意志和婦女意志的緊張互動。惠安婦女參與到工程建造之中，並非完全源自女性自覺。對於惠安婦女而言，參與工程建造到底是解放還是規訓？這也正是本研究為何選擇以「身體」來作為切入點進行探究的原因所在。意識形態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身體的狀態是最真實的見證者，發生在身體上的權力運作以及身體所遭遇的生理性現實，打開了觀看歷史的一個最真實的窗口。以「身體」作為惠安女的觀察，企圖將身體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為權力控制和對抗的對象。

如何理解惠安女？這對於我而言是貫穿一生的叩問。為了解答上文所述的疑問，本研究把突破點鎖定在工程上，分析惠安婦女在水庫工程場域中的勞動經驗、身體經歷。將身體與工程的連結，實質上是將身體與工程背後的許多結構力量——國家政治、地方社會、家庭習俗——相連結。因此，本研究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來區分傳統意義上的惠安婦女，想要重點關注到大躍進時期惠女水庫工程建造過程中婦女的勞動實踐與身體經驗，進而探討「國家與婦女」的互動關係以及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的關係。本研究要寫的是惠安女身體遭受勞役的歷史，身體納入國家經濟建設目的中的歷史，是權力將婦女身體作為一個馴服的生產工具進行改造的歷史。

因此，本研究聚焦在大躍進時期水庫工程建造中的「惠安女身體」的勞動實作，以身體規訓和身體解放作為核心切入，提出三組發問，以「工程惠安女」呈現婦女的勞動規訓以及身體現實，探討女性身體與國家的互動關係。



- (一) 惠安婦女為何成為惠女水庫工程建造的主力軍？惠女水庫如何進行再現「惠女」？「工程惠安女」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為何？
- (二) 國家經濟建設政策和婦女解放政策如何交織在一起？惠安女身體如何透過水庫工程參與與國家互動？國家通過怎樣的方式對惠安婦女的身體進行勞動規訓？
- (三) 「工程惠安女」如何體現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惠安女何以能忍受如此大的勞動強度，飽含血淚地對身體進行規訓？惠安女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身體現實？她們真的能夠通過水庫工程建造獲得解放？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根據研究發問，可以發現惠安女的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為本研究之重點。惠安婦女從傳統農耕場域，走入現代化工程的政治場域之中，正是身體被納入國家經濟建設範疇、被國家規訓的過程。因此，本研究首先要和「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與婦女」的相關研究進行對話，以釐清在大的政治背景下的國家與女性互動關係。其次，為了更好的探究國家對惠安女身體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將聚焦在身體的角度，轉入「國家」與「身體」的相關研究探討。最後，回歸到本研究的研究核心，綜述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的相關研究。

一、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與「婦女」

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始終伴隨著中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的現代化任務。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引導女性脫離「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舊傳統，走出新社會，以實現婦女解放。大躍進時期，讓婦女參與社會勞動，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婦女解放與國家經濟建設的雙重目的。揭愛花(2012)的《國家、組織與婦女：中國婦女解放實踐的運作機制研究》一書，圍繞著「國家干預」這一核心概念，分析婦女解放實踐的話語體系，探討中國婦女解放的社會意義和此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王政(2005)的〈「國家女性主義」？毛時代性別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一文分析了婦聯組織在女性權利和國家任務之間的矛盾與平衡。這兩個文本都直接指向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國家特質」。那麼，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與「婦女」的關係到底為何？大躍進婦女運動給婦女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它既寫下了婦女思想解放史的

新篇章，也表現了忽視婦女生理特點和缺乏對婦女的保護，造成學術界在「婦女是否解放」等理論問題上的困惑和迷茫等不利影響（劉維芳，2008：103）。近年來湧現了不少關於大躍進時期的中國婦女的研究，但在「國家」與「婦女」的關係論證中，仍存在意見分歧與爭論，這種意見分歧和爭論的來源正是立場和關注點的不同。因此，接下來將從「國家」、「婦女」兩個立場進行爬梳。

在「國家」立場上，目前關於大躍進婦女解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站在「婦女」的立場上，至少不會站在「反國家」的立場，這也是由中國現實的輿論環境所造成的研究侷限。因此，幾乎可以在每一篇相關的文章中看到國家立場「新中國前 30 年的婦女解放運動取得了輝煌成就」（孫月冬，2002：28），「寫下了婦女思想解放史的新篇章」（劉維芳，2008：107）等等。首先，不可否認的是，站在國家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角度上而言，國家有效地動員起廣大地婦女參與到勞動生產中，加快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其次，這場運動讓婦女走出了家門，走出了傳統「父權」、「夫權」的束縛，促進了性別平等。農村婦女參與社會活動，拓展了她們的活動範圍「開闊了視野」，使得她們對自身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這對促進農村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李巧寧，2004）。李小江（2000）在探究 50 年中國婦女解放的發展歷程中，對這種婦女解放模式進行了高度地肯定，「由國家直接出面，通過政治運動和行政手段來推動男女平等，使得婦女的權利獲得有可以超越普通公民權利、婦女解放程度，可能超前於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它地力量和成就，遠非一切女權運動能及，因此也超越了任何形式的女權運動」。

在「婦女」立場，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大躍進的婦女解放是一場以經濟建設為目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對這場聲勢浩大的婦女運動進行了反思。首先，社會主義勞動參與雖然是促進婦女解放的重要途徑，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大躍進國家經濟建設中勞動力不足的現實問題。人們貫常把婦女參加生產勞動視為徹底解放的象徵，其實，婦女參加生產的初衷是彌補大躍進運動中勞動力的缺口（張志永，2010：151）。其次，運動中存在「男女同質化」的解放錯位，女性反而因此付出了沈重的身體代價。孫月冬（2002：30）針對新中國前 30 年婦女解放所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反思，指出「婦女的社會枷鎖解除了，但精神枷鎖依然存在；男女都一樣的口號造成女性主體意識的貶抑，阻礙了男女平等理念的現實化；依附心裡限制了女性素質的提高」。表面上看，女人和男人一樣，能夠參加到公共的事務當中，實質而言，是一種以男性標準來看待女性的錯位理解，是婦女主體意識的缺失。高小賢（2005）的〈銀花賽：20 世紀 50 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以大躍進時期陝西關中一帶「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為案例，運用大量一手資料和口述歷

史資料，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後的多種因素，呈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製造並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無疑，這場婦女運動由於生產中忽略了婦女生理性別的差異，形成了以男性為標準的社會性別同質化，使婦女在付出了比男人更多身心痛苦的代價後，其家庭地位和社會性別歧視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故婦女解放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張志永，2010：156）。

關於大躍進「國家」和「婦女」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主要呈現以下三個特點：其一，所有關於大躍進的婦女解放的論述都指出「國家主導」的「國家特質」，確立了大躍進時期「婦女」問題探討與「國家」的不可切割性，提供了本研究惠安女考察的基本視角。其二，關於「婦女是否解放」的爭論辯證中，過去的研究比較偏向歷史學研究，傾向於利用歷史資料來說明，本研究認為僅用歷史文獻並無法呈現婦女解放的真實面貌，因而，本研究傾向於口述歷史資料，以更真實地還原婦女的真實處境。其三，從研究視角看，前述研究雖然涉及了身體，但未能將其放到最主要的位置，本研究期待能夠聚焦在「身體」視角，來進行大躍進時期惠安女的研究。那麼「國家」和「身體」的關係如何？接下來將針對「國家」與「身體」的關係研究進行探討。

二、身體處境：「國家」與「身體」

20 世紀以來，身體的塑造始終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社會轉型相伴隨。國家對女性身體的干預，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時期，早從清代鮮明的「留辮子」、「纏足」開始，就已經開啟了國家對身體的干預歷程。清末民初，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康有為、梁啟超等思想家感知婦女之苦和國家之危，提出了對未來女性和社會的設想，要「立國傳種」，培養「新民」之母。辛亥革命後，《大總統令內務部通報各省勸禁足文》直接將婦女身體和國家聯繫在一起。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婦女解放運動並沒有直接動搖傳統的性別格局。國權，逐漸取代了父權，成為婦女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向，婦女解放運動成為二十世紀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重要的組成成分（湯耐爾，2014）。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和奪取政權後的，以階級、國家為論述中心的無產階級革命身體論述在中國逐漸取得領導地位。

關於「國家」與「身體」互動關係的著作文獻相當之多，在所有的文本之中，黃金麟（2001、2005）的《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928-1937》、祝勇（2008）的《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三部直接針對「中國身體史」的探究文本，

以及葛紅兵與宋耕（2005）的《身體政治》、范子謙（2015）《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陝甘寧邊區婦女身體與形象的塑造》兩部關於「身體政治」的探討文本對本研究的研究發展影響最深，覆蓋了從清末民初，到中共建立政權和奪取政權後完整的中國身體史和身體政治歷程。

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一書中，在理論對話上從韋伯（Max Weber）和傅柯（Michel Foucault）出發，提出「身體生成」的概念，「所謂的身體生成，指稱的並不是一種身體的生物性誕生或創造，而是指稱一種在肉體既存的情況下所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或文化創造（2001：5）。同時也注意到中國特殊歷史局勢和脈絡與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不同，「由於中國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時，仍舊稱不上是一個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主要營生模式的國家，而它所經歷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司法侵略等也不是歐美國家能夠比擬，因此在進行身體的觀察時，我們應留意歐洲中心身體觀在此的不適切性」（2001：19），因此，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傾向以國家主義來統整人民的心智和身體，是進行中國的身體研究時的重點。全書從身體的國家化和使命化開展，身體的法權化發展，身體的時間化走向，以及身體的空間化展演（2001：8）四個面向，解剖身體在近代中國所遭遇的過度政治性支配及原因，呈現完整的中國近代身體史的面貌。

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蘇維埃時期）和奪取政權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文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身體論述在中國逐漸取得領導地位。換句話說，中共領導下的身體，更具有鮮明的「國家特質」。針對中共建立政權的蘇維埃時期，黃金麟（2005）的《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928-1937》一書直接針對該時期的政體（國家）與身體的關係進行探究，明確地解答了為何這個時期「身體會主動靠近國家」的問題。他認為「解放後的人根本無處可去，在一個公民社會並不發達的國家裡，國家的『保護』往往成為人們唯一可見的選擇，而如果後者又正需要人民支持與靠攏，這兩者自然容易形成一種選擇性的親近。在此情況，我們無須訝異，當禮教被掃地出門，家庭被詛咒成為抑制個人個性發展的暴虐來源後，國家成立時成為人身最大的『殖民主』」（2005：29）。並且，此書在第六章「婦女、兒童與勞動者的身體」指出，國家確實有助於幫助婦女掙脫父權的羈絆，這個國家之善顯然應當得到正面肯定。但這個肯定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國家正將婦女的身體置放在更大的戰略空間中，讓它成為國家工具性驅使的對象（2005：273）。范子謙（2015）則直接針對蘇維埃政府後期（延安時期），中共對陝甘寧邊區婦女身體與形象的塑造探討中，透過婦女身體經歷的規訓歷程，指出這是一個讓婦女歷經階級化、政治化和使命化、工具化的過程。

關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身體，葛紅兵與宋耕(2005)的《身體政治》一書指出，「革命」作為非常態的政治手段，它以身體(改造、消滅、新生)為目標，也以身體為工具，革命是身體政治最暴烈的手段(2005:50)。其第四章「階級的身體——革命時代的身體意識形態」從長相、體格、穿著著手，去察看身體的革命敘事。革命是一整套宏觀敘事的混合體，一切的宣傳、鼓動、法律、法令、文藝都可以歸於其中，它旨在通過這些途徑達到對身體的揀選、規訓、操控等等，因而它首先是一套話語體系，同時也是一套操控制度(2005:79)。本書指出了身體在國家面前的最大困境，「它受到國家政治的規訓，常常成為國家政治的最堅定支持者。事實上，許多人把身體自覺地納入國家政治的一整套邏輯中，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身體如果得不到國家政治的滋養、撫育、規訓及認可，他們的生命似乎就沒有意義(2005:138)。」

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身體，祝勇(2008)的《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將 1960 年-1970 年代作為一個切片，對「革命中的身體」作一次深入地研究，來考察身體在歷史地所處的生態環境，以及它與歷史之間的對話關係(2008:30)。其在寫作當中，精闢地總結了革命中國家對身體的規訓特點，「這種規訓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這種強制不僅依靠規訓者的暴力來維持，更依賴集體形成的監督氛圍中」(2008:54)、「這個年代對身體的勞動規訓主要在三個層面上進行：一、教育；二、獎勵機制；三、強制」(2008:184)。

Foucault(1978:39)指出，國家是關聯到這一系列權力之網的上層建築，這個權力之網貫穿了軀體、性慾、家庭、行為模式、知識以及各種技術，它無所不在。「革命身體」的塑造，正是「國家」對「身體」的召喚與使用，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從一開始就被賦予國家、民族解放的時代意涵，直至解放初，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終都是反帝反封建地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邱國盛,2009)。中國農村的封建性格、貧富差距和相應存在的社會剝削，讓國家對身體的規訓成功施行，甚至成為身體的救贖。

上述關於中國「國家」與「身體」的相關研究主要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在論述的內容上，其共同指出了「身體」的「國家」特性，近代中國以來，身體始終是國家凝視的對象。其二，在其論述對象的，通常選擇一個時代的身體(大寫的身體)作為探究對象，容易忽視身體的性別、地域、年齡等差異(複數的身體)，本研究正是聚焦在惠安地區參與惠女水庫的婦女身體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企圖從更小的尺度，更清晰地呈現婦女身體與國家的關係。緊扣本研究的核心關懷，那麼在國家與婦女的緊張互動關係中，身體是呈現出怎樣的主動或被動的狀態呢？接下來，將與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理論對話。



三、身體現實：「規訓」與「解放」

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是兩個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進的作用力。本研究所探討的「工程惠安女」正是在規訓與解放的拉扯中形成的，那麼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的關係如何？

關於身體規訓的研究，著墨最多的無疑就是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雖然他將研究的觸角伸向社會歷史各個被人忽略的領域，如瘋狂史、監獄史、醫學史與性史，但是這種貌似互不相關的研究中，卻始終有著一個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受著種種權力制約的人的身體（黃曉華，2005：8）。傅柯首次涉及身體是在《瘋狂與文明》一書中，但是他沒有對身體做出專門的論述，他在《瘋狂與文明》與《不正常的人》兩書中探討身體如何被社會所排斥，《規訓與懲罰》研究身體如何被權力馴服，《臨床醫學的誕生》探討身體如何成為現代醫學的對象，《性經驗史》探討性如何成為權力的中介和目的。身體權力和身體規訓理論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規訓與懲罰》與《性經驗史》兩書中。Foucault 在「身體—權力」的論述中包括了「規訓—反抗」兩個層次，這正好與本研究的「規訓—解放」相契合，某種程度上，解放正是在規訓和反抗的協商中進行的。

（一）身體的規訓

在 Foucault 的觀點看來，身體總是被捲入政治領域當中，微觀權力早已潛移默化地滲透進身體，使得身體籠罩在一個知識教化與權力施展的區域之中。傅柯關注政治肉體，他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透過係譜學的方法闡述了人類的懲罰史，從 18 世紀公開懲罰犯人到現代監獄的出現，傅柯說明了這些不同階段的懲罰史的斷裂特徵，書寫了關於人的身體被規訓的斷裂特徵。他力圖表明，權力對馴服身體的管理和控制取代了對犯人身體公開的暴力懲罰，「權力關係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1975：13）。他的論述向我們展示了社會中各種組織和制度都圍繞著身體展開鬥爭，對身體進行隨心所欲地規劃、擺弄。在現代社會，「權力不再是一種物質力量如刑罰的代名詞，而是通過社會規範、政治措施來規勸和改造人」（葛紅兵、宋耕，2005：45）。

進而，他在《性經驗史》一書中以性為材料和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身體、真理和權力的關係，亦即，在人類歷史中「性」如何被權力操縱、利用以至於改變的。那些使得對身體控制成為可能，使得肉體力量永久服從的，並施加於肉體上一種溫馴而有用的方法，就是「規訓」。權力通常被認為是掌握在統治

階級者手上，被統治者任由控制，然而傅柯所談的權力應該被看成一種策略。楊大春（1995）指出，權力是一種策略，當某人對某人進行統治時，不是剝削後者，而是運用某種策略或技巧對後者進行控制與處置。Foucault（1975：141）以軍隊、工廠、學校為例，指出了規訓的四大方向：分配藝術（the art of distributions）、控制活動（the control of activity）、編序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geneses）、力量編排（the composition of forces），並進一步提出了規訓的四種權力技術：「制定圖表」、「規動活動」、「實施操縱」以及達到力量組合而安排之戰術。這些技術成為社會各個機制中，權力表達的印記。Deleuze（1986）指出傅柯分析權力關係是透過空間分配、實踐編序以及組織後將時空組合，結果呈現的力量效果要大於基本力量的綜合，以達成規訓的效果。那些個體化的軀體，在經過某種編輯之後，將被納入到整個社會的符號系統中去，成為其中的有機部分。傅柯認為，這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是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變得更有用，也變得更加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1975：156），規訓成為利用身體最有效的策略。

權力之後，緊接而來的是反抗，權力與反抗是同時並存的。在眾多權力之後，也存在著無數的衝撞點，形成不穩定中心，每一個衝撞點都有可能產生衝突或者鬥爭，甚至可能暫時性的顛覆權力（陳明珠，2006）。Foucault 曾說「我認為我們這樣的社會，真正的政治任務，應該去批判那些貌似獨立自主制度的運作，並加以批判揭露這些政治暴力後隱藏的面具，如此我們才能戰勝它」（Steven，1991）。了解權力的真相，重新面對權力本質，甚至進行反抗和顛覆，這正是傅柯的權力機制體現出來的積極面。誠然，不僅是支配的規訓的力，同時也存在眾多顛覆的反抗的力，這是權力運作的普遍狀態。

（二）身體的解放

「解放」（emancipation），指擺脫束縛、壓迫的一種狀態，包括精神與物質兩方面。1975年在墨西哥城「國家婦女世界會議」的《關於婦女的平等地位和她們對發展與和平的貢獻宣言（墨西哥宣言）》將「婦女解放」界定為，一般婦女超出家庭的侷限參與社會活動，獲得社會人格，實現男女的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解放（姜鍵、姜蘭，2001）。本研究所理解的「身體解放」是一種擁有「追求自由表達與創新、實踐個人主體意識」的身體，即是「屬己」的身體狀態。

目前關於「規訓」與「解放」關係的研究文章並不少，黃曉華（2005）的博士論文《身體的解放與規訓——中國現代文學身體意識論》以人生派、藝術派、革命派、翻身派四類文學創作為經，以社會身體與生理身體為緯，刻畫出現代文學身體意識的轉型與流變脈絡，指出從五四時期強調的身體解放，到解

放區時期強調的身體規訓，現代文學對身體意識的探討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陳雅萍（2011）在〈解放與規訓——殖民現代性、認同政治、台灣早期現代舞中的女性身體〉以現代舞為論述對象指出，早期現代舞既是身體與精神的解放，但同時也深受當時代各種意識形態的制約與模塑。前輩舞蹈家們舞動的身體，一方面反映了早期現代舞普遍具有的「解放」與「規訓」之雙重實踐。另一方面也見證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特殊的「殖民現代性」經驗，尤其是在文化層面的展現。程淼淼（2015）在其碩士論文《近代婦女身體解放進程研究》以廢纏足、天乳運動、剪髮風潮、30年代的美容裝飾為對象論證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規訓與解放在身體上的作用，其認為國家權力對身體的規訓始終存在，尤其是近代動盪的背景下，國家話語的支配權空前強大。但婦女解放不能依賴於政權和男權的規訓，只有婦女的意識的自我建構，才能完成真正的自我解放。湯耐爾（2014）的碩士論文《「解放」的困境——大躍進時期的上海婦女和國家建設》從國家建設視角入手，對大躍進時期上海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過程進行歷史分析，認為微觀權力規訓地背後蘊含著現代國家建設和社會重構策略，強調認為平等而忽略兩性自然差別、社會勞動和家務勞動發生衝突，國家意志和女性意志處於緊張互動之中。

「規訓」與「解放」這兩個似乎有些互斥身體向度，不管在哪個時期，總是以不同的力量拉扯著身體。上述的研究對於「規訓」和「解放」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權力關係中「規訓」和「反抗」是同時存在，二者的力量對峙直接決定了「解放」的程度和效果。從歷史進程來看，五四時期時期的身體解放論，直接面對身體的需求，反抗的力量相對弱。而中共領導下的革命身體解放論中，規訓似乎以更大的力量在拉扯的身體，這就說明了這種「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動的解放。那麼在「工程惠安女」身上，這兩個力量又是如何拉扯呢？本研究將通過大量的訪談口述歷史，輔以歷史文獻資料，呈現「工程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歷程。

上述關於「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與婦女」、「國家與身體的關係」、「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的關係」的研究，首先，呈現了中共領導下，「婦女解放」的「國家」性格，確立了大躍進時期「婦女」問題探討與「國家」的不可切割性，提供了本研究惠安女考察的基本視角。其次，身體史的相關研究，彌補了普通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不足，讓我們觀看歷史的角度重新轉回參與和創造歷史的身體主體之中，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的靈感與思路。

綜上而言，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從研究的選題上來看，關於大躍進中國婦女解放的研究不少，雖然總體上都有呈現婦女解放運動的「國家性格」，但是直接處理婦女運動中國家與身體關係的研究幾乎沒有。其二，從研

究對象的選擇來看，上述研究通常選擇一個時代的身體（大寫的身體）作為探究對象，容易忽視身體的性別、地域、年齡等差異（複數的身體）。其三，從論文選題的空間尺度上來看，比較集中在國家、地區、省市的級別，具體到勞動場域尺度中探討的文獻相對較少。其四，從研究取徑上來看，上述的研究偏向歷史學研究，傾向於利用歷史資料來說明，本研究認為僅用歷史文獻並無法呈現婦女解放的真實面貌。

本研究鎖定的研究對象，大躍進時期的工程惠安女，將會比其它大時代、大區域、大尺度的婦女研究，更能揭露其背後的複雜權力關係。首先，本研究將惠安女與工程聯繫在一起，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實質上是將婦女的身體與工程背後的複雜的結構力量—國家、地方、家庭權力聯繫在一起，有利於更好地來探討國家與婦女的關係。其次，本研究以黃金麟的「身體生成」概念作為觀察視角，不僅要關注到身體的文化層次，更加關注在身體的生理層次，以「身體」來觀看大躍進這場水利工程建造中和工程惠安女形象塑造中，身體主動或被動的經驗。在研究取徑上，在高小賢「銀花賽」研究的啟發之下，本研究想要突破傳統以文獻資料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期待通過大量的口述歷史，來呈現身體經驗。最後，回到「工程惠安女」必須面對的身體困境「規訓」或「解放」，傅柯身體權力中所涉及的「規訓—反抗」為本研究提供很好的研究啟發，但是同樣也注意到傅柯關於資本主義的書寫在社會主義勞動場域的不完全適切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聚焦在工程的尺度場域，以女性「身體」作為論述的對象，運用大量口述歷史試圖為大躍進婦女解放運動的國家與女性身體的關係，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研究內容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大躍進時期的工程惠安女，以她們的口述歷史紀錄作為主要資料來源，歷史檔案、報刊等文史資料作為補充。以 1958 年到 1965 年惠安女水庫工程建設為研究場域，呈現「工程惠安女」的勞動過程，探討勞動婦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歷程，及其背後國家與婦女身體互動關係。本研究主要分五個部分，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通過研究發問，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確定本研究所用探討的是「工程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歷程。與「國家—婦女」、身體的「規訓—解放」的相關研究進行對話。綜述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概況，並對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惠女水庫建造與「工程惠安女」塑造的時空語境。從國家、地方、工程三個尺度，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交代惠女水庫惠女水庫建造與「工程惠安女」形象塑造的時空背景。

第三章：動員、競賽、強制：身體的規訓。從宣傳與動員、競賽與獎勵、反抗與強制三個方面，檢視惠女水庫工程場域中，國家對婦女身體的勞動規訓手段與效果。探究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紀律性的「工程惠安女身體」通過怎樣的勞動規訓形成，呈現惠女水庫的「婦女特性」與惠安婦女身體的國家化。

第四章：飢餓、閉經、傷亡：身體的現實。跳脫國家的概念，站在惠安女性身體的立場，從飢餓、閉經、傷亡三個方面直接關注到婦女的身體現實，呈現婦女身體的「工程不適性」。

第五章：結語—規訓與解放的夾縫中的工程惠安女。從「國家—婦女」、「規訓—解放」兩組關係中，重新解讀「工程惠安女」。檢視水庫工程建設過程中共對婦女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背後隱含的政黨權力、政治意圖。從規訓和解放的關係中，清晰地透視「工程惠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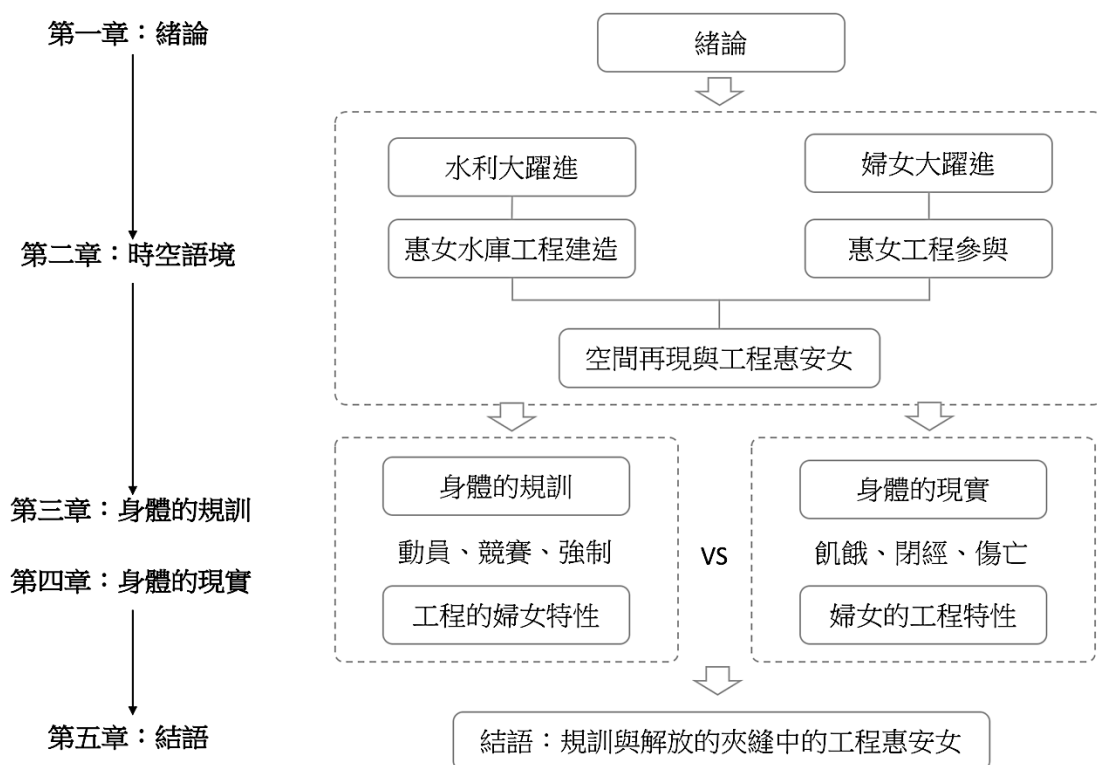


圖 1 文章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



一、惠安女研究概況

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關於惠安女的研究起步比較早，主要採取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的研究取向。早在 1920 年代，葉國慶就在《廈門週刊》上發表了《滇黔粵的瑤狀俗與閩俗之較》，對惠東地區「婦女婚後長住娘家習俗的起源問題」進行了研究。之後，林惠祥（1962）等人也針對此議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六七十年代由於政治原因，相關的研究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八十年代後，隨著學術研究的復甦，惠安女研究也重新被挖掘，這個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長住娘家」、「服飾」等主題上，湧現了許多研究文獻，如吳綿吉（1988）的〈惠安婦女長住娘家習俗述議〉；蔣炳釗（1989）的〈惠安地區長住娘家婚俗的歷史考察〉；陳國強（1989、1990）的〈福建惠安崇武的衣飾與族屬試探〉、《崇武人類學調查》；藍達居（1995、1997）的〈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惠東人文研究〉、〈歷史傳承與族群互動——福建惠東女現象試析〉；郭志超（1997）的〈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稽考：惠東文化之謎試解〉；蔣炳釗（1998）的〈惠東女是否是少數民族〉。

進入 21 世紀後，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然而也開始出現新的研究領域。李麗敏（2000）的《惠安女子教育的歷史、現狀與展望》，對惠安女子教育的歷史與現狀進行考察，分析其成因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2009 年以來，汪煒偉的系列文章從新的角度探究惠安女，其碩士論文《再塑女性：惠安女性形象變遷研究（1949-1966）》（2009）以社會性別史的角度切入，從歷史的軸線系統地闡述了建國初的國家化與惠安女形象塑造，探討國家政治力量與婦女解放的複雜的關係，認為將女性以國家需求進行塑造，難以達到性別平等。另外，〈民國時期惠安女集體自殺現象〉（2009 與楊齊福）、〈建國初婦女解放中的自殺現象——以福建省惠安縣婦女集體自殺為考察現象〉（2012），分別對兩個時期惠安女自殺現象進行探究；〈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設運動中的女性〉（2011 與楊齊福）一文指出，在惠女水庫的建設過程中，惠安女通過勞動，重塑女性形象，達到女性解放的理想。然而，這種解放並非源自女性自覺，存在將女性問題等同於階級問題的誤解，同時表現出讓女性簡單模仿男性的現象。段學敏（2013）從對惠女水庫工程的研究，給予女性主義視角進行分析批判，認為傳統解讀視角下的惠女水庫工程給人們造成了誤區，遮蔽了惠安女在惠女水庫工程實踐中遭受的性別不平等對待，表面上是要實現婦女解放，實際上卻是對婦女的另一種壓迫。

綜合來看，目前對於惠安女的研究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惠女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一直是福建女性研究的重點對象，從研究的取向上來看，其研究過多地關注在民俗風情等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取向。其二，近年來出現的汪煒偉的一系列研究，從性別歷史的取向著手，開啟了惠女研究的歷史、社會學取向，集中在分析國家力量對於社會性別制度的調節和重塑，但相對缺乏身體與空間向度的連結。本研究提出以「工程惠安女」的角度著手，期待能夠聚焦在大躍進時期的惠女水庫建設中女性在工程中的身體實踐經驗，為認知惠安女提供新的觀看角度，以供大家借鑑。

二、惠女水庫概況

惠女水庫屬大（二）型水庫，庫區位於福建省泉州洛江區馬甲鎮、南安洪瀨鎮和洪梅鎮交界處，是一座集防洪、供水、灌溉、發電等綜合功能為一體的跨區域重要水利工程。於 1958 年 7 月動工，由當時惠安縣的紅旗（城關）、東紅（黃塘）、上游（惠南）、飛躍（惠東）四個公社聯合興建，1960 年 3 月竣工。水庫集水面積 105.8 平方公里，總庫容 1.26 億立方米，設計的防洪標準為百年一遇，五百年校核，樞紐工程由主壩、副壩、溢洪洞、輸水涵洞四個部分組成。水庫原名為「烏潭水庫」，1959 年為紀念惠安女建設水庫的貢獻更名為「惠女水庫」。惠女水庫的灌區工程於 1965 年基本完成，總幹渠 52.6 公里、2 條幹渠總長 30.23 公里、11 條支渠總長 91.36 公里，當時的灌溉渠道通到了全縣的每一個村子，實際有效灌溉面積 8.42 萬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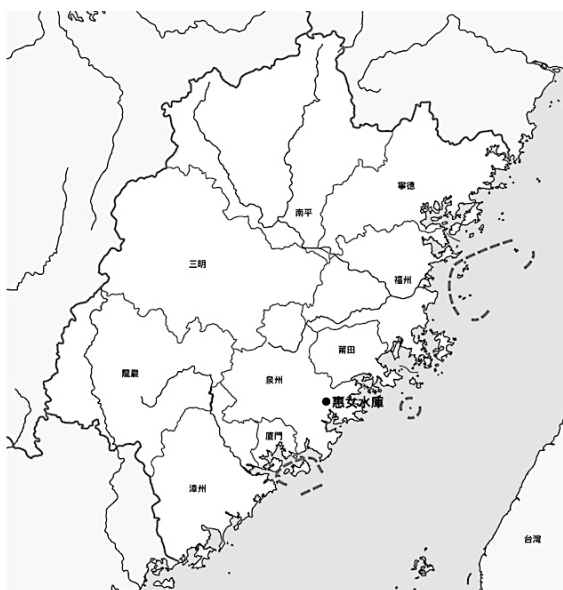


圖 2 惠女水庫在福建省的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 惠女水庫全貌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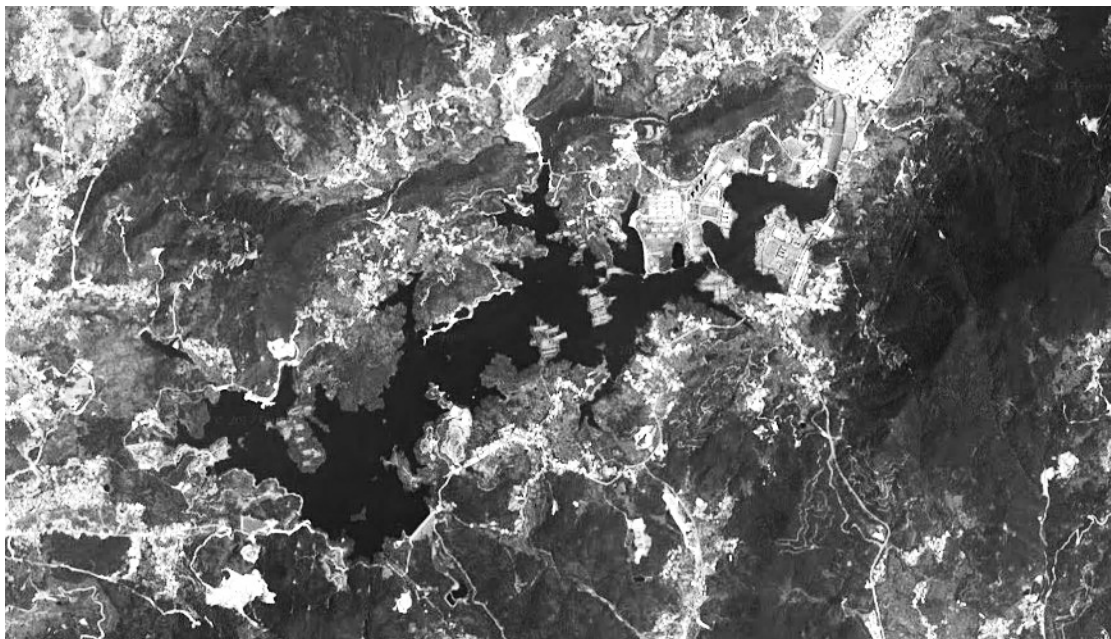


圖 4 惠女水庫衛星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取得時間：2017/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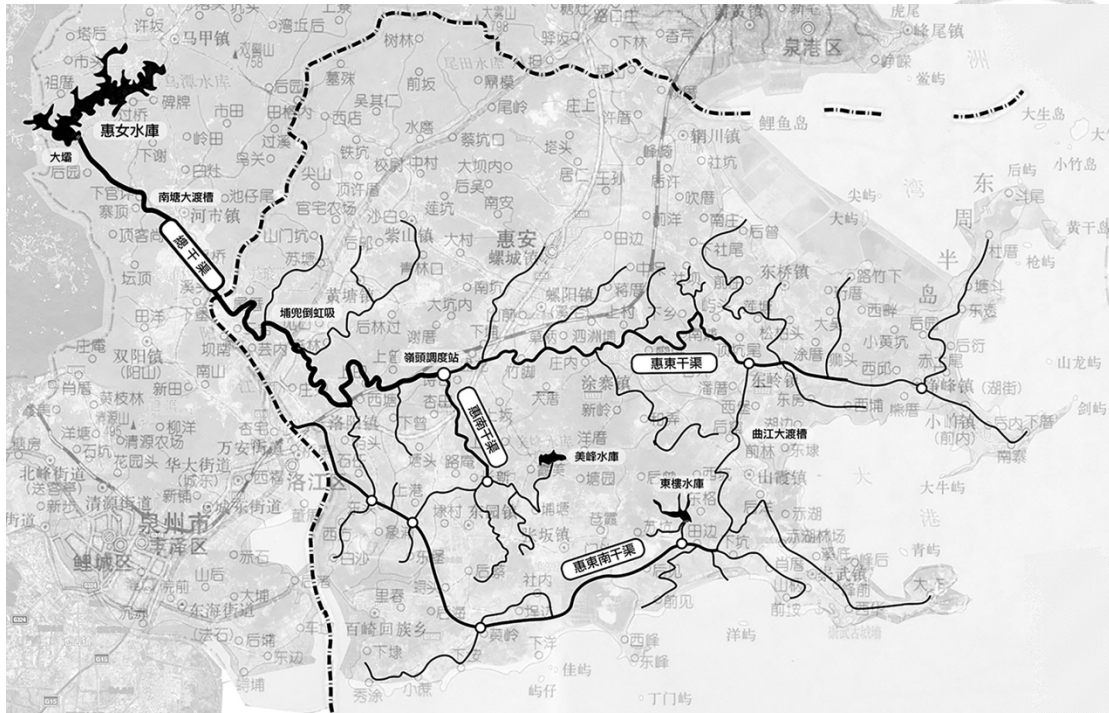


圖 5 惠女水庫灌溉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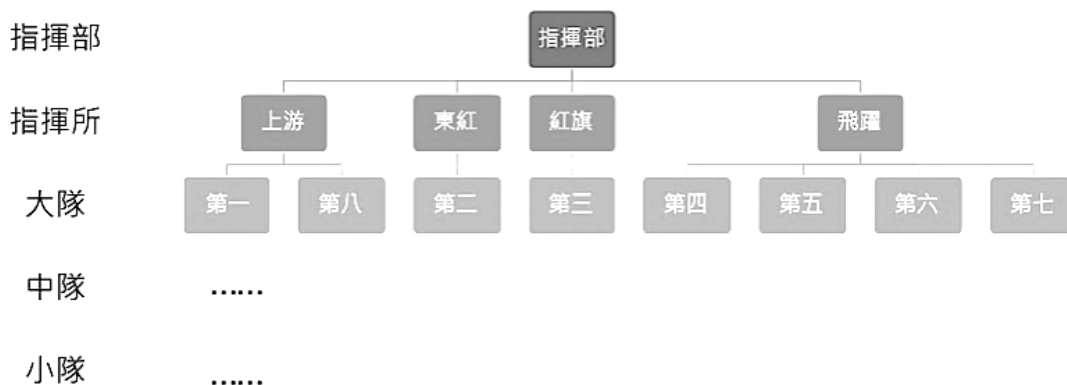


圖 6 惠女水庫工程建造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水庫工程建設由惠安縣人民政府組織實施，政府向惠安的紅旗、東紅、上游、飛躍四個公社提出，各自然村每戶至少 1 人，共 41000 多名民工參加到惠女水庫工程與灌溉工程，其中女性占 35000 多名，達到 85% 以上，最高 70 多歲，最小 15、16 歲，按照地域編成八個大隊。參加大壩建設的民工大約 1.5 萬人，其中女性約 1.3 萬人，超過 86%，無論是挖土、挑土、打夯、推車、鋸木、打石、駕船，還是緊張的搶險，她們都挺身而出，她們「創造了我國歷史上空前的主要由婦女建成的大型水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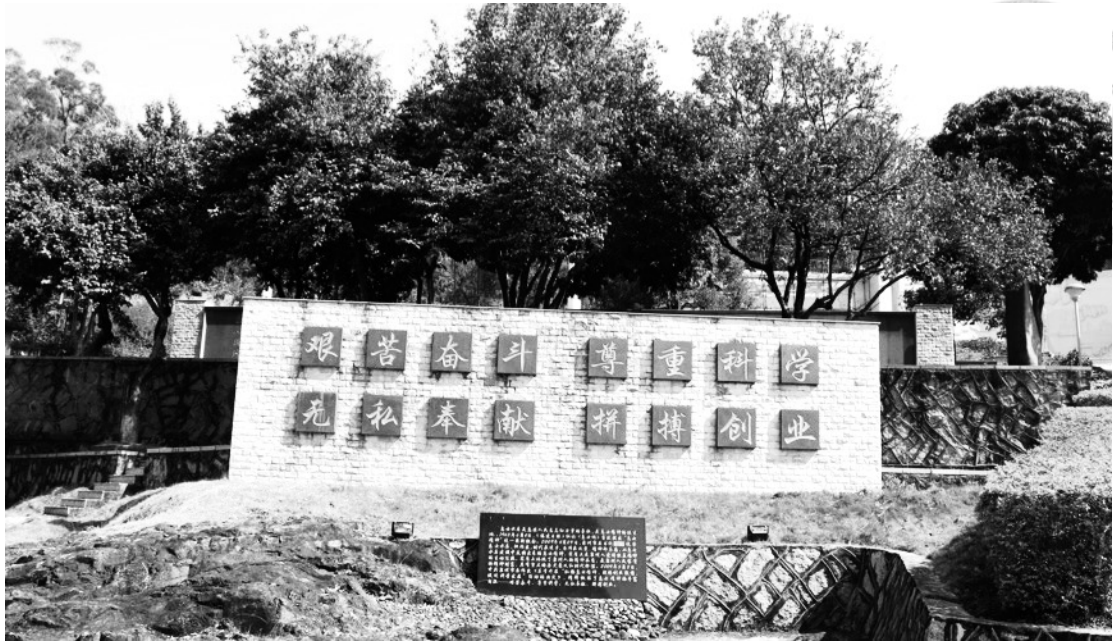


圖 7 惠女水庫紀念廣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 8 惠女水庫紀念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水庫分別於 1977 年、2003 年、2007 年先後三次進行除險加固，目前水庫是泉州第二大水庫，也是福建八座大型水庫之一，承擔者南安部分地區、洛江區河市鎮以及惠安 12 個鄉鎮的供水、農業灌溉等任務，每年發電量 320 萬度，繼續哺育著惠安人民。另外，水庫於 2007 年除險加固工作開始陸續建成了惠女水庫紀念館、紀念廣場等紀念建築物，以弘揚惠女精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了文本分析、深度訪談、口述歷史三種研究分析方式，以進一步接近惠安女身體規訓與解放的真實狀況。惠女水庫不論在水利工程的空間生產，還是紀念館、紀念廣場的空間生產，都進一步促進「工程惠安女」這一偉大婦女形象的再現。然而，婦女真實的勞動實踐和身體狀況卻常被隱匿。在討論惠安女時，身體實踐（勞動規訓與解放）與水庫空間時無法拆開來看的，因為「工程惠安女」的生產，其背後正是惠安女在水庫工程的身體實踐，並且鑲嵌於當時社會發展的脈絡之中發揮作用。為了深入地抓住女性的身體實踐，以及惠女水庫的空間生產與再現，本研究首先從大的尺度著手，透過大量文獻分析還原惠女水庫建設的時空背景。接著，透過深度訪談，掌握了惠女水庫營造過程的全貌，以及惠女水庫紀念館營造過程及影響。繼而，透過口述歷史紀錄的方式，在紀錄中著重在女性身體實踐，包括身體規訓與真實的身體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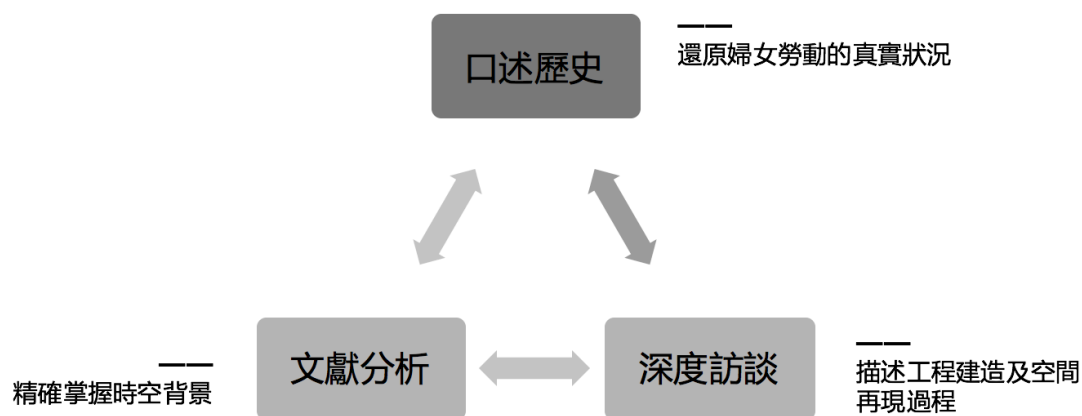


圖 9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一) 文獻分析——精確掌握時空背景

文獻研究是一種通過整理和分析，以文字、數字、符號、畫面等信息形式出現的資料，來探討和分析各種社會行為、社會關係以及其他社會現象的研究方式。惠女水庫的建設和「工程惠安女」形象的塑造，牽涉許多歷史事件，被紀錄與銘刻在各種文本之中。透過整理、對比、分析文獻有助於釐清其形成的

時空過程，以及行動者在其中所留下的痕跡。本研究的主要文本來源為大躍進水利建設相關的檔案資料與報紙。首先是，官方的檔案資料，希望從惠女水庫管理局相關檔案資料以及紀念館文件與影像，製作惠女水庫大紀事表，配合當時的大躍進政策，還原惠女水庫建設發展歷程。其次是報紙，當時的報紙作為最重要的官方宣傳手段，《人民日報》、《福建日報》、《泉州日報》、《惠安報》等重要政府媒體資料，資料能夠更好地呈現當時的惠女精神如何被塑造和傳播出去。大躍進那麼多水庫建設，為什麼惠女水庫這麼出名？如何塑造這個神話？等等這些問題有待大量的檔案與報紙等文獻資料輔佐解釋。由於政治環境與社會風氣的原因，這些資料所載不免有許多失真的現象，但是也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提供了外界對於惠安女形象的解讀方式，以及國家政治的婦女介入情況。

在所有分析的文本中，我特別專注於惠女水庫管理局以及當時的報刊所留下的檔案與文件：《萬女鎖蛟龍》、《惠女水庫 巾幗豐碑》、《惠女頌》等，並配合惠女水庫以及惠安女相關的歷史研究，如汪煒偉（2009）《再塑造女性：惠安女性形象變遷研究（1949-1966）》、段學敏（2013）《惠女水庫工程的女性主義批判》、楊齊福、汪煒偉（2011）《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設運動中的女性》等。

其中，使用最多的文本資料是《萬女鎖蛟龍》這本紀實小說，由汪憶今、王順興兩位男性民工在惠女水庫建造過程中陸續進行紀錄，完成於1962年，主要呈現當時婦女的勞動情形。一直到2005年水庫進行除險加固時，這本書才從倉庫里被翻出來，惠女水庫管理局配合紀念館的營造進行重新整理編輯，在2007年出版。這本書主要呈現幾個特點：其一，在當時的大躍進氛圍下，其寫作呈現出比較濃厚的「國家」、「階級」特性；其二，其有意無意凸顯惠安婦女艱苦奮鬥的男性化的英雄形象；其三，以男性為主的女性書寫，可能存在某種生理身體的忽視；其四，雖然有時代和政治氛圍的影響，但是兩位作者站在相對客觀的角度上，除了呈現勞動競賽，也呈現了逃跑以及逃跑的檢討與應對，這本書的寫作相對客觀地呈現當時的狀況。

除了在文獻字裡行間，拼湊「工程惠安女」行動的完整時空場域，閱讀與分析這些文獻也幫助我在口述歷史紀錄過程中，能夠對惠女水庫建設背後複雜的歷史更為敏感，在與口述記錄者互動中，能夠更精確地掌握口述內容中的時空背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本研究寫作過程中未能獲得一些直接的檔案資料，因而很多論述只能停留在表面的描述，期待未來有機會進行進一步的補充。



(二) 深度訪談——描述工程建造及空間再現過程

「工程惠安女」形成，所涉及的行動主體並非只有廣大參與工程建設的女性民工，還有其他參與工程建造決策、管理以及後來紀念園區營造的相關人員。在所有有關的人員當中，我重點地訪談了當時的技術員、紀念館營造以及營運的負責人、壩區管理站站長。通過深度訪談，彌補了文獻中沒有紀錄到的信息，挖掘了更多當時文獻以及正統歷史所忽略的論述。然而，遺憾的是，由於年代較為久遠，當時參與惠女水庫建設的相關人員都已經去世，僅訪談到當時的技術員張榮土。慶幸的是，在壩區管理站和水庫紀念館，訪談到了直接相關的人員，對於工程的養護和後來的水庫紀念館的空間營造概念、營運狀況、影響力有了深入的了解，並獲得當時的宣傳成員蘇金伙老人晚年寫下的相關資料，有助於釐清水庫建設完後，「工程惠安女」的影響延續狀況，對於「工程惠安女」如何被再現以及隱匿，提供了理解的線索與材料。

(三) 口述歷史——還原婦女勞動的真實狀況

口述歷史適應性強，應用性廣，不僅關注社會上層顯要，也注目於普羅大眾，可以更真實地反映歷史。口述歷史可以填補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經歷等沒有文字記載的空白，至少彌補其不足（楊詳銀，2004）。惠女精神背後更重要的就是惠安婦女這一本體存在，婦女在工程中的身體勞動實踐為最重要的部分。女性在水庫工程中的真實狀況並不是文獻中所寫能夠掌握，本研究認為唯有通過口述歷史資料，才能對婦女的真實狀況進一步地釐清與認識。本研究於 2013 年到 2017 年間，集中五次時間，對惠安多名曾經參與工程的婦女進行了口述歷史紀錄。

田野所要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口述歷史紀錄？首先是，口述紀錄的數量。對於我個人而言，紀錄的數量當然是越多越好，主要源自以下兩個原因：第一，每一個女性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工程都成為她們生命史中獨特的不可或缺組成部分，是一講起來就會掉眼淚的過去。第二，這些婦女們如今都已經步入 80 歲的高齡，時間不允許我們繼續拖下去，能夠盡量多地紀錄就應該盡量多地紀錄。由於時間與精力的限制，最終口述歷史的紀錄數量停留在了 11 位，除了時間問題，另一個原因是，當口述數量超過 8 位以後，婦女身體的狀況大概都已經呈現，開始出現大量的重複紀錄。紀錄的樣本已經覆蓋了不同的區域，涵蓋中隊長、小隊長到普通民工的角色。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每一個被紀錄的阿婆都有其與工程特殊的連結，無法一一紀錄是本研究的最大遺憾。

其次是，尋找受訪者的方式，進入田野居住在其中，本研究通過滾雪球、以工程追人、以人追工程的方式進行口述歷史紀錄。在田野調查中，口述紀錄的進行和工程現場的考察是交互進行。接著是，口述紀錄的方式，因其人數較多，且對象大多 75-85 歲，行動多為不便，因此在調查當中，主要採用「少談多次」的方式進行。最後，我們嘗試讓幾個被紀錄的阿婆組合在一起，帶著她們重返惠女水庫，本以為回憶交織在一起會有更多的共同回憶產生。然而，我們的預想是錯的，當思緒重新回到故事的發生地，她們的心情變得無比沈重，沈重到她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男性的研究者，在女性生理方面的紀錄中，由於性別關係而無法深入紀錄。因此，在後續的田野調查中，我選擇退場，而由我妹妹來做進一步的補充調研，進而獲得了更深入的口述歷史資料。在田野進程上，後期（2017 年 6 月、7 月）的補充田野是由我妹妹進行的。在內容呈現上，第四章第二節「斷經」撰寫的口述資料，絕大部分都是我妹妹在補充田野中紀錄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了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口述歷史紀錄三種研究方法，以前人已有的觀察與研究為基礎，以相關行動者本身的口述歷史紀錄與分析為主要分析方式，在田野中獲得比較完整的文獻資料以及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

四、田野調查概況

本研究自 2013 年先後在惠安做田野調查，集中在 2013 年 10 月、2017 年 2 月、2017 年 6 月、7 月進行五次田野調查，獲得了比較完整的文獻資料以及口述歷史資料。

在文獻資料的收集方面，直接的文本資料為水庫內部資料和報刊資料。水庫內部資料，主要是《萬女鎖蛟龍》、《惠女水庫 巾幗英雄》兩本紀錄，前者以寫實敘事的方式，呈現了當時的建設狀況，後者則是管理局在水庫建設 50 年出的官方紀念冊，整合了惠女水庫目前相關的宣傳資料，能夠提供比較直接全面的認知，但是比較偏向官方的宣傳冊。水庫內部資料還有紀念館保存的歷史影像資料，以及一些老幹部、老員工留下的手稿回憶錄。報刊資料中，主要收集了《人民日報》、《福建日報》、《泉州日報》、《惠安報》等報刊媒體對惠女水庫以及惠安女的相關報導。間接的文本資料，掌握了中國大躍進時期女性研究以及惠安女研究的相關研究文獻。

在深度訪談的資料方面，目前訪談到了當時技術員張榮土，以及壩區管理站和惠女水庫管理局的兩位領導，掌握了惠女水庫的建設狀況與現況、紀念廣場與紀念館、惠女精神弘揚工作的安排。



表 1 田野調查進程表

時間	地點	內容
2013 年 10 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淨峰鎮 ✓ 東嶺鎮 ✓ 惠女水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完成了王荷棗、吳延等 5 位阿婆的影像紀錄 ■ 帶著王荷棗等 3 位阿婆，重返惠女水庫 ■ 完成《烏潭記憶》紀錄片
2017 年 2 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淨峰鎮 ✓ 東嶺鎮 ✓ 崇武鎮 ✓ 塗寨鎮 ✓ 黃塘鎮 ✓ 惠女水庫 ✓ 惠女水庫管理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完成了楊亞嘗、吳延、張荷省等 11 位阿婆的口述歷史紀錄。 ■ 收集了《萬女鎖蛟龍》、《惠女水庫 巾幗英豐碑》等官方書籍 ■ 紀念館照片與資料 ■ 走訪了水庫工程與灌區工程遺跡
2017 年 6 月 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淨峰鎮 ✓ 東嶺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二次回訪吳延阿婆、荷省阿婆
2017 年 6 月 12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淨峰鎮 ✓ 東嶺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三次回訪吳延阿婆、荷省阿婆
2017 年 7 月 15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淨峰鎮 ✓ 東嶺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四次回訪吳延阿婆、荷省阿婆 ■ 第二次回訪亞嘗阿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口述歷史紀錄方面，完成了 11 位阿婆的口述歷史紀錄，年齡從 75 歲到 83 歲；角色包括普通民工、小隊長、中隊指導員；政治成份包括群眾、團員、黨員；榮譽包括一等功臣、二等功臣、七好幹部、積極份子等先進稱號，涵蓋相對全面。但是由於調研限制，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惠安縣的淨峰、東嶺、東橋、塗寨四個鎮，它們是當時參與建設最大的公社，躍進公社，其他三個公社還未能涵蓋。

表 2 口述紀錄狀況表

姓名	年齡	當時職位	政治成份	榮譽	婚否
吳延	75	普通民工	群眾		期間結婚未生育，後被夫家要求歸來
楊亞嘗	78	小隊長	黨員	一等功臣	未結婚過去，回來才結婚
吳烏美	81	中隊指揮員	黨員	七好幹部	已婚未生育
張淑美	79	普通民工	群眾		未婚
張荷省	82	小隊長	團員	二等功臣	已婚未生育
蘇姜	83	中隊指揮員	黨員		已婚未生育
艾亞抱	81	副小隊長	團員	二等功臣	已婚未生育
陳金梅	84	普通民工	群眾		已婚未生育
王荷棗	83	普通民工	群眾		已婚未生育
張份	80	普通民工	群眾		已婚童養媳
吳亞花	79	小隊長	黨員	二等功臣	已婚未生育，被夫家逼回來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在整個紀錄中，從婚姻家庭狀況上來看，剛開始去參加大壩健身的時候，這些大都是已婚未生育的女性民工，因為惠安當地「長住娘家」的習俗，她們都是從從娘家出發過去。在經歷了工程建造之後，大部分都是因為夫家這邊催，而從工地回到傳統的家庭生活秩序中。

第五節 相關界定



一、時間界定

本研究以「工程惠安女」為主軸，時間上按照惠安女參與工程建造進行界定。主要論述時間，從 1958 年 4 月進行的「水庫首次勘測」起，到 1960 年 2 月「大壩完工」為止。整個論述的時間段，延續到 1965 年灌溉工程結束。這個時間段，剛好貫穿了整個中國大躍進時間。在這個時間段內，國家透過合作社的集體合作的運行以及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動員，促進了國家對婦女身體以及形象的干預。

二、空間界定

空間是惠女水庫工程，以大壩和灌溉區而言，幾乎是大躍進時期的整個惠安地區。以修建的人而言，包括當時惠安縣的紅旗（城關）、東紅（黃塘）、上游（惠南）、飛躍（惠東）四個公社。本研究的空間，主要聚焦在水庫大壩的工程場域，與以往的規訓場域相比，工程場域中的規訓具有隱蔽性、溫和性地特點，它以潛移默化的形勢將國家地規訓意圖灌輸給受訓者，使得民眾更加自覺地接受。正如 Foucault 所說：「愚蠢的暴君用鐵鍊束縛他地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則用奴隸自己的思想鎖鍊更有力地約束他們。」(Foucault, 1972) 本研究選擇一個比較小的空間尺度，從工程來具體觀看惠安女身體經驗。

三、內容界定

工程惠安女，是指貫穿整個惠女水庫建設時期的惠安婦女，她們的身體與形象塑造緊緊與工程緊緊聯繫在一起。國家對惠安婦女的身體規訓及形象塑造以及身體的真實處境是重點描述內容，涉及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婦女身體，複雜的身體塑造過程，以及身體的真實處境狀況。此外，針對婦女身體的特徵進行分析。

第二章 惠女水庫建造與「工程惠安女」塑造的 時空語境



惠女水庫的修建和「工程惠安女」形象的塑造，是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控制的雙重結果。惠女水庫的建設，完成了大躍進時期國家的農業水利建設任務。惠安女成為全國「婦女解放」代表，是特定時空場域、特定歷史條件下，被國家建立起來的典型人物。國家利用惠安女形象和精神感召力向普通群眾宣傳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那麼，惠安婦女為什麼會走上工程建造的場域？並成為工程建造的主力軍？其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為何？本章從國家、地方、工程三尺度，從政治、經濟、性別多個方面呈現惠安女身體規訓的時空場域，以還原「工程惠安女」形象塑造的時空語境。

第一節 水利大躍進：惠女水庫工程建造

一、水利運動的大躍進

新中國建立初期，其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國家高度干預、以國家計劃推動的特徵。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隨即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農田水利建設一馬當先。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性修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集中大力開展一個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¹。1957 年冬 1958 年春，以水利化建設為核心，全國範圍展開了一場全民性農田水利運動，開啟了農業水利的大躍進歷程。這場水利運動的醞釀和發動並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農業糧食的收成，直接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新中國剛建立的最初幾年，中國農業有三年是豐年（1950 年、1952 年、1955 年），兩年是平年（1951 年、1953 年），三年是歉年（1949 年、1954 年、1956 年）。儘管國家每年都有進行一定的水利建設，但是部分地區的旱澇災害一直沒有能得到緩解。1957 年全國各地發生幾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汛情，使得黨中央認為開展新一輪的水利建設具有客觀的迫切性。

¹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568。

表 3 建國初期各年因水旱災造成的糧食減產（單位：億斤）

年份	糧食減產	年份	糧食減產
1949	114	1953	150
1950	52	1954	177
1951	63	1955	128
1952	-	1956	244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編 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業卷）轉引自吳志軍〈試論 1957 年冬 1958 年春農田水利建設運動〉

毛澤東不僅重視大江大河的治理，同時也致力於農村群眾性小型水利設施建造。1955 年下半年，毛澤東在組織編輯《中國社會主義的高潮》一書中，針對山西汾陽縣委的報告寫下如下按語：「興修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縣各區各鄉和各個合作社都可以辦的」²，在這樣的思想引導下，全國各地黨委和農民都樹立起「水利是農業基本建設的中心」意識和「向自然要水」的思想（吳志軍，2006）。

對於大躍進水利運動的得失是現在學術界爭論的主要議題。這場運動建造了許多水利工程，在集體經濟條件下提升了農民抵禦自然風險的能力，對調節水旱災、擴大灌溉面積、提高糧食產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運動也呈現了眾多的問題。時隔三年後的 1960 年 8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反思了運動化的水利建設，認為遍地開花的水利工程是糧食危機的誘因，「這種作法並不是多快好省。而且，佔用勞動力過多，最高額曾高達七千萬人，既增加了糧食的消費，又影響了冬季積肥和田間管理，甚至到農忙季節，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還下不來，影響了春耕播種，影響了當前的糧食生產」³。葛玲（2014）在探討大躍進水利運動與糧食短缺的關係中指出，水利工程中過多勞動力佔用影響了正常的農業生產，工地口糧也加大了糧食消耗，都直接間接地造成後來的糧食短缺（葛玲，2014）。

除此之外，也存在其他問題。在工程質量層面，一些工程後續建設不配套，一些工程長期未能發揮效益；照搬他地經驗，忽略本地生態環境，大亂了原排

²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1。

³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338。

水體系，加重了內澇與鹽鹼化等。在人員組織層面，採用大兵團作戰，勞動強度過大，簡單拼體力，出勤率高，生產效率低；安全意識淡薄，一度出現安全事故；運動期間忽略或者壓抑副業生產，群眾生活水平下降等。誠然，本研究無意要大談大躍進水利運動的得失問題，而是提供一個基本視角來觀看惠女水庫的建造的政治背景，接下來將視野放置到惠安，查看惠女水庫工程的建造狀況。

二、惠女水庫工程的建造

在「向自然要水」的思想指導下，處在「十年九旱」自然現實下的惠安人民積極地加入到農田水利運動的大潮中。為了甩掉「地瓜縣」的帽子，惠安縣委、縣政府先後興建了多處水利設施，以解決水資源問題。截至 1957 年，共新建、改建中小型水利工程 5800 多處，但這些小工程卻連一般的旱災也有無法抵禦⁴。因此，1958 年響應黨「尋找水源，引水灌田，苦戰三年，造福萬年」的號召，惠安開始進行大型水庫建造的謀劃，從策劃到開工僅用了不到半年時間。1958 年 7 月 8 日，惠女水庫工程動工興建，1960 年 2 月 8 日大壩主體竣工，歷時不到三年。樞紐工程由主壩、副壩、溢洪道、輸水涵洞四個部分組成。水庫流域面積 105.8 平方公里，設計洪水位 82.05 米高程，總庫容 1.26 億方。惠女水庫灌溉工程於 1959 年 11 月開始動工，1962 年夏季部分灌區受益，1965 年配套工程基本完工。灌區工程由總幹渠 52.6 公里，兩條幹渠全長 30.23 公里，11 條支渠總長 91.36 公里組成，當時的灌溉渠道通到了全縣的每一個村子，實際有效灌溉面積 8.42 萬畝，灌區主要建築物 144 座，總長度 8099 米，重要建築物包括南塘渡槽、小溪渡槽、埔兜倒虹吸管、嶺頭隧洞。

烏潭座落在晉江縣西北部，大羅溪流域中游，群山連綿起伏，方圓百餘公里，村落分散，人煙稀少。大羅溪向東流向洛陽江注入台灣海峽，每年四、五月或六、七月之間，必定氾濫一次，嚴重威脅沿岸的居民（汪憶今、王順興，1962：18）。正是這樣豐沛又不均勻的水量特徵，讓烏潭成為惠安興建大型水庫的最佳選址。1958 年 4 月初，副縣長鐘盛興，技術員林河元、陳聯奎三人完成勘測，同月「水庫工程黨委會」成立，確立群眾路線，縣長書記王志賢任黨委書記，副縣長鐘盛興任指揮。根據民工吳亞花回憶，1958 年 4 月 13 日第一批開路先鋒進場，主要由躍進公社的五大隊組成，負責開路、搭建設施以及挑炸藥、運送工具（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6 月民工陸續進場，在場民

⁴ 《功在千秋 惠女水库留下一座财富宝库》，泉州晚报，2009/05/14。

工達到 16000 多名。7 月 1 日，進行大壩基礎清理，並且在上游建造圍水壩以及臨時洩洪道。7 月 8 日動土興建，10 月 7 日，開始進行全面填土。

到了 1959 年元旦，大壩高度已經填到涵洞底。春節前夕，進行了「拋衛星，送舊歲」的勞動競賽，破了 8030 方。春節過後的 2 月 17 日，春雨滂沱面臨潰壩危險，全部出動搶險，三、五、八大隊全體指戰員負責圍水壩加高，一、二、四、七大堆負責引水渠加護，六大隊負責臨時洩洪道，同時晉惠任命解放軍 904 與 0855 部隊支援，終於度過了潰壩危機。1959 年 3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視察水庫工地，建議把烏潭水庫改為惠女水庫，理由是：參加這個水庫建設者，有百分九十以上是惠安勞動婦女(汪憶今、王順興，1962:361)。陳伯達親自題字「惠女水庫」、「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向支援惠女水庫建設的人民解放軍戰士致敬」(圖 9)。第二天正好是 3 月 8 日，國際勞動婦女四十九週年紀念日，在慶祝大會上，水庫工程黨委宣布水庫正式命名為惠女水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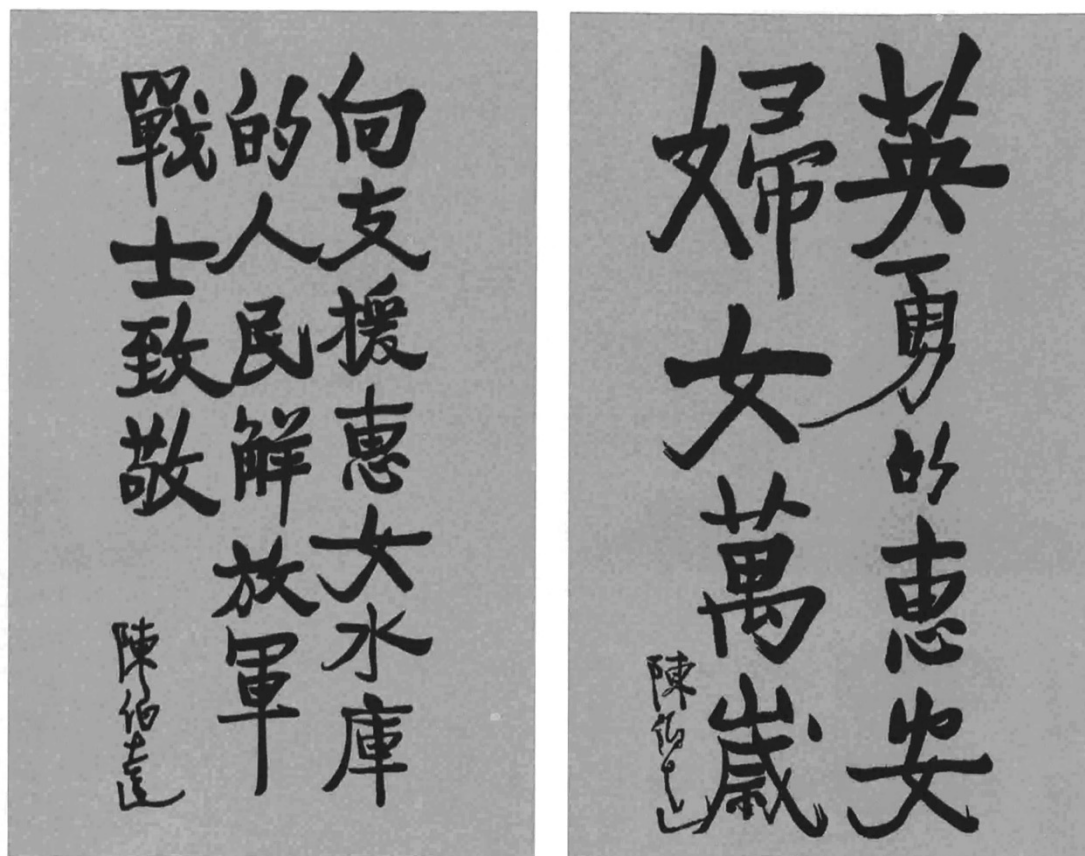


圖 10 陳伯達親筆題字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更名為惠女水庫後，廣大婦女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勞動競賽遍地開花。4 月 13 日六大隊(六營)日產破千方，創下單日 1354 方的最高成績。5 月 1 日，

工地開始實行定額工制，發放工資，並且縮減人員，來提高生產率。但是由於糧食短缺、工作強度過大等種種原因，5月中旬出現了大量的逃跑民工逃跑現象。到了7月，為了應對炎熱的天氣，對作息時間進行了調整，規定：「日班的四點半起床，五點出工，做到十點鐘收工，下午三點半出工，做到七點半收工；夜班則從傍晚七點半出工，做到第二天早晨五點半收工，吃午夜飯時有一個鐘頭的休息時間」。8月29日，農忙一過，上足兩萬民工，並舉行「歡迎新民工參加惠女水庫建庫」誓師大會，全場迅速投入生產。9月28日，架設電線完畢，工地一片燈火輝煌，進行最後的衝刺。1960年2月8日，大壩主體竣工。

表 4 惠女水庫工程建設年表

水庫樞紐工程：1958/7/8~1960/2/8	
水庫灌區工程：1959/11~1965	
1958年	
4月初	選址、完成勘查
4月13日	開路先鋒（五大隊）入場
6月	民工陸續進場，達到16000多名
7月1日	大壩基礎清理、上游建圍水壩
7月8日	動土興建
10月7日	全面填土
1959年	
元旦	大壩高度到涵洞底
2月17日	潰壩危機搶險，解放軍援助
3月7日	中央政治常委陳伯達視察，改烏潭水庫為惠女水庫
3月8日	慶祝第49個國際婦女節，正式命名惠女水庫
4月13日	六大隊日產破千方，創下單日1354方的最高成績
5月1日	實行定額工制，縮減民工
5月中旬	民工逃跑現象嚴重
7月	夏天調整工作時間
8月29日	民工上到20000名，舉行「歡迎新民工參加惠女水庫建庫」誓師大會
9月28日	電線架設完畢，工地通燈光
1960年	
2月8日	大壩主體完工

資料來源：根據《惠女鎖蛟龍》、《惠女水庫巾幗豐碑》以及口述資料整理

從 1958 年 4 月勘察到 1962 年 2 月大壩主體完工，一個巨大的大（二）型水庫在機器機器匱乏的年代，幾乎依靠人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完成。在全國水利運動的大潮下，惠安女譜寫下了自己的奇蹟。目前，水庫分別於 1977 年、2003 年、2007 年先後三次進行除險加固，是泉州第二大水庫，也是福建八座大型水庫之一，承擔者南安部分地區、洛江區河市鎮以及惠安 12 個鄉鎮的供水、農業灌溉等任務，每年發電量 320 萬度，繼續哺育著惠安人民。

表 5 惠女水庫重要工程概況表

樞紐工程	
主壩	位於馬甲鎮彭殊村，為粘土心牆壩，壩頂長 350 米、底寬 301.6 米、頂寬 9 米、壩高 52.5 米、壩頂高程 83.32 米，設防浪牆一道，高 1 米。
副壩	位於洪瀨鎮，為均質土壩，壩頂長 192 米、底寬 45 米、頂寬 5 米、壩高 10.8 米，壩頂高程 83.32 米。
溢洪道	位於右岸山坳處，為開敞式無閘控制。平頂段長 300 米、寬 50 米，陡坡段長 135 米、寬 30 米、堰頂高程 75.75 米，設計最大洩洪量 1150 立方米/秒，末端為挑流消能。
輸水涵洞	共 2 條，每條長 145.6 米。其中一條有壓鋼筋混凝土圓管（建設電站時套改鋼管），另一條為有壓石砌拱涵（除險加固時，套改為有壓鋼管），設計流量為 10 立方米/秒。進口設上下兩排放水孔，共四孔。放水設備為雙臂式鑄鐵轉動門蓋，採用 2 太各 5 噸手拉葫蘆進行啓閉。
灌區工程	
南塘渡槽	全長 180 米，淨長 108 米，每跨跨距 20 米，橋墩高 35 米，頂寬 3.05 米，設計流量 16 立方米/秒。
小溪渡槽	全長 120 米，分 4 跨，每跨跨距 20 米，橋墩高 16.4 米，設計流量 16 立方米/秒。
埔兜倒虹 吸管	全長 747.25 米，其中跨河段 168 米，雙管並行，管內徑 1.8 米，水頭 32.3 米，設計流量 14 立方米/秒。1962 年 11 月將木質管道改為鋼筋混泥土管，跨河段改為鋼板管。
嶺頭隧洞	全長 1032 米，其中土質段 450 米，採用條石拱形襯砌，斷面 2.4X2.4 米；岩石段 557 米，斷面 2.8X2.8 米，設計流量 10 立方米/秒。

資料來源：根據《惠女鎖蛟龍》、《惠女水庫巾幗豐碑》整理

第二節 婦女大躍進：惠安女工程參與



一、婦女運動的大躍進

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認為，「在任何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1991）。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將廣大婦女的解放作為基本的政治目標之一。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推動國家現代化時期，最廣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不可或缺，必須重視廣大婦女的作用。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走向高潮後，隨著農業生產規模逐漸擴大和經營部門增多，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初見端倪，這勢必要求拓寬勞動力來源。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婦女是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挖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⁵。

1956年，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黨一貫地關懷和支持婦女解放運動，把婦女的徹底解放看做我們事業的重大目標之一」⁶，這次大會確定了婦女工作的指導思想：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建設，以此爭取婦女的徹底解放。鄧穎超在大會上作了《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和發揮廣大婦女群眾的力量》的發言，「婦女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廣泛地動員婦女從各個方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增強社會主義的力量，爭取婦女徹底解放的關鍵」，其進一步指出，「必須有計畫地吸收婦女參加各種社會勞動，應當按照整個勞動力調配計畫，根據婦女的特長和特殊情況恰當地使用婦女勞動力，達到人盡其才」⁷。婦女工作一直以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重點工作，中共八大確立了動員廣大婦女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

1958年大躍進正式發動以後，國家採取勞動密集型戰略加快經濟發展，勞動力匱乏情況凸顯，動員婦女參加勞動生產成為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唯一現實選擇。婦女工作迅速確立貫徹總路線、實現大躍進的中心路線，將廣大婦女納入大躍進的浪潮。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曹冠群要求各級婦聯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以勞動婦女為基礎積極開展工作，並提出了「向婦女全紅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促進婦女的思想解放；積極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工農業生產和各項社會主義建設，參加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控

⁵ 《中共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675。

⁶ 《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65：90。

⁷ 《中國婦女運動文獻匯編（1949-1983）》（第二冊）北京：中國婦聯出版社 1988：262。

掘婦女潛力，提高婦女的勞動潛能；要有計畫有步驟地引導群眾組織生活，發展集體和社會服務事業，進一步解放婦女勞動力」的三大任務⁸。廣大的婦女被動員參加到工農業生產，各行各業展開了「以女替男」的「婦女化」運動，開啟了婦女工作的大躍進，農村幾乎 100%的地婦女被發動和組織起來參加農業生產⁹。

1960 年開始，《中國婦女》社論要求全國婦女，高舉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旗幟，發揚「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幹得好」的英雄氣概，爭取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更多的貢獻。社論認為，1958 年和 1959 年全國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的成就，充分證明了「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幹得好」，無論在城市工業戰線，還是農業展現上，婦女都撐起了半邊天。在工業戰線上，女工佔 60%的紡織工業中，展開了高產優質、高功效、低成本的勞動競賽，為國家創作和節約了巨大財富；過去很少婦女參加的行業，現在都有許多婦女和男子並肩作戰。在農業戰線上，1958 年的農村婦女從原來的輔助勞動一躍而成為農業身顫戰線上的一支主力軍，婦女完成的工作日，一般佔總工作日地 35%，有的地區達 45%以上¹⁰。

以馬克斯主義婦女觀作為指導思想，鼓勵婦女通過勞動生產獲得自身的解放，婦女運動的大躍進是中共在生產任務和婦女任務上的共同落腳點。全國婦女大躍進運動建構了「婦女半邊天」、「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幹得好」的婦女解放氛圍，廣大的婦女被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場域。

二、以婦女為主力的水庫工程建設

惠安婦女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參加到農田水利生產中，並成為惠安水庫工程的建設主力軍。早在 1958 年之前，惠安各個合作社便組織廣大婦女社員相繼建設了後吳水庫、稜溪水庫等一批中小型水庫，對於戰勝乾旱，確保農業高產穩收起了極大的作用，開啟了惠安婦女參與水利工程的前奏。而惠安水庫的修建，將當時絕大部分的惠安婦女納入到工程建設的場域當中，更是創造了「我國歷史上空前的主要由婦女建成的大型水庫」¹¹。

⁸ 《中國婦女運動文獻匯編（1949-1983）》（第二冊），北京：中國婦聯出版社，1988：373-374。

⁹ 張靜如編《中國共產黨通志》（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587。

¹⁰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匯編（1949-1983）》（第二冊），北京：中國婦聯出版社，1988：392。

¹¹ 《惠安頌》，福建日報，1963/6/4。

根據《惠安縣水利電力志》的不完全統計，共 41000 多名民工參加到惠女水庫工程與灌溉工程，其中女性占 35000 多名，達到 85% 以上。參加大壩建設的民工大約 1.5 萬人，其中女性約 1.3 萬人，超過 86% (曾文法，蔡思成，1992：34)，「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則稱「在建設惠女水庫的四萬員工當中，婦女勞力佔了百分九十左右」¹²。以 1964 年全縣女性總人口 316909 人計算 (陳萬里，1998：179)，12% 的惠安婦女參與到水庫工程建設中。婦女參與到農業生產，是大躍進時期政治的需求，也是生活的需求，然而以婦女作為主力軍的水利工程建造，在全國乃是罕見，這是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惠安的自然現實、性別分工特性的多重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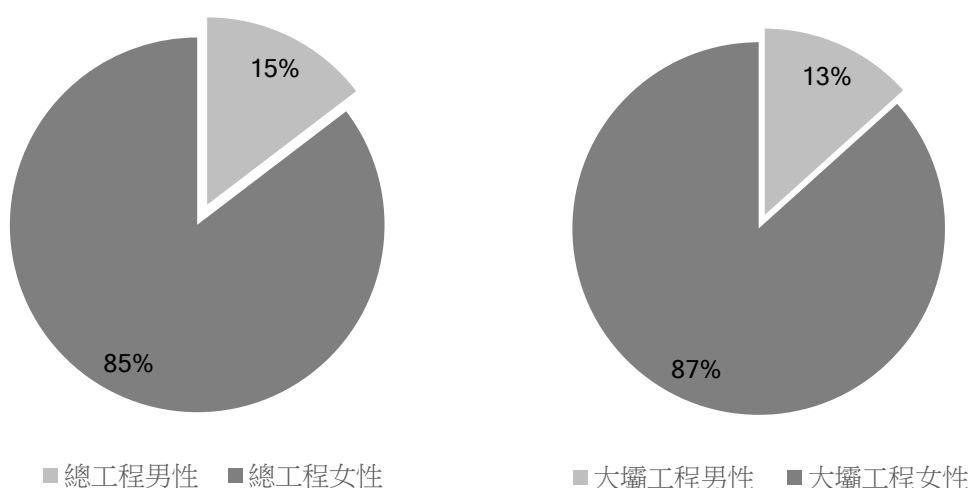


圖 11 惠女水庫工程民工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中央的層次，國家「婦女解放」的工作，在全營造起「婦女半邊天」、「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幹得好」的政治氛圍，在大躍進運動中，婦女解放運動同樣席捲了全國廣大的婦女，惠安婦女也不例外，婦女開始走上各個行業的生產場域，惠安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在地方層次，惠安「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讓廣大的惠安人民飽受貧窮的折磨。海邊鹽鹼地，乾旱風沙長年肆虐，水土流失一場嚴重，展眼望去，到處都是「臭頭山」(指山上沒有林木)。在這貧瘠的土地上，水稻無法栽種，只能種地瓜來充飢 (《福建日報》1963 年 6 月 4 日)。長期以來，惠安被稱為「地瓜縣」，惠安的閩南語腔調，被稱為「地

¹² 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1960 年 1 月立於惠安縣城科山公園內。

瓜腔」，意即地瓜吃多形成的腔調，其背後帶著「貧窮」的諷刺意味。「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與貧窮的生活現實，讓惠安人民有著改造自然擺脫「地瓜縣」臭名的願望，同時，也造就了惠安「男工（漁、商）女耕」、男性勞動力長期在外的社會性別分工傳統。

貧瘠的土地與貧窮的生活迫使大量的男性勞動力背井離鄉，到處謀生，甚至漂流海外，從事石匠、泥水匠、漁工等工作。根據 1937 年的相關數據顯示，惠安男性業農者佔職業總人口的 38.2%，業工者佔 26.4%、業商者佔 21.0%，業漁者佔 9.7%，其它則佔總職業人口的 4.7%¹³。從以上的數據來看，惠安男性從事非農（工、漁、商）的比例高達 61.8%，是業農者的 1.6 倍，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比例是非常高，十分罕見。為了謀生，傳統的惠安婦女不僅為繁重的家務和兒女的教養而日夜操勞，並且從事農業生產，肩負田間勞動重擔。這造就了「鄉中男人皆外出業工，女者在家耕種」的家庭經濟模式(傅惠玲,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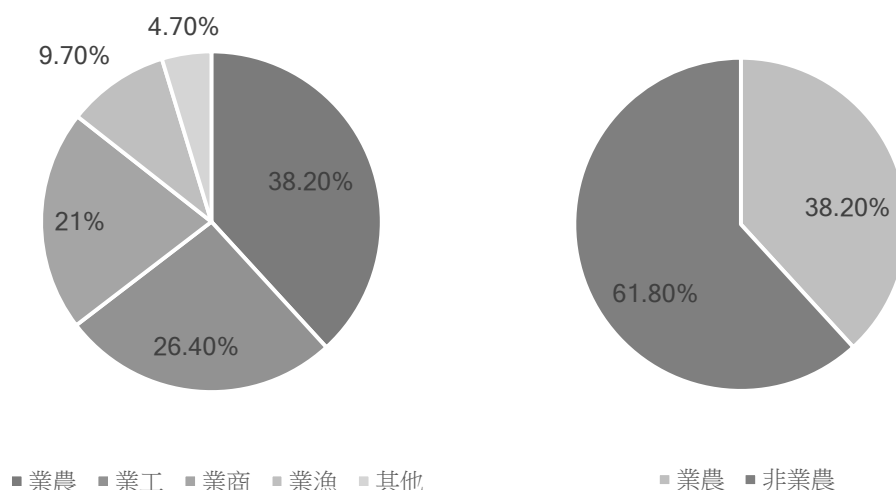


圖 12 1937 年惠安男性職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於男性的大量外出，造成了惠安許多地方的性別失衡。人民公社化以後，惠安婦女更是成為各個公社的主要生產成員，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譬如惠安金山邊小隊「在家勞動力只有 176 個，起中婦女勞動力 159 個」¹⁴。惠安東透生產隊「全隊七十四個全半勞動力中，除了一外派支援的男性幹部外，

¹³ 《福建統計年鑑》1947：115。

¹⁴ 《關心婦女集體隊長莊細扣》，泉州日報，1961/02/24。

參加生產的全部都是女性」¹⁵。1959年三八婦女節前夕，福建日報時論指出「惠安縣婦女在各個戰線上發揮巨大的作用。在農業生產上，婦女是主力軍，很多地方農活幾乎都由婦女擔負……去年（1958年）全縣參加興修水庫中，婦女勞動力占百分八十以上」¹⁶。因此，惠安婦女成為水庫工程建設主力軍，是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惠安的自然現實、性別分工傳統多重疊加作用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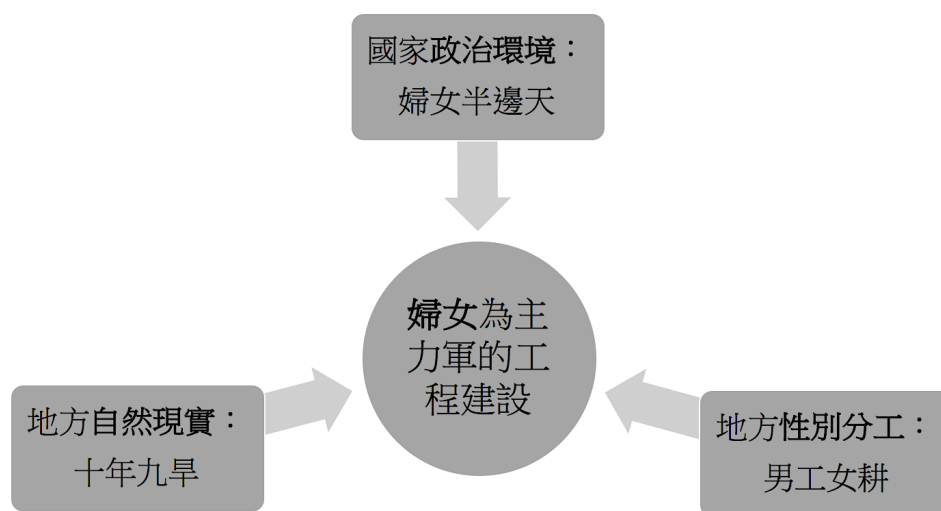


圖 13 婦女成為水庫工程建設主力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儘管如此，女性並沒有成為水庫建設的主導者。一句「除了領導和技術員之外，其餘幾乎都是女性」（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2/17）道出了「男性主導」、「女性主體」的工程性別特質。從惠女水庫指揮機構組成來看，在工程指揮部級別，正副指揮 7 人，只有 1 個女副總指揮，指揮部其他領導 13 人，只有婦聯和青年部分有 2 個婦女。在民工大隊級別，八個大隊 19 位正副領導中，只有 2 位婦女¹⁷。從上面的數據來看，惠女水庫工地大隊及以上領導 39 人，婦女只佔了 5 人，呈現出嚴重的「男性優勢」特質。根據楊亞嘗回憶，「每個中隊都有一個婦女當副指導員，專門負責管理婦女的生理問題」（楊亞嘗口述紀錄 2017/07/15），在中隊級別中，都有配備一個女幹部，這種「男正女副」的刻意安排，沒有改變指揮反而更凸顯了男性的主導性。

¹⁵ 《紅色娘子軍生產隊》，泉州日報，1964/06/25。

¹⁶ 《惠女幹勁衝破天》，福建日報，1959/3/7。

¹⁷ 蘇金伙筆記，《惠女水庫工地各級領導》，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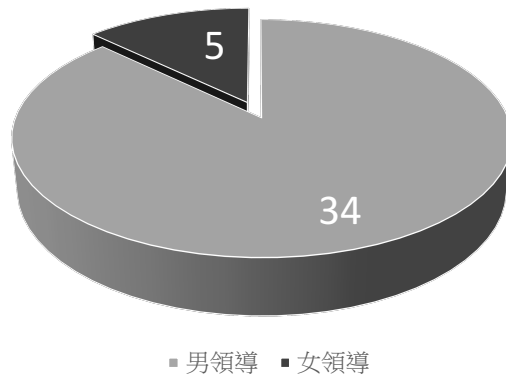


圖 14 惠女水庫指揮機構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女性主體」與「男性優勢」相映成趣，展示了惠女水庫的基本定位，即這是一個由國家發起，在男性領導和組織下，以女性為主體建設起來的公共工程（汪煒偉，2009：25）。

第三節 工程惠安女：空間再現與婦女解放

惠女水庫的建設，在調動婦女參與工程建設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從婦女動員的廣泛和社會影響上來看也是空前的：競賽中一批婦女獲得了國家勞動模範、紅旗手等極高的社會聲譽，一些人還被選拔為國家正式幹部進了縣、地級領導班子。她們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要由婦女為主力建成的大型水庫，是婦女運動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她們是惠安婦女的光榮，也是全國婦女的光榮。工程建設中形成的「惠女精神」從惠安走向全世界，從過去一直影響至今，成為全縣的精神。當廣大的惠安婦女投入工程場域的那一刻起，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身份，甚至她們的命運都緊緊地與惠女水庫工程聯繫在一起，因此，本節提出「工程惠安女」的概念，從時間和空間向度上交代「惠女」的空間再現，意圖更加凸顯論述中的惠安婦女與工程的不可分割性。

一、「工程惠安女」與惠女精神

惠女精神是什麼？惠女精神從何而來？首先，是惠女水庫的命名。1959年3月7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福建省長魏金水視察惠女水庫工地，提出改「烏潭水庫」為「惠女水庫」，並親自題字「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隔

日3月8日婦女節慶祝大會上，正式命名為「惠女水庫」，從此「惠女」二字，不再單純指的是惠安地區的婦女，更是一種政治上婦女解放的宣稱。國家高層對惠女水庫的關注，並非僅因為它是一座地方性的大型水庫，更是因為工程上所體現出來的婦女特質。1960年1月，惠安縣政府於縣城科山腳下，修建「治山治水紀念碑」，以紀念建國十年間，惠安人民改造自然獲得的巨大成就，惠女水庫的建設以及惠女解放成為重要的內容，其碑文對惠安的婦女解放工作以及惠安婦女給予了高度的肯定。

解放了惠安婦女，在改造自然的鬥爭中，充分發揚勤勞勇敢的優良傳統，特別是人民公社化後，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她們得到徹底解放，歡欣鼓舞，投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行列，成為治山治水的主力軍。建設惠安水庫的四萬員工中，婦女勞動力佔百分九十左右。為此特將「烏潭水庫」改為「惠女水庫」以示表彰。她們發揮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運土打夯，劈山炸石，駕駛及其，樣樣皆能，因而獲得全國婦聯的嘉獎。（治山治水紀念碑節選 1960/01）

1960年2月惠女水庫大壩完工，國家水利電力部、全國婦女聯合會相繼發來賀電，高度肯定了惠安婦女的工作。水利電力部賀電指出，「惠女水庫大壩的勝利建成，是在各級黨政正確領導下，全體職工英勇奮戰的輝煌功績，是廣大婦女隊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貢獻」¹⁸。在全國婦聯和賀電中，更是直接針對婦女工作，婦女解放進行表揚。

修建這樣的大型水庫，不僅實現了惠安人命改變農村面貌的宏圖大志，而且顯示了惠安婦女不屈不饒的英雄氣概，用「惠女」二字命名水庫是全國人民對英雄的惠安婦女勞動功績的最高獎賞，是惠安婦女的光榮，也是全國婦女的光榮。惠女水庫已為我國婦女在水利建設上樹立了一面紅旗，充分證明了在黨的領導下，解放了的中國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能幹地好。（中話全國婦女聯合會賀電，1960/2/9）

顯然這兩則來自國家層級賀電，有意婦女因素放在最顯要的位置，證明了國家增加惠女水庫工程的婦女特質的用心良苦，與陳伯達的親自命名遙相呼應。

¹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賀電，1960/2/8。

從陳伯達的造訪與親自命名，到國家大壩建成的兩則國家層級的賀電，將惠安女與工程僅僅聯繫在一起，催生了「工程惠安女」，使其成為全國婦女解放的代表。工程完工後，壩體上的鑲字「惠女水庫」、「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1958.7-1960.3」、「萬女鎖蛟龍」（如圖），是惠女工程婦女特質的最佳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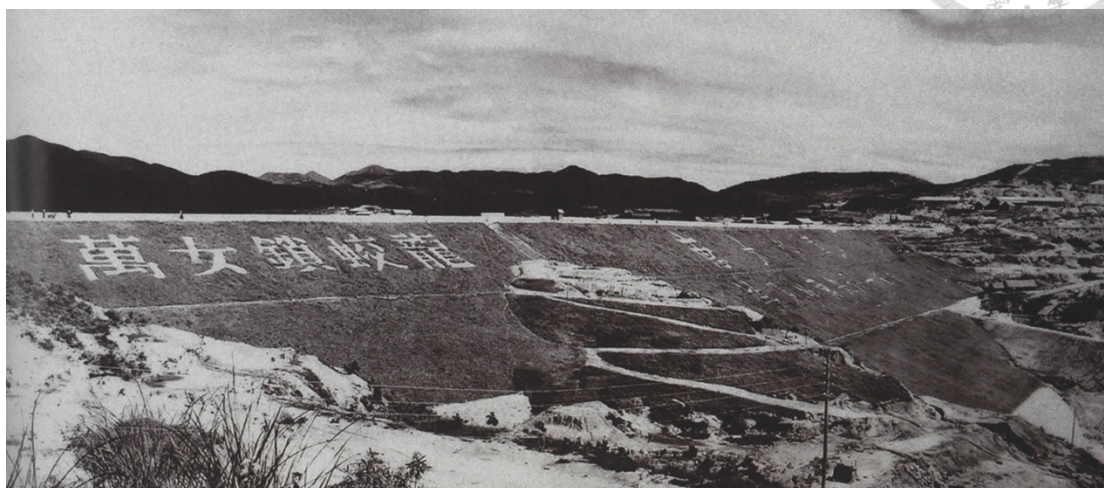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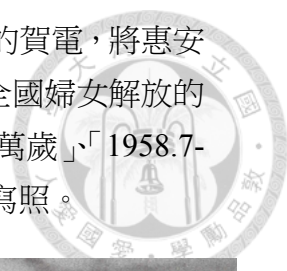


圖 15 1960 年代水庫大壩及壩體鑲字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圖 16 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上被抹除的「惠女」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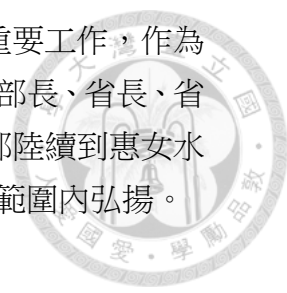
1963年6月4日福建日報社論《惠女頌》指出，「惠女水庫的勝利，是黨地勝利，是三面紅旗的勝利，也是惠安婦女和惠安人民的雄心壯志和艱苦奮鬥精神的勝利……讓『惠女精神』發揚光大吧，讓這種革命精神成為全省婦女的精神、全省人命的精神，並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鉅鬥爭中發揮偉大的作用，這是「惠女精神」首次被提出來，但這個時候惠安精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偏向指「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然而，隨著文革中陳伯達被打倒，與之相關的人、事、物都受到了很大的牽連，「惠女」二字也在文革中被抹掉了。除了「惠女水庫」改名「惠安水庫」外，治山治水紀念碑的「惠女」以及相關內容也直接被抹除（圖 15）。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贈送給各國代表的，正是刻有5位惠安女形象，並由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主席、國務委員彭佩雲題詞「自強不息」的紀念章。2003年到2006年之間，在惠女水庫除險加固過程中，「惠女水庫」的大字才重新出現在惠女水庫大壩上。期間整理出大量的歷史資料，籌備建立惠女水庫紀念館。

2009年4月29日，時任泉州市委書記徐鋼視察惠女水庫工程時，驚嘆惠女水庫工程，同時也對惠安女興建水庫的精神所感動，重新對「惠女精神」進行闡述。他指出從惠女水庫建設中所反映出來的惠女精神，實質上是泉州人愛拼敢贏精神的生動寫照，是泉州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具有重大地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5月8日，中共泉州市委做處《關於開展「弘揚惠女精神，提振創業激情，促進科學發展」活動的建議，在全市發起弘揚學習「惠女精神」的活動，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要把學習和弘揚惠女精神作為當前涉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地一項重要內容，緊密聯繫實際，力戒形式主義，使惠女精神成為推動泉州新一輪創業的精神動力」，在全市形成「弘揚惠女精神，提振創業激情，促進科學發展」的良好氛圍。

「惠女精神」，就是1958年到1960年，以13000多名惠安婦女為主力軍的幹部群眾建設烏潭水庫，後稱惠女水庫，所體現出來的「艱苦奮鬥、尊重科學、無私奉獻、拼搏創業」精神。（中共泉州市委 關於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提振創業激情 促進科學發展」的活動決定 2009/5/8）

隨後，全市各級黨組織展開了「惠女精神」的學習熱潮。根據惠女水庫管理局壩區管理站的工作人員回憶，「惠女精神那幾年，非常忙，一天接待的團數無數，宣傳部專門去學校調兩個老師，普通話比較好的做宣講員」（駱明熙訪談紀錄，2017/02/17）。除了泉州市以外，2009年福建省婦聯印發了《福建婦聯關於在全省廣大婦女中深入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巾幗建功海西」活動地決

議》，要求全省各級婦聯把學習和弘揚惠女精神作為婦聯一項重要工作，作為推動海西又好又快發展的精神動力。2009年包括時任水利部副部長、省長、省人大副主任、副省長、省水利廳廳長在內的一大批部廳級別幹部陸續到惠女水庫調研，惠女水庫以及其所承載的「惠女精神」再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弘揚。



確實是獨特的人文景觀，獨特的文化呈現，獨特的歷史意義。尤其是惠安女走出門，搞一番事業，是一個很好的註腳。(駱明熙訪談紀錄，2017/02/17)

表 6 惠女與惠女精神形成的重要事件表

時間	事件
1959/3/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福建省長魏金水，視察惠女水庫工地，決定改「烏潭水庫」為「惠女水庫」，並親自題字「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
1959/3/8	惠女水庫指揮部正式宣布，命名水庫為「惠女水庫」
1960/1	惠安縣委、縣政府決定建立「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並在碑文上對惠安婦女參與惠安治水進行高度的肯定
1963/6/4	《福建日報》社論《惠女頌》首次提出惠女精神
1972	由於陳伯達被捕，大壩上以及惠安治山治水紀念碑等的「惠女」二字相繼被抹除。水庫改名「惠安水庫」。
1995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贈送給各國代表的，正是刻有 5 位惠安女形象，並由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主席、國務委員彭佩雲題詞「自強不息」的紀念章。
2003-2006	「惠女水庫」的大字重新出現在惠女水庫大壩上。設立「惠女水庫紀念館」
2009/4/29	中共全州市委書記徐鋼蒞臨惠女水庫調研
2009/5/8	中共泉州市委印發《關於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提振創業激情 促進科學發展」的活動決定》
2009/7/6	福建省長黃小晶、省人大副主任莊先、副省長葉雙瑜蒞臨惠女水庫指導工作
2009/ 9/14	福建省婦聯印發了《福建婦聯關於在全省廣大婦女中深入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巾幗建功海西」活動地決議》
2009/9/25	水利部副部長矯勇、省水利廳廳長楊志英蒞臨惠女水庫檢查指導安全生產工作

資料來源：根據《惠女鎖蛟龍》、《惠女水庫巾幗豐碑》整理



二、惠女水庫的空間再現

「惠女」、「惠女精神」這樣的榮譽，全都從「惠女水庫」的工程場域中生產出來，無疑，這樣的惠安女是「工程」的「惠安女」。那麼水庫工程空間上是如何再現「惠女」的呢？

(一) 惠女水庫紀念園區

從水庫工程本身到水庫紀念館，各種空間無不再現著「惠女」當年的勞動場景，以及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對於這個空間目前並沒有沒有統一的命名，本研究援用「水庫紀念館」的名字暫且稱其為「惠女水庫紀念園區」。如圖 16 所示其範圍包括庫區、大壩、壩頂廣場、壩區管理站、水庫紀念館以及紀念廣場。水庫和大壩為工程的主體，壩體上的鑲字與壩頂廣場構成的主要的展示空間。廣場背後為壩區管理站，順著壩區管理站的路往裡邊向山上的路上坡，即可到達紀念廣場，水庫紀念館位於廣場的最高點，也是整個庫區最高的位置，由原來的防汛倉庫改建，水庫紀念館的右側則為「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辦公樓遺址」。

大壩：第一背水坡、第二背水坡使用河卵石鑲字「惠女水庫」、「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1958.7-1960.3」、「萬女鎖蛟龍」，完成於 2009 年 5 月。

壩頂廣場：廣場背景為大型的「新民歌牆」，刻當年的勞動民歌。廣場中間主體是白色花崗岩底座與青門石「惠女扛石」雕塑，意在再現當年惠女從陳德嶺翻越河格嶺，搬運石頭的場景。底座的正面雕刻「惠女水庫」字樣，背面刻「惠女水庫碑記」，兩側分別刻「惠女水庫總幹渠節水改造工程碑記」、「惠女水庫除險加固工程碑記」，完成於 2005 年 7 月水庫除險加固時期。

壩區管理站：壩區站大門標示「惠安縣惠女水庫區壩區站」，旁邊圍牆上為金屬鑲字「艱苦奮鬥、尊重科學、無私奉獻、拼搏創業」的惠女精神。底下廣場由壩區站辦公大樓和倉庫組成。順著樓梯往後面山上走，為後勤大樓和宿舍大樓。

紀念廣場：位於宿舍大樓的左側與後方高處，主要由原來的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的核心區組成。第一層紀念牆，鑲惠女精神「艱苦奮鬥、尊重科學、無私奉獻、拼搏創業」字樣。第二層紀念牆，刻《中共泉州市委 關於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提振創業激情 促進科學發展」的活動決定》內容。正後方為「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辦公樓遺址」、「水庫紀念館」。除此之外，在紀念牆的左側

高低，自下而上，放置不同時期的勞動勳章大型石刻。最高點名為「守望」的大型「惠女」石雕取代原來指揮部的指揮中心，守望著惠女水庫。紀念廣場的建築從 2005 年開始至今，陸續完成。

大壩：第一背水坡、第二背水坡使用河卵石鑲字「惠女水庫」、「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1958.7-1960.3」、「萬女鎖蛟龍」，完成於 2009 年 5 月。



① 壩體鑲字



② 惠女扛石雕塑



③ 壩區管理站大門



④ 紀念牆區



⑤ 紀念勳章區



⑥ 惠女守望雕塑



⑦ 惠安水庫鑲字區



⑧ 惠安水庫紀念館



⑨ 工程指揮部遺址

圖 17 惠安水庫主要紀念物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壩頂廣場：廣場背景為大型的「新民歌牆」，刻當年的勞動民歌。廣場中間主體是白色花崗岩底座與青門石「惠女扛石」雕塑，意在再現當年惠女從陳德嶺翻越河格嶺，搬運石頭的場景。底座的正面雕刻「惠女水庫」字樣，背面刻「惠女水庫碑記」，兩側分別刻「惠女水庫總幹渠節水改造工程碑記」、「惠女水庫除險加固工程碑記」，完成於 2005 年 7 月水庫除險加固時期。

壩區管理站：壩區站大門標示「惠安縣惠女水庫區壩區站」，旁邊圍牆上為金屬鑲字「艱苦奮鬥、尊重科學、無私奉獻、拼搏創業」的惠女精神。底下廣場由壩區站辦公大樓和倉庫組成。順著樓梯往後面山上走，為後勤大樓和宿舍大樓。

紀念廣場：位於宿舍大樓的左側與後方高處，主要由原來的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的核心區組成。第一層紀念牆，鑲惠女精神「艱苦奮鬥、尊重科學、無私奉獻、拼搏創業」字樣。第二層紀念牆，刻《中共泉州市委 關於開展「弘揚惠女精神 提振創業激情 促進科學發展」的活動決定》內容。正後方為「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辦公樓遺址」、「水庫紀念館」。除此之外，在紀念牆的左側高低，自下而上，放置不同時期的勞動勳章大型石刻。最高點名為「守望」的大型「惠女」石雕取代原來指揮部的指揮中心，守望著惠女水庫。紀念廣場的建築從 2005 年開始至今，陸續完成。

惠女工程指揮部辦公樓遺址：工程指揮部辦公樓建於 1960 年，佔地面積 450 平方米，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牆體為土石混夯，樓房分為上下兩層，一層為杉木樓板，二層人字型緣木屋架，房間分南北兩排，隔廊相向。水庫建設期間，改樓房是工程指揮部辦公場所，水庫工程竣工後為壩區管理站辦公樓，是惠女水庫工程建設的歷史見證。然而，時光荏苒，歲月流逝，歷經 40 多年的風雨侵蝕，樓房已是瓦飛牆裂，只剩下殘垣斷壁。2003-2006 年，水庫除險加固中，水庫管理單位考慮到該樓房已無修復價值，決定拆除，保留北牆，作為對惠安婦女曾有過的激情燃燒歲月的一份追憶，同時在原址上新建「惠女水庫紀念館」和「惠女水庫灌區工程分佈圖」作為紀念。

惠女水庫紀念館：於 2005 年間落成，由原來的防汛倉庫進行改造，裡面展示惠女水庫工程的測量圖、工具以及歷史資料等，為核心紀念建築物。2015 年 8 月，惠女水庫開始進行擴建。

獨特的建造歷史，獨特的文化底蘊，惠女水庫背後所承載的獨特事實和廣大惠安婦女激情燃燒的歲月，讓整個園區變得意義深重，它承載了過去，也激勵著後繼。它紀錄了惠安婦女的國家化歷程，也紀錄了隱藏在光榮背後的汗水和淚水。

(二) 命名演變與大壩鑲字

說到惠女水庫的空間再現，大壩上的鑲字一定不能忽略，其演變正是整個「惠女」政治歷程的最佳見證。在 1958 年 7 月修建之前以及修建初期，水庫援用原來的名字—「烏潭水庫」，一直到 1959 年 3 月，中央政治常委視察工地，改名為「惠女水庫」。1962 年 2 月大壩主體工程竣工，當時大壩背水坡第一坡、第二坡分別用河卵石鑲嵌「惠女水庫」、「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萬女鎖蛟龍」以及「1958.7-1960.3」字樣，所採用的正是 1959 年 3 月陳伯達視察時候的題字。1972 年，由於陳伯達入獄這些字樣被拆除，並同時把「惠女」的「女」改為「安」更名名為「惠安水庫」，「惠女」二字從水庫工程中消失，成為政治的禁語。1973 年，仍舊起用最早的名稱「烏潭水庫」，直到 1994 年 6 月才又恢復原名「惠女水庫」。

2003 年到 2006 年惠女水庫開始實施除險加固工程，期間水庫管理單位才用種植灌木的方式，做出「惠女水庫」字樣的造型。2009 年市委書記惠女水庫調研後，要求恢復大壩背水坡的鑲字歷史原貌。在惠安縣委、縣政府和市縣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惠女水庫管理局立即付諸實施，2009 年 5 月底動工，同年 7 月中旬完成修復工作，同時在大壩東北端設置大型紀念牆、並放置大型的惠女石雕，以兩個惠安女抬石的形象反映當年的勞動場景。「惠女」二字的出現、消失、再現見證了整個「惠女」以及「惠女精神」的發展歷程，重新再現了工程的婦女特質，再現了當年廣大惠安婦女在大壩工程艱苦奮鬥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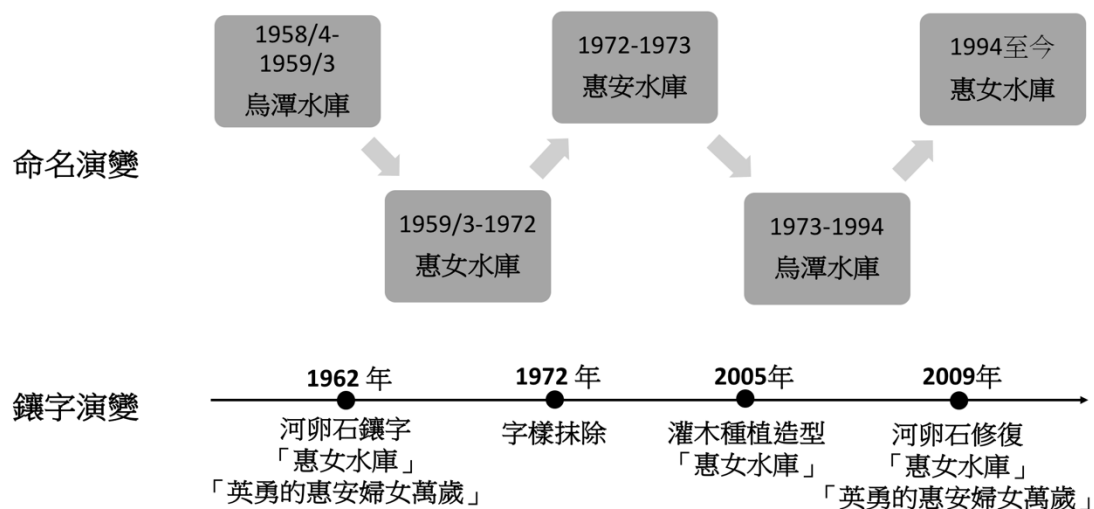


圖 18 水庫名稱與鑲字演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 惠女水庫紀念館

2003 年，惠女水庫開始進行除險加固，期間工作人員在去翻水庫的舊倉庫過程中，發現很多珍貴的歷史資料，並且發現當時水庫工地的宣傳幹事蘇金伙保存了眾多的照片資料。於是，在惠女水庫管理局局長的支持下，由惠女水庫管理局工管股的駱明熙帶領下，改舊防汛倉庫為「惠女水庫」紀念館。除了對於歷史資料的保護，駱明熙的母親也是水庫工程的建設者，並榮獲二等功臣。

在除險加固過程中，翻水庫的舊倉庫發現很多資料。另外，有個老人叫蘇金伙，是當時的宣傳幹事，保存了很多的資料。我對這些資料非常感興趣，想要保護，並且我們局長對這個方面也是非常重視。剛好當時有些項目，有些資金。那間其實是利用當時的防汛倉庫，改建成我們的紀念館。(駱明熙訪談紀錄，2017/02/17)

豐富的歷史照片再現了當年惠安婦女艱苦奮鬥的種種場景。一進門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惠女水庫空拍圖，前方的玻璃櫥櫃中擺放著當時的勞動勳章、地圖、測量工具等。牆上掛著當時的工具、以及穿著的衣物，將記憶重新帶回當年。循著階梯往上，上百幅的黑白照片，一張張稚嫩的女孩的臉進入我們的視線。上面的她們面帶微笑，卻無法掩飾背後默默流過的無數汗水和淚水。雖然小而簡易，但是「惠女水庫」紀念館的設立，將其背後所承載的歷史事實以及歷史精神重新呈現，是福建第一個水庫紀念館，引起了很大的關注，迅速蔓延，促成了「惠女精神」的形成。2015 年 8 月，惠女水庫開始進行擴建，其外觀重新用大型的鋼構掛起巨幅的婦女勞動的「萬女鎖蛟龍」場景，直接再現當年的勞動場景。

紀念館建成後，局部影響，引起市裡、省裡，包括引起很多老水利專家，老水利系統幹部的重視，最後引起市政府以及省組織部部長的重視，後來是市政府市長徐鋼，在全市發起學習惠安女精神的運動。從市到省，省到中央，全國婦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很多人都來到這裡參訪，整個惠女水庫精神就是這樣形成的。(駱明熙訪談紀錄，2017/02/17)

惠女水庫紀念館的建設雖屬偶然，但是其所再現的歷史卻是另人動容的。確實，惠女水庫背後所承載的惠安婦女的經歷既偉大又心酸。然而，我們在這個空間中看到的大多是偉大的一面，那些心酸都被隱匿在微笑背後。如同 2013 年王荷棗阿婆重返水庫的感慨「能上照片的都是當時那些幹部，那些積極分子，哪能輪到我們」（王荷棗口述紀錄，2013/10/6）。有再現總有隱匿，正是因為再現的存在，才側面反映了隱匿的存在，希望這個空間未來能夠讓更多隱匿的現實能夠被看見。從惠女水庫工程，到世界婦女大會成為全世界著名的女性形象，從空間實體到形象塑造，「惠女」的再現同惠女水庫工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惠安婦女從普通的農村婦女通過水庫工程走上婦女解放歷史的舞台，成為「工程惠安女」，成為世界知名的婦女解放代表，其背後涉及複雜的國家與地方層級的政治、經濟、社會現實。在國家尺度，大躍進水利運動，強調又多又快地建設水利工程，改變鄉村落後面貌，盲目追求數量和速度。大躍進正式發動後，婦女工作以貫徹總路線、實現大躍進為中心，並營造出「婦女什麼也能幹，什麼幹地好」的社會氛圍，婦女被等同於人力資源，被動員起來參加工農業生產。在地方尺度，惠安「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和貧窮的生活現實，讓惠安人民懷有改造自然的雄心壯志。同時，貧瘠土地所造成的「男工（漁、商）女耕」、「男外女內」的社會性別分工傳統，讓惠安婦女成為在地的主要勞動力，擔負其合作社的主要生產工作。大躍進時期的惠女水庫工程建造及「工程惠安女」形象的塑造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以國家權威確定了水庫的婦女特質，讓「工程惠安女」成為「婦女解放」的代表，讓惠女水庫成為「婦女解放」銘刻的最佳載體。

本章是在全國大躍進的視野下，聚焦惠安水利工程建造，從宏觀層面展示「工程惠安女」形成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以及交代惠女水庫的空間再現與惠安女形象塑造過程。以往關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中國大躍進研究通常離不開一些重大的「革命敘事」，本研究則選擇了一個小小的側面「惠女水庫」工程建設，以「工程惠安女」來進行定義，企圖將惠安女的研究從傳統的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的研究，拉回到具體的水利工程中來查看，探究惠安地區農村婦女被動員參與到水庫工程建設這一過程，呈現婦女的勞動規訓以及身體現實，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後的國家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以更好呈現女性身體與國家的互動關係。

第三章 動員、競賽、強制：身體的規訓



「烏潭窟，是有進無出」——艾亞抱

人的身體是自然長成的，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社會、文明背景下被「塑造」出來的。近代以來，國家越來越主導民眾的生活，國家的權力擴張到每一個公民身上，人開始為國家所支配，而且在身體上也要符合國家的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思想和身體必須重新塑造，由此產生的規訓與抗拒，就構成身體的重要的內容。

如上文所述，中國婦女解放道路有別於西方女權主義進行的平權鬥爭，呈現出特殊的歷史進程和風貌，建國後的婦女解放運動始終是在「國家」在場和領導的情況下進行的。對於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中共政權而言，動員婦女參與勞動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特別是在惠安男性勞動力長期在外的形勢之下。在「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都能幹好」的氛圍下，廣大的婦女被動員走上工程場域。那麼，在工程場域中，國家對婦女的身體進行怎樣的規訓與塑造呢？在這一章節，筆者將重點考察在大躍進運動中，國家的權力如何擴張到普通婦女的身上？國家在推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通過水利工程的建造，對婦女身體進行怎樣的勞動規訓？換句話說，本章要探究的正是溫馴的社會主義惠安女身體（docile body）（Foucault, 1975: 138）——一個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紀律性的工程惠安女身體通過怎樣的勞動規訓形成？本章將從宣傳與動員、競賽與獎勵、反抗與強制三個方面，檢視惠安水庫工程場域中，國家對婦女身體的勞動規訓手段與效果。進一步以身體的立場，深入檢視水庫工程建設過程國家對惠安婦女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背後隱含的政治權力與政治意圖。

第一節 宣傳與動員：社會主義勞動與婦女解放

政治動員是貫穿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时期的主要手段之一，並不是大躍進時期特有的性質，也並非只存在於惠安。但是，能夠動員這麼多惠安女走上工程場域，是惠安「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與「男丁外出剩下女性勞動力」的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的宣傳、分配制度的改革、「黨團帶動」和「苦難回憶」的策略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意識形態的宣傳：「勞動光榮」、「婦女解放」

新中國建立初期，延續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政府在一系列地政治運動中加強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勞動光榮」、「婦女解放」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勞動是整套宏大敘事的綜合體，一切教育宣傳、動員、競賽、強制都可以歸為其中，它旨在通過各種途徑達到對身體的規訓與操控等，因而它首先是一套論述體系，同時也是一套操控體系。

要看時代環境，過去勞動人民遭受壓迫，一年辛辛苦苦地勞動，得不到溫飽，哪會有心思去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可是現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為他們積極勞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當然什麼奇蹟也能被創造出來。(汪憶今、王順興，1962：119)

馬克思主義勞動觀在有關人類進化的論述中，將勞動視為決定性因素，即，「勞動創造了人本身」¹⁹。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導致了人在勞動過程中同人的本質的相異化。而社會主義的勞動，是異化勞動的對立面，是一種自由、普遍的勞動。在這裡，勞動在這裡不再僅僅是人的謀生手段，人們可以通過勞動，發揮自身才能，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在勞動中實現自身的自由與解放（吳超，2013）。於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被賦予「社會主義覺悟」、「有認識」、「先進」、「新型婦女」等積極的政治意義。反之，不願意參加社會勞動地家庭婦女則是「落後」、「思想不解放」、「認識不夠」的。

同時，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政體，勞動成為必要的基礎。以勞動為主題的身體規訓和身體管理，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歷經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時期的中國正式開啟了以勞動為主題的身體規訓和身體管理歷程。「為幸福生活勞動」的信念激勵著人民辛勤勞動、艱苦奮鬥，構建了「勞動光榮」的觀念，使得「勞動」成為每個身體必須完成的使命。

許配第一個站起來說道：「修水庫我第一個報名參加」。「我也去」。姑娘們爭著搶著要去。(汪憶今、王順興，1962：17)

¹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進軍烏潭水庫地消息便像春雷一樣，傳遍了整個大隊，真實人人激動非常，個個興奮無比，誰都想為烏潭水庫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到處打聽什麼時候進場，申請書、決心書像雪片一樣，紛紛送到大隊部弄得老曾批這個也不是，批那個也不是。(汪憶今、王順興，1962：80)



這個說：「批准我去吧，我參加過建設美峰水庫，我會打夯」。那個說：「可別把我忘了，我一定要去，我還會推車呢」。又一個說：「我早就下定決心，連行李都準備好了，不讓我去可不行」。(汪憶今、王順興，1962：78-79)

從官方的紀實文學《萬女鎖蛟龍》的情況來看，在惠女水庫開工時，「無敵娘子軍立志建庫」，有很多的婦女爭先恐後地想要參加到水庫工程的建設工程中。這個狀況也在我們的口述歷史紀錄中得到了相應的證實。

那時候它動員惠女水庫，說要多少人去，我就自己報名說我要去，有聽說動員烏潭水庫，開會說誰要去烏潭水庫要報名，我就去報名了。(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07)

我那時候非常熱情，去報名，家庭跟社會對我的期望很高，生產隊對我關心，對我期望很大，所以我去，就是一心在拼，要做出一個成績出來。(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那麼，國家都是如何進行宣傳動員的呢？

那時候每天都要開會，不像現在。那時候到生產隊來動員，開會、唱歌、演劇、演戲都有，都在宣傳建水庫的好處。(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惠女水庫是我們要用水的，是我們這個地方自願的，縣里安排給公社，公社安排給大隊，大隊安排給生產隊，等水來了是我們要吃的要用的，這不是強逼的，這是我們要有利的，說這些給我們聽，我們要服從生產隊的分配，叫到名字的成員勞動力要去開會。(吳延口述紀錄，2017/06/07)

當時貧瘠的土地和貧窮的生活現實，以及社會剝削存在的階級事實，讓廣大的惠安人民長期處於被壓迫的狀態。國家在動員中，大肆地宣傳水利對於人民的好處，正好契合了惠安人民改造自然，追求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在初期的動員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除此之外，這個時期官方所建構「走出社會」、「婦女翻身」的主流意識在動員婦女中起了至關重要作用。「婦女解放」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和基本鬥爭內容之一，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婦女作為潛在的勞動力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婦女解放」和「社會主義勞動」在這裡很自然地連結在一起，完成了「婦女參與到社會主義勞動建設是婦女解放」的意識建構，進而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及宣傳教育，涉入到大眾生活的各個層面。

那時候三座封建大山壓在婦女頭上，不讓婦女翻身，沒地位，到後面毛主席說，婦女解放翻身做主人，男女平等，男的半邊天，女的也半邊天。(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婦女非常積極地要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渴望通過勞動來證明自己。這都說明了，「婦女解放」和「社會主義勞動」等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在某種程度上的成功，並在動員婦女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分配制度的改革：人民公社

在大躍進之前，廣大農村社會已經基本完成了「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的轉變，農村形成了大規模、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集體經濟組織。在高度集體的制度下，婦女與男人做同樣的活，就可以掙到同樣的工分，做的好還可以比男人掙取更多的工分。這樣的分配制度使得一個家庭收入的多少好壞，不再由性別所決定，而是取決於家庭勞動力的多少和工分的多少(高小賢 2005: 153)。婦女在這樣的分配制度下，得到了「同工同酬」的對待，也促使更多的婦女走出了家門。

在集體經濟組織之下，社員共同勞動，吃大鍋飯，讓集體調配個人變得更加簡單而有效，也讓合作社生產隊獲得了調配的絕對權力。除了官方所呈現的「爭先恐後報名」的現象，絕大部分的人更多的是通過「集體分配」的方式過去。

最開始生產隊分配去大田，弄石頭。後來說有一批要來烏潭，所以我們是被調動過來的。(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2/16)

生產隊分配叫我們去，因為我們那邊是個小村落，說這些身強力壯的去，那時候都是年輕人去，我們小隊有十來個去，都是女生。(王荷棗口述紀錄 2017/02/21)

公社調勞動力都是集體主張的，不是私人主張。公社、大隊派任務，生產隊負責派人員去。生產隊是有任務的，你這個生產隊要幾個，要多少糧食多少勞動力各隊要負責，各生產隊要完成規定的任務。(吳延口述紀錄 2017/06/07)

根據報導，水庫大壩工地中的一萬五千多民工都是由人民公社來進行「統一調配」的，「從各社、從沿海、僑區、城鎮各行各業抽調」²⁰。在工程修建動員中，事實上動員的人數並不是動員多少就是多少。當時是有「一戶一人」的指標要求的，因此在少數主動報名的情況下，調配安排成為當時最主的手段，大部分的人都是通過生產隊安排走上水利工程的建造。

三、動員策略：「黨團帶動」、「苦難回憶」

除了意識形態的宣傳、分配制度的改革，促使起這麼多婦女走上工程場域，與「黨團帶動」和「苦難回憶」的動員策略是無法分開的。

(一)「黨團帶動」

在廣大婦女民工進場之前，工地首先是建立領導機構—工地委員會與指揮部，成立以黨為領導的工程建設體系。「書記王志賢任元帥調兵佈陣，鐘盛興副縣長作指揮選將運謀」(汪憶今、王順興，1962：60)，這樣以惠安縣委書記、副縣長為首的水庫建設指揮機構就建立起來了，成為動員女性的主導力量。領導機構成立之後，立即安排任務，分派人手到各個公社、生產隊進行宣傳動員。

²⁰ 《人民公社無限好，同心協作威力強：惠安四社合建烏潭水庫》，泉州日報，1959/1/17

在動員過程中，各公社、生產隊首先動員之前發展培養起來的黨團婦女幹部，進而通過她們去動員廣大婦女同志。



那時候，像我們這種團員是要帶頭去的。(艾亞抱口述紀錄，2017/02/20)

無疑，黨團帶動的模式是成功的動員的關鍵之一。從舊社會走出來的婦女幹部，經過黨和團的培養和發展，成為工程的積極召集者。

要加強對共青團工作的領導，做好黨的助手。(汪憶今、王順興，1962，2007：401)



圖 19 第五總支部全體幹部合影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基層後備力量的補充，順利使得權力滲透更廣大的面去。在惠女水庫的建設過程中，每一個大隊都有自己的團支部，負責不斷擴大婦女黨團的規模，一方面加強了「婦女解放」的效果，另一方面培養了一批積極的號召者以響應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水庫工程建設期間，湧現了三千多名女彪炳、女先進生產者，兩百六十多人在工地光榮入黨，一千五百多人加入共青團²¹。

²¹ 惠女水庫建設概況，《惠女水庫 巾幗豐碑》，2009：19。



那時候什麼都得黨員、團員帶頭。加班加點，要這些人去加，青年比較不用去加。我們日夜都要加班，都沒有睡覺。(艾亞抱口述紀錄，2017/02/20)

身上所背負的責任和榮譽讓其必須比其他民工承擔更多的工作，成為模範，成為黨和國家政策的堅定的執行者。然而，她們同樣是迫使自己的身體遭受比一般民工更強的勞役。

(二)「苦難回憶」

除了「黨團帶動」，另一個最重要的策略是「苦難回憶」，通過苦難回憶，這個時期的動員建構了過去／現在的方向性對比，展示了群眾曾經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苦痛，促使廣大婦女為更好的未來進行奮鬥。

鄒玉蘭費了好多口舌，鄒媽媽就是不肯答應。原來鄒媽媽為了女兒婚事日夜操心，好容易女兒和女婿商定了秋後結婚，老人家正盤算著給女兒好好辦喜事呢。再者女兒從小就在她眼前，沒有遠離過，母女相依為命，怎麼忍心讓她越縣去修水庫呢？鄒玉蘭知道媽媽的心事，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修水利的好處統統告訴媽媽，又把家庭解放前後地生活現實給媽媽做了對比。(汪憶今、王順興，1962：82)

原來這四營的民工們來自惠東大乍、港墘、崇武一帶。這些地方是惠安著名的漁區。解放前，這一代受國民黨地欺壓剝削最為嚴重，欺壓得她們透不過氣來，不必說難人下海討魚受到搶劫掠奪、欺辱剝削，日子非常難過。就是婦女們，她們被束縛在鍋灶旁邊轉來轉去，見不到天日，更由於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她們迷信思想很嚴重，燒香拜佛，問神卜卦，怨天厭命，經常發生跳水自殺慘劇，以此來反抗壓迫。她們的命不值一個錢，每年不知道葬送了多少無辜的生命。直到解放以後，她們才真正得到翻身，明白了她們之所以窮並非命裡注定，這才積極起來搞生產。(汪憶今、王順興，1962：203)

鄒玉蘭通過解放前的「吃不飽、穿不暖、賣弟弟」與解放後的「分了田地、分到房屋、不愁吃不愁穿」做對比，來肯定共產黨的領導帶來的改變，應該跟著黨的號召，為創造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但是展示苦難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在終極的目標上，是要借助苦難回憶，營構一種集體的社會記憶，實現認同中的情感動員（周冰、付伶俐，2012）。同樣的情感動員也出現在性別動員中，通過舊社會／新社會的女性處境對比，強調舊社會女性身受父權、夫權、家長權的枷鎖，動員女性走出社會，通過勞動來改造自己。

解放後，才讀婦女班。後來，讀速成。解放前，我們非常窮，根本沒錢唸書。舊社會哪有女的能讀書，非常少。解放前，女人沒啥地位。（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那時候我 12 歲才去唸書，我是 1940 年出生的，家庭非常困難，非常窮。我 3 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只有一個姊姊和一個母親。在舊社會我根本是無法念書的，解放後我 12 歲，1951 年才開始去念書，我們村裡有兩個人來招我。我們一個分社的社長叫楊來順，非常疼我，動員我的母親說要讓我念書，說婦女念書不用錢了。所以我就去念了，跳班讀到六年級，到 16 歲小學畢業。那時候我們整個東內生產隊，選我做出納，做了 1 年。（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苦難回憶」的動員之所以發揮作用，是國家在論述上所強調的惠安女性身上自然現實和社會現實的雙重枷鎖。「在惠安婦女身上，除了貧窮的災難，還有國民黨反動「政權」和封建「族權」、「神權」以及種種封建陋規的繩索，這些繩索束縛著成千上萬的勞動婦女，使得她們喘不過氣來。」²²因此，在經濟上消滅貧窮，在政治和精神上求得解放，是惠安婦女迫切的希望。

惠安婦女的勞動進場實質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分配與自下而上的報名交疊的模式。大躍進時期，政府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勞動光榮」、「婦女解放」成為當時的社會主流意識，並連結成「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論述，滲透到城市和農村的各個層面。集體的經濟組織形式，分配制度的改革，讓家庭收入完全取決於人口的多少。這時候，不管婦女是否情願，為了有糧吃，有錢花，缺乏勞動力的家庭婦女別無選擇地參加到勞動中來。

²² 《惠女頌》，福建日報，1963/6/4。

當然，在目前的官方的「爭相報名」論述是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但其落入單純為了服膺「響應黨的號召」、「婦女解放」的語境。而這背後掩蓋著正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組織方式下，安排分配的動員模式的施行迅速組織起來的婦女勞動大軍。在動員過程中，黨員、團員幹部在響應黨的領導中起了積極的帶頭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安排和分配的。在動員的策略中，「改變落後面貌」的基本生活訴求策略以及「婦女走出社會」的性別化策略成為兩大主要策略。兩大策略成功動員了大多數的惠安婦女，走上修建水庫工程的道路，開啟了惠安女的「工程化」、「國家化」的進程，成功地將惠安女納入工程的權力場域之中。

第二節 競賽與獎勵：新民歌與勞動模範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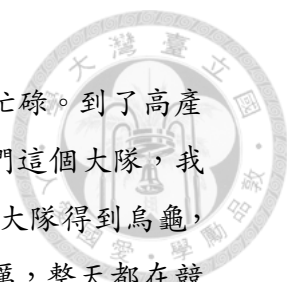
如果說政治動員只是惠安女勞動規訓的開始，那麼勞動競賽則把婦女的勞動規訓推向了高潮，換句話說，勞動競賽成為大躍進時期最為廣泛的勞動規訓手段。本節將重點關注到惠安女水庫工程中的勞動競賽與獎勵的規訓手段，以及這樣的規訓手段下民歌與女勞模模範的產生。

一、勞動競賽的規訓與工程推進

（一）勞動競賽的開展

勞動競賽被認為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為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條件的強大力量，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上，在消滅了剝削制度而使勞動由奴役性質變為自為性質以後，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曉亮，1959）。勞動競賽讓整個空間成為一個競技場，其不斷能夠發揮廣大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更能提高他們的生產效率和工作效率。在全國解放以後，勞動競賽迅速地在全國展開，在大躍進時期，競賽更有了全民的性質，全國各地普遍展開插紅旗、爭上游的競賽熱潮，惠安水庫工程場域也不例外，插紅旗、爭上游的競賽熱潮一直在燃燒。

不是懶懶散散在做，廣播喇叭那邊催過來，這邊催過去。這個中隊要跟那個中隊競賽。高產日下去，反正每天都是高產日，沒得給你慢吞吞。（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那個時候是五天一次小競賽，十天一次大競賽，每天都要忙碌。到了高產日，就是你趕我，我趕你，烏龜紅旗競賽。烏龜要是到我們這個大隊，我們就要趕緊加油將這隻烏龜趕走。這隻趕走，就一定有一個大隊得到烏龜，那得到烏龜的大隊就要繼續趕。得到紅旗的，就得再接再厲，整天都在競賽。(吳延口述紀錄，2017/0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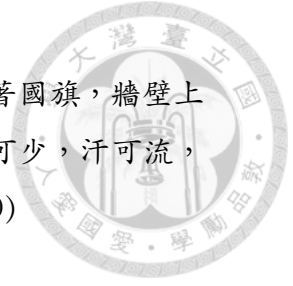
到後面，有時候搞高產三天三夜沒到草房，就躺在車腳睡，不然真的不行。
(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紅旗競賽」落實在惠女水庫工地的實際生產中，演變為組織婦女開展各項爭先比賽，包括了勞動量、環境衛生、後勤工作、文娛比賽等方面。惠女水庫建設大部分是在競賽中度過的，整個「工地就像一個大擂台」。勞動競賽名目繁多，諸如「百夯大賽」、「千女運車」、「搖櫓比賽」、「萬人紅」競賽、破「關」競賽等。通常在競賽前，會通過「群英比武大會」來進行誇示性的鼓動，高舉右手，在毛澤東的畫像前莊嚴宣誓。



圖 20 群英比武大會現場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草房里佈置地莊嚴樸素，毛主席像掛在正中央，兩旁懸掛著國旗，牆壁上貼著條幅標語「要高山低頭讓路，要河水馴服改道」、「眠可少，汗可流，不削平河格嶺，誓不罷休」。(汪憶今、王順興，1962：110)

許配走上去，她代表突擊隊，向全體提出挑戰。楊亞嘗、鄒玉蘭都上去應戰，並提出要翻定額五番，作為個人向全體提出挑戰條件。柳秀香、吳定苓、楊美英鬥上來應戰。會場裡，充滿著強烈的革命英雄氣氛。(汪憶今、王順興，1962：110)

「紅旗競賽」具有極強烈的表演性，甚至有時候工作量只是成為衡量的標準，而表演性才是最重要的。「推車英雄」楊亞嘗，創下「一天運土 62 趟，來回奔跑 124 公里，超過定額 6 倍以上」的光榮背後，是領導在比賽前開會中領導的一句「鼓勵」帶來的幹勁，體現了這場浩大的勞動競賽極強的表演性、儀式性。

在開會當中他這樣鼓勵我說「楊亞嘗呀，你明天要是摔倒都要繼續爬起來跑」。為什麼呢？他說，「明天，市裡面的領導，縣裡面的領導都要來，就是要看你楊亞嘗是真英雄還是假英雄」。(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我們不懂，以為要很努力一直打，他說不是，我們今天就是做個樣，然後比較好看，給別人照相，不是要量產量，只是現場會給領導幹部看，說我們的工人有積極性，有成績。(吳延口述紀錄，2017/02/14)

(二) 勞動模範的表彰

當然，勞動競賽與模範表彰是相輔相成的，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為了「追求氣氛聲勢上的轟動」，通常使用樹典型、評先進、評榜樣的辦法。一方面，勞模概念被推廣使用，成為鼓勵生產者幹勁，樹立光榮的符號。另一方面，這一形象的概念也將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灌輸到婦女心中，推動婦女們積極生產，參與躍進，改變自己以符合國家的期待。

1958年12月惠女水庫工地召開「全縣紅旗代表大會」，表彰了「104個功臣、模範、積極分子」²³。1960年2月10日壩身完工之際，工地召開了隆重的「大壩落成慶功」大會，評出一等功臣4人，二等功臣219人，三等功臣714人²⁴，絕大部分為女性。大躍進時期，惠女水庫工地出現了一大批女勞動模範，為工程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而這些女模範正是通過一次又一次勞動競賽生產出來的。

後來大壩要封頂了，水庫提出要辦一個破10000方的，我們這個大隊長組織能力非常好，想了個辦法，車與車競賽，人與人競賽，排與排競賽。在生產當中，水庫提出，評選五虎將，評紅旗生產隊，評衛星隊，評青年突擊隊，都有評這些，我帶的這個隊被評為衛星隊。為了獎勵，那時候這些青年的頭腦，都在想著進步，都在想什麼時候要完成任務。(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圖 21 惠女水庫大壩落成慶功大會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²³ 紅旗會上下決心 功模競放高產為性 烏潭渠道全線紅旗招展，惠安報，1958/12/10。

²⁴ 惠女水庫光榮榜 1960/2/7，惠女水庫管理局《惠女水庫，巾幗豐碑》，2009：60-61。



圖 22 莊明燕（二排左一）出席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在我們採訪的阿婆中，大部分都有被評為先進分子。那些常被工地表揚的女民工被推薦到各級政府所開展的勞動模範評比中並獲得各種表彰，如辛妯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楊美珍和劉桂妹等人被評為「水利模範」和省「三八」紅旗手等（莊笑娘，1993）。飛車隊長莊明燕，出席省、專僑屬勞模會，1960年出席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多次被報導的勞動模範、一等功臣楊亞嘗於1960年5月、2007年紀念建軍八十週年會兩次奔赴北京，在1960年5月全國民兵大會，其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贈送步槍一把，並作為代表發表了講話。

我代表惠女水庫，代表惠安，在東南片區講話，我還記得我講了這一句，「我們現在是地瓜縣，三年後，你們到我們惠安作客，我們有大米飯來招待你們」。（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通過勞動競賽，許多婦女成為勞動模範，入黨入團，甚至影響了她們的命運。水庫工程完成以後，她們有些人留下來成為惠安水電局的職工，有些去了縣婦聯，大部分回家的婦女幹部，也繼續在生產隊裡面當一二把手，帶領生產。

(三) 勞動競賽與勞動模範的評比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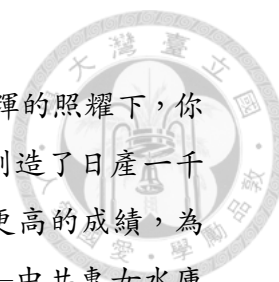
Foucault (1975: 141) 以學校、工廠、監獄為例子，指出了規訓的四大方向：分配藝術 (The art of distributions)、活動控制 (The control of activity)、編序籌劃 (The organization of geneses)、力量編排 (The composition of forces)，其分別代表了四種權力技術：「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以及大道力量的組合而安排的「戰術」。這些技術成為社會各個機制裡，權力關係表現的印記。勞動競賽正是透過策略、機制的組合運作，使得婦女的身體被調動起來，推動工程建設持續往前。整個惠女水庫的工程建設推進中，競賽條件的制定，按時檢查、評比、獎勵，及時交流和推廣先進經驗聯合起來構成了完整的規訓體制，能有效提高勞動規訓的效果。

根據最近開展的高產運動狀況來看，王書記認為需要建立評比制度，以員工情緒持久高漲，決定每日比生產進度，比安全質量，比出勤率高低，指揮部以營為單位，評先進營，營則評先進連，各連評比進校隊，各小隊評紅旗手。果然，勞動組合一調整，評比制度一建立，生產高潮便進一步鼓動起來了，連日生產捷報頻傳，各營紛紛送來大紅喜報。(汪憶今、王順興，1962: 358)

Foucault (1975:163) 也提供了一套規訓權力的手段，幫助這些規訓策略得以實行並達到效果。這些手段包括：層級監視 (hierarchical observation)、標準化評定 (normalizing judgment) 以及檢視 (the examination)。檢視手段由層級監視和標準化評定結合運作形成。編隊、制定評比標準、比賽狀況，每一個人、每一個小隊、中隊、大隊地表現，都被按照一定的標準一一紀錄下來。這些紀錄都標示每一個小隊的特性，將這些勞動內容轉化成文字紀錄下來，比對這些紀錄，評比先進，改進管理方法，以促進工程更快推進。

我在我們生產隊是第一的，出去都有記錄的，都有記工員，你今天出工，競賽時候有多少車都有記錄，大家都不願意落後。(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不可否認，共產黨的勞動規訓取得很好的成效。聯合獎勵的方法，使得女民工的士氣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中共惠女水庫第七總隊暨七營全體指戰員們，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耀下，你營全體指戰員們發揮了高度社會主義熱情，於四月十三日創造了日產一千三百五十四方的最高紀錄，可喜可賀，望再接再厲，爭取更高的成績，為早日完成水庫的興建任務而努力。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禮——中共惠女水庫委員會／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汪憶今、王順興，1962：401）

（四）勞動競賽的規訓效果

誠然，勞動競賽的廣泛開展，有利於調動女民工的積極性，充分發掘勞動潛力，一定程度上快速地推動工程的建設。同時，在也通過樹立勞動模範，加強了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勞動規訓的內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其一，推廣先進技術和經驗。一般來說，競賽總是由苦幹向巧幹發展地。因為勞動競賽和技術革命的結合，才能更好地提高勞動生產率，減輕勞動強度，並使得競賽持久地發展下去。惠女水庫開工時，婦女們帶來的工具都是祖先傳下來的鋤頭、扁擔和簸箕，整個工地沒有一輛獨輪車或其它先進工具，更不用說挖掘機、輾壓機和載重汽車等現代化施工工具。針對實際問題和困難，成立了「工具改革委員會」，開展轟轟烈烈「巧姐妹」運動，充分發揮群眾智慧²⁵。

我們女民工湊在一起商議辦法，決心想個妙計出來，到底人多主意多，決定利用斜坡開一道溝，石頭從這裡滑下去。說幹就幹，苦戰兩天修好一條又光又滑的溝槽，效果很好，18個人一天運石120多立方米，保證涵洞提早完工，我們受到工地黨委的表揚²⁶。（辛婭 1959/12/28）

我沒有動搖，自己動手把車子橫桿拔掉，煞車掉轉頭，加上一條肩帶，雖然一個人拉，既輕快又保險，且減少一個勞動力。本月12日我的車子大顯威風，650米距離來回跑39趟，完成10.98方，超過定額9倍多，被稱為工地推車英雄，榮立二等功。現在全大隊都在推廣我的辦法，功效也顯著提高²⁷。（何靜如，1959/12/28）

²⁵ 惠女的故事：遍地革新花，《惠女水庫 巾幗英雄》，2009：36。

²⁶ 打破自卑感 勞動顯身手 一等功臣 辛婭，福建日報，1959/12/28。

²⁷ 有志不在年高 二等功臣 何靜如，福建日報，1959/1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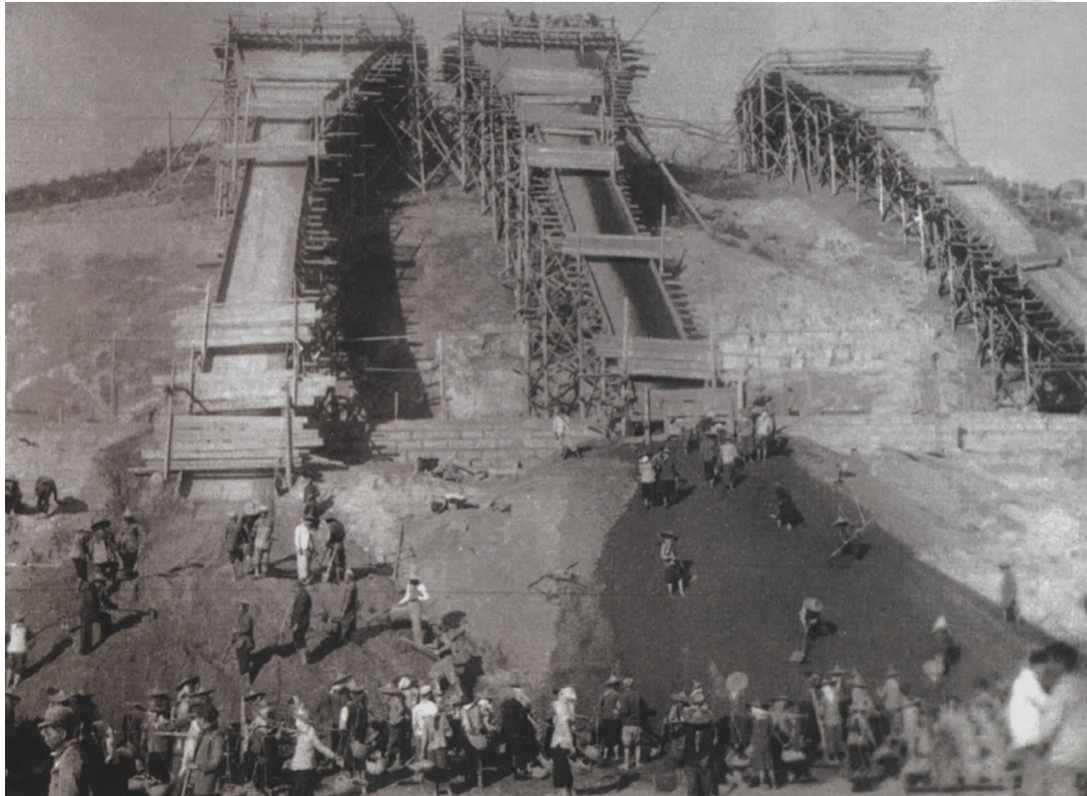


圖 23 滑槽輸送土石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圖 24 推車改為拉型板車

(資料來源：惠女水庫紀念館提供)

技術革新成為在競賽中爭先的條件之一，眾多的技術正是在競賽中被創造出來。水庫建設期間，民工提出合理化建議 2176 條（大部分是婦女們提出來的），設計各種工具模型 104 件，其中推廣應用 54 種²⁸。工地實現車子化，三角挖土、空中運土、木槽滑土、石滾夯壓、水上舢板拖掛、各式炮眼打法等先進施工發放在工地廣泛應用。通過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的示範作用，將他們創造的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有效推進工程施工速度。

其二，彰顯勞模精神，促進意識形態傳播。意識形態控制一直是工作的重點之一，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範和表率。勞動競賽並非簡單地展示婦女嫻熟的勞動技藝和強壯的身軀體魄，並且通過樹立模範成為婦女感知婦女解放的重要途徑，表達了通過女性身體表演來突破傳統觀念的社會願望。她們覺得自己不輸給男人，並頌揚「惠女敢比天公試比高，只憑三萬雙鐵臂造江山」²⁹，營造出某種程度「婦女解放」的氛圍，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印象。人們盼望女性「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同男子們並肩勞動³⁰。定期的「群英大會」和不定期的公開表彰，讓「社會主義勞動」、「婦女半邊天」的主流意識繼續深入人心。國家利用先進形象的規範作用和精神感召力來完成主流意識形態向普通群眾的灌輸，並力求這種精神的呼喚轉化成現實生活中的生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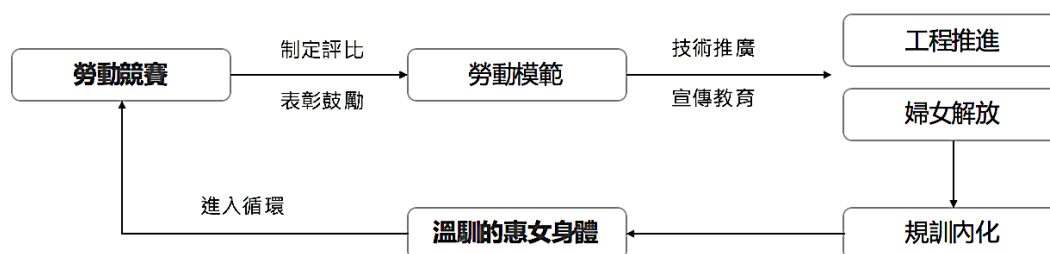


圖 25 勞動競賽與身體規訓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其三，促進規訓的內化。對於廣大貧苦家庭勞動出來的年輕女子，通過勞動可以獲得國家與他人的肯定是某種程度上的解放。通過競賽選拔模範任務，樹立旗幟，對於促進勞動規訓內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勞動是光榮的，勞動

²⁸ 惠女的故事：遍地革新花，《惠女水庫 巾幗英雄》，2009：37。

²⁹ 時代的英雄，革命的好漢——喜看《惠女新傳》，泉州報，1964/10/29。

³⁰ 惠女水庫的故事，人民日報，1959/11/9。

可以獲得更好的名聲，甚至為了勞動而傷害身體是一種自我價值實現的表現。我們看到整個工程場域中湧現出眾多榜樣典型，然而這些典型無不是用更加強度的勞動而塑造的。這種高強度的勞動，除了比其他女工付出更多勞動，甚至強調「不比男人差」、「比男人更厲害」的特徵。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溫馴的惠安女身體（docile body）——一個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紀律性的工程惠安女身體逐漸形成，然後重新進入工程推進的循環當中。

二、身體的文化與武化規訓

婦女參與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場身體和思想的雙重改造。在惠女水庫工程場域，婦女除了要進行勞動的身體改造，同時還受到身體文化和武化的規訓。

那時候剛解放，婦女都不識字，因為舊社會婦女都沒有念書。去到烏潭都是文盲，上面中央教育部 1958 年提出要掃除文盲，掃除文盲要組織婦女學習班。水庫印了千字冊，這一千字要是都能認識，就是小學畢業。那時候都要組織來學習，一個人一冊，一千字，讓我去教她們。（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為了讓婦女更加理解社會形式，響應國家號召，婦女在勞動的同時要進行識字掃盲教育。識字任務和勞動任務是一樣，每天有每天的任務量，中午休息沒有學習好，就得利用晚上的時間繼續學習。最後會通過考試來檢驗掃盲的效果。

像我們一個班四十幾個，就我教，要是今天是要認識十個字，就要學到認識這十個字會，要是中午沒教好，晚上回來睡覺前，我會拿著小燈到床頭去教她指導她，說這幾個字你讀來我聽一下，是怎麼解釋怎麼讀，要是沒學會就再教到會。（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某種程度，本來休息的時間就不多，還要被識字所佔用，加劇了身心的負擔。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識字教育也讓很多人從水庫回來後在生產隊擔任重要的職務。



圖 26 工地掃盲學習

(資料來源：惠安水庫紀念館提供)

除了掃盲識字的文化規訓，台海關係的緊張，讓前線的惠安，同樣也進行規模宏大的武化身體運動，工地女性練武／體操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以訓養對抗台灣的武力。惠安所處的特殊位置，也讓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個體身體，開始成為國家武力凝視與用力的對象。

還有練武的，當時毛主席提出大辦民兵師。我們這些都是青年，屬於基幹民兵。比如我們做夜班，到早上七八點回來，吃一下，然後洗洗衣服，睡一會兒，中午吃完就沒得休息了，就要上山去練武，去學打靶，去操練，那時候跟台灣很緊張，怕都去勞動不能打戰。讓你學會勞動，也要學會打戰，如果敵人來了，鋤頭放下，就能拿槍跟你打，所以是全民皆兵。(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黃金麟指出(2009:76)指出，共產黨傾向以軍事編制組訓人民，進行軍事訓練和勞動生產。1959年毛澤東提出大辦民兵師以後，工地從原來的「大隊一中隊一小隊一組」的編制，改成「營一連一隊一排」的軍事化組織編制，整

個工地成為「勞動戰地」。



當時全部的水庫就改成民兵營，民兵連，民兵隊，民兵排，縣里還要派武裝隊的部隊過去水庫訓練，就在人家收割完的空的田地裡練兵。那時候毛主席是說，大辦民兵師是說，要是蔣介石來，我們要是沒槍，就拿著鋤頭也好簸箕也好或是其他什麼也好，就是都要出動。(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對於身體的武化改造，除了軍訓操練，還包括體操。

這時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已經列隊在球場上開始做第三套廣播體操了，王書記和鐘副縣長也走進球場，伸伸手，踢踢腿，扭扭腰，擺擺頭，做起廣播體操來了。收操回來，由於活動了筋骨，頓覺精神百倍。(汪憶今、王順興，1962：403)

大辦民兵師，隊改營，「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原本家庭婦女閒散的生活狀態被工地體制的勞動紀律取代了。通過體操、軍事化的演練進行更有紀律的身體塑造。這對於家庭婦女而言，是整個生活狀態的巨大改變，是行為方式的再塑過程。在高強度的勞動之外，識字掃盲、軍訓操練佔去了婦女大部分的休息時間，國家全面地改造著惠安婦女的身體。

三、新民歌的激勵與規訓

大躍進水利運動開始後，各地農村依靠集體的力量興修水利，創造了個體農民意想不到的奇蹟，看到了組織的力量。農村中出現了大量抒發豪情、讚美英雄、描繪理想、歌唱未來的新民歌（夏杏珍，2012）。惠女水庫的建設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多的膾炙人口的民歌，成為廣大婦女同胞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部分，在口述歷史紀錄中，每一個阿婆都可以隨口念出許多民歌。

開會說笑話，唱歌，講古，講鼓勵說好話，還編歌，「惠安婦女頂呱呱，賽過唐朝樊梨花，移山倒海功勞大，好名好聲人人誇」。(吳延口述紀錄 2017/06/14)



「惠安人民志如鋼，萬眾奮發建烏潭。前年窮根要斬除，將來糧食成山崗。糧食堆成山」歌聲嘹亮，趕走了疲勞，換來了身心愉悅。(汪憶今、王順興，1962：129)

新民歌的普及極大鼓舞了大家的積極性，這個時期的民歌特點與水利運動的特質相呼應，通常表現人們征服大自然的決心和氣魄，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堅定信念，被毛主席讚賞為「促進生產力的詩歌」³¹。眾多民工除了傳播那些別人創造的民歌，也會通過民歌創造來激勵自己。

那時候我自己靜靜在筆記上寫下這樣一句話，14個字：「願將青春獻給黨，同心協力向壩攻」。來激勵自己。(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除了激勵作用，民歌也是為了加強對婦女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羞辱式的民歌的傳唱，對個人的心靈而言比身體的懲罰來得更加可怕，更加深刻，如此的規訓方式收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東橋有個叫柳梅的，停中午跑去摸田螺，讓人編成歌念，說「柳梅帶頭摸田螺，民工意見對妳提，大家幫助你認識，愛吃田螺是不靚」。弄地滿城風雨，讓您坐也坐不住，讓你熬也熬不住。不能讓她逃跑，要繼續做。(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無論是激勵還是羞辱，民歌以一種政治話語的身分參與了一場傳播意識形態的泛政治化運動，對工地婦女的身體規訓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有效地加強了婦女的思想教育與管理。

³¹ 《大規模收集全國民歌》，人民日報，1958/4/14。



第三節 逃跑與強制：身體的拉扯

宣傳與動員、競賽與獎勵，國家對惠安婦女身體進行意識形態輸入與勞動規訓。然而，婦女對此又做出了什麼樣的回應？事實上除了官方所呈現的政治動員與勞動競賽，強制與前二者交織複雜地貫穿在整個工程場域，其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呈現不同的狀態。

一、強制調動

在時間上，1958 年建設前期，情感動員起了非常大作用，應該說絕大多數人是自願去，甚至不乏官方所說「爭先恐後」的報名情節。然而在後期，競賽所帶來的過度身體勞役，讓很多人都不敢到這個工程場域之中，於是強制調動、強制勞動的情形便變得普遍存在。

到了後面都是強調[強制調動]的，看到那麼艱苦，後來的基渡[灌溉工程]都沒有人要去。你要是不去，家裡這邊沒法分糧食，沒辦法出工，那時候是用這樣的方法，不然沒辦法推進，這是在 1959-1960 年的事情了。(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這裡的生產隊安排要去，家裡生產隊不給吃的，都是強迫的，不去你也要去。強調這個水庫一定要給它好，不是沒有強迫，都是強迫的。(王荷棗口述紀錄，2017/02/21)

生產隊有任務，你這個生產隊要幾個，要多少糧食多少勞動力各隊要負責，各生產隊要完成規定的任務，無論你有多困難，該幾個就要幾個。都是開會，集體命令的，在會上說的，說有什麼任務，什麼時候去。(吳延口述紀錄，2017/06/07)

在空間的分佈上，水壩都是身強體壯的年輕婦女上去，要麼是沒有結婚，要麼是結婚還沒有孩子的。但是到了大壩後期，以及開始進行灌溉工程的幾個控制工程，像南塘渡槽施工時候，連老人、母親都去，很多人都是帶小孩去的。



到後面去基渡的時候沒人，人不夠，才讓帶小孩的也去，不然家裡生產隊也不讓生產，要去那邊完成任務，讓水快點通到惠安(楊亞嘗 2017/07/15)。

後期的情感動員失效，強制安排成為最主要的勞動組織方式，但並非全部的面貌，同樣也存在很多非常積極的婦女。而這些婦女，正是水庫建設前期黨和國家表彰的先進分子，以及發展出來的黨員、團員幹部。我們無法肯定這些人對於工程的絕對熱情，但是至少她們不需要用強制手段來推進，或者也成為強制安排的人。

[破萬方競賽]第二天，腳都漲痛，沒辦法下床。我還是跑現場去看，我是生產隊長怕說，第二天有第二天的任務無法完成。她們都爬不起來，我還到現場去裝土。(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當然幹部身上所承載的責任和榮譽，不僅讓其在心理和思想上也要承擔更大的壓力。曾作中隊指導員蘇姜在回憶中坦言，去開會，都是下達任務，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回來就得想辦法讓民工完成任務，「做這種工作，是上面壓迫，下面害怕」、「直直做還會比較輕鬆」(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蘇姜道出了作為幹部的無奈。

去南塘渡槽重點工程，上去開會，領導說，蘇姜，除夕這 12 個橋墩要是沒有浮出水面 3 公尺，死都要繼續。(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後期大多數是屬於被動參與，甚至是被迫參與地，這個時候的「工程惠安女」具有強烈的功利化色彩，以完成任務為絕對的目標，強制的狀況可想而知。

二、逃跑與規訓

水利工程帶給婦女的，除了改變家鄉面貌的希望以及榮譽，更多的是身體的勞役和思家情緒的煎熬，很多人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不得不走上「逃跑」的道路。特別是從 1959 年底開始，在物資極度缺乏、「浮誇風」又盛行，吃不飽還必須進行更大強度的勞動，逃跑的現象開始蔓延。

我們同一個草房，早上起來要準備吃飯出工。然後看見有些草房都沒人了，一定都是逃跑了，不能吃苦，跑了非常多人。(張荷省口述紀錄 2017/02/16)

1959 年底開始，逃跑在惠女水庫工程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並且情況非常嚴重，如 1959 年 5 月中旬，七大隊有 13 個名工逃跑回家；六大隊則有 23 個民工逃跑回家；四大隊、五大隊也有逃工現象；三大隊則是小隊長帶領民工連夜逃跑（汪憶今、王順興，1962：406）。

各個大隊均出現逃跑現象，甚至出現小隊長帶隊逃跑的現象，逃跑的原因也是多種，其一，擔心工程結束遙遙無期。其二，崇武大部分下海討魚去，農業生產缺乏勞動力，跑回去搞農業。其三，存在本位思想，只想搞農業生產，不想建水庫。(汪憶今、王順興，1962：407)

「場內外配合不好，埋怨場外不支持，社裡來拉人，可是我們沒有檢查我們自己，工作都做很好嗎？」(汪憶今、王順興，1962：407-408) 工地黨委對於工地存在的管理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檢討，試圖通過「召開貧下中農、積極分子會，進行動員，開展回憶、對比、算帳、訴苦等來解決難題」³²。

三大隊長道：組織黨員、團員隊有逃跑的人進行監督，夜裡設立崗哨，輪流查鋪，出工收工都點名，準備揪幾個回來，狠狠地鬥他一下。(汪憶今、王順興，1962，2007:407)

六大隊長道：做團前上我們就在半路上抓回三個逃跑的民工，今天監督她們勞動，晚上要開民工大會來鬥爭鬥爭。(汪憶今、王順興，1962：407)

早上天亮出發是軍事化，起床吃完要排隊，軍事化點名，一個小隊一個小隊點名，喊報數一二三。要是這個小隊 30 人，只報了 29 人，後勤的人要下去查，是什麼原因，逃跑還是生病？很嚴，非常艱苦。(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³² 辯通思想，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工效運動—五大隊四中隊隊長張高生書面發言報告 大會快報（2），惠女水庫工程指揮部編印 1960/3/31。



民工要逃跑，還要整夜起來巡邏。除夕沒有回來，丈夫孩子都在家裡，整夜民工都準備要逃跑。(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像是做夜班，犯睏，又很冷，就會偷跑。偷跑，大隊的這些婦女頭，要去每個草房去清理，很多人又被拖回去，不然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烏潭水庫真的很辛苦，那時候很多偷跑的，小岫那邊逃跑很多，小炸人為了逃跑，翻過溝，全身都是水，游過來的，那時候走路，有民兵，被民兵攔下來了。(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07)

你要是逃跑，會把你拉回去批評，這樣你就不敢逃跑。(吳延口述紀錄，2017/0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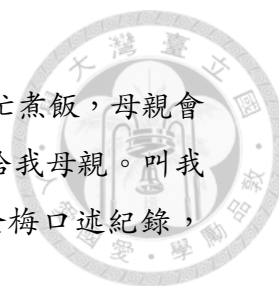
伴隨著逃跑現象的產生，隨之而生的是治理逃跑的規訓方式。查勤、巡邏、圍堵、勸說、警告、批鬥，一整套應對逃跑完善的勞動規訓方式應運而生。批鬥的方式也是非常地殘忍，以達到對大家的威懾。

開萬人會，讓她跪在台上的椅子上批鬥。(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讓團員、黨員帶頭，喊、抓、綁、鬥，說要綁要怎麼鬥，一般在主席台上，跪在板凳上進行批鬥。不同中隊方式也會有不一樣，像荷米非常殘忍，會用大便。(王荷棗口述紀錄，2017/02/21)

逃跑成功，也並不意味著你不用繼續回到工地勞動。人民公社的集體方式，讓逃跑的治理變得更加得心應手。逃跑回家，公社食堂不讓盛飯，通過食物的控制讓人重新回到工地進行勞動。

那時候受不了苦，都偷跑回來。農業合作社，公家一起煮，回來沒得吃，不能去食堂盛飯。然後自己就得回去。(張淑美口述紀錄，2017/02/15)



有時候，想回來，都會偷溜回來。那時候我母親在食堂幫忙煮飯，母親會偷偷跟食堂的師傅講「金梅偷溜回來」，食堂會多盛一些給我母親。叫我們再去我們就得再去，沒有糧食吃，當然得再去。(陳金梅口述紀錄，2017/02/20)

當身心的折磨到達無法忍受的程度，逃跑成為唯一可以逃避的方式。婦女們試圖透過公開的逃跑或隱匿的抗命，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然而伴隨著逃跑而來的，是查勤、巡邏、圍堵、勸說、警告、批鬥一系列的規訓方式，強制轉變和抗拒逃跑幾乎是以更強的力道在拉扯個體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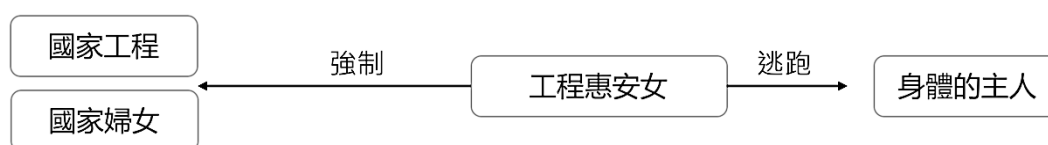


圖 27 強制與逃跑的拉扯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烏潭窟，有進無出。後來要去三明，還是要用人去替才能讓我走，但是我們那邊的妹妹還小，所以是用別人去替，才能退場。(艾亞抱口述紀錄，2017/02/20)

如果你要退場，還必須與人去代替，一句「烏潭窟，有進無出」，道出了婦女身體的真實處境。整個工程在這個時候，與其說是女性解放的空間，不如說是女性禁閉強制勞動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在那過了一個或者兩個春節。

第四節 工程的婦女特性：身體的國家化

廣大的惠安婦女，從被動員進入國家主導的工程場域那一刻起，就注定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身份，甚至她們的命運同工程、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開啟了惠安女的國家化歷程。1959 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視察水庫，以國家領導的身份命名「惠女水庫」，所體現出來的正是國家對水庫工程

婦女特性的高度重視。1962 年大壩落成時，水利水電部和全國婦聯的兩則賀電將工程的婦女特性闡述地淋漓盡致，完成了「工程惠安女」這一全國婦女解放代表的形象塑造。從惠女水庫建設到「工程惠安女」形象符號的轉換，正是惠安女形象國家化臻於極致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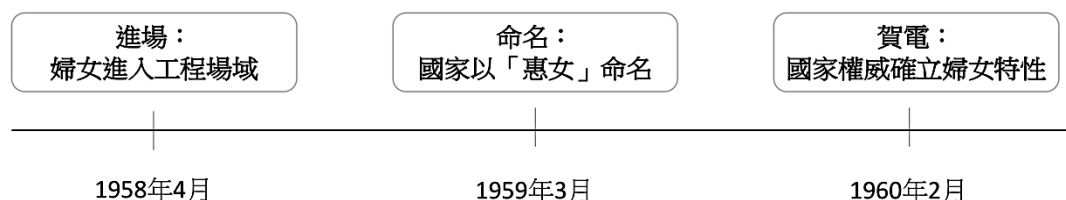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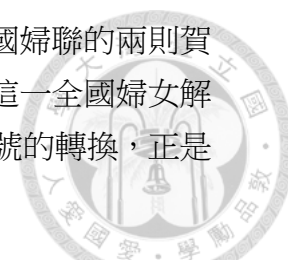


圖 28 工程的婦女特性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由「家」到「國」

在惠安，有普遍的「娃娃親」現象，結婚年齡也會特別早。除此之外，還有「長住娘家」的傳統，女性在出嫁之後，如果還沒有懷孕生完孩子，就得長期生活在娘家。只有重要的節日，如春節、中元節可以到夫家。所以婚後的性生活幾乎是在這兩個時期進行，一直到有孩子以後。在惠安，廣大的婦女並沒有婚戀的自由，而是由父母包辦。

從民國時期開始一直到新中國初期，惠安地區婦女「集體自殺」現象蔚然成風，引起各方人士普遍關注。每次婦女集體自殺「少則二三人，多至五六人。或同姓，或異性。非姊妹則姑姪兒。」、自殺者多為年輕婦女，大「多屬荳蔻年華，具有姿慧之女子」（挽鵝，1932）、「或自縊或服毒或溺水，幾足以至死者無術不用」³³。民國時期惠安淨峰西村一個小小的池塘竟吞噬八百多個婦女的命（陳國華，1999），1947 年小岞半島婦女自殺數達 135 人（陳萬里，1998：185）。惠安女集體自殺頻繁已經成為當地嚴峻的社會問題，雖然惠安地方當局施行種種舉措干預但是始終沒能遏制婦女自殺之風，這種狀況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麼惠安婦女為什麼會集體自殺呢？長期以來，人們從「娃娃親」、「長住娘家」的婚姻陋俗來解讀惠安女集體自殺的成因。社會與輿論普遍認為，「長住娘家」的陋習給女性的生活和情感造成嚴重的傷害，成為集體自殺的誘因。楊齊福、汪煒偉（2009：90）認為這種解讀的偏狹遮蔽了人們的視野，惠安女

³³ 一雙無知少女投水自盡，惠安旬刊，1930/9。

集體自殺是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等機制失衡的結果。沈重的經濟負擔與卑微的家庭地位的角色反差；性別的職業流動與兩性關係的失衡；傳統婚姻制度與特殊的社會習俗，對女性普遍的絕望提供了最大可能，加劇了她們的自殺傾向。對「陰間世界」的宗教想像也使得自殺成為擺脫現實困境的一條路徑。而「金蘭盟」的普遍存在，則為自殺從個體行為走向集體行為提供了契機。社會輿論的效應又讓後繼者以先逝者為榜樣。這些都導致了惠安女自殺現象愈演愈烈（汪煒偉 2009：31）。對於惠安女自殺的原因並不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重點，然而婚姻陋俗和集體自殺的狀況的存在，足以看見惠安婦女長期飽受封建族權、家長權的壓力，這也讓國家的勞動動員能夠以「拯救廣大惠安婦女」之名，得以順利實施。

國家通過組織廣大婦女參與工程勞動，以對抗鄉村傳統的族權，家庭的父權，在意的便是涵蓋在婦女身上的政治作用。婦女從傳統的族權和父權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後，進入了國家主導的規訓權力網絡中，成為國家工具化、組織化驅使的對象，婦女的身體從家庭身體網絡中解放後參與了各式各樣的政治動員參與工程建設。由「家」到「國」，婦女的身體雖然得以從傳統的家庭的束縛中掙脫，卻又陷入國家權力的種種枷鎖。

二、「家」、「國」的拉扯

事實上，國家通過組織廣大婦女參與工程勞動，以對抗鄉村傳統的族權，家庭的家長權，並不代表所有婦女都自覺地把自己鎖定在國家機器上，如上文所述，國家通過動員、分配甚至是強制的方式，促使廣大的婦女參與到工程當中。當婦女進入工程場域，也並非完全接受勞動，吃不飽挨餓、勞動強度過大、思念家人等等種種情緒，讓很多人走上逃跑的道路。「國」與「家」的拉扯是與工程進展同在的，只是當身體納入國家的權力場域之中，「國」的力量遠遠大於「家」，除了無效的逃跑，婦女幾乎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完成國家所分配的任務。

在中共領導下，國家權力對身體的侵入、組織、動員、訓練和使用，並通過勞動規訓把婦女身體納入權力的控制和運行的軌道，進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婦女身體的領導權」。在精神身體層面，這種使命化、工具化、國家化身體的趨勢，並不只有壓抑性質的。在對婦女身體進行不同於以往的「解放」時，這種規訓讓婦女身體感到欣喜和愉悅，使婦女相當程度上成為自願規訓的主體。這種強制的壓抑與自願的喜悅的疊加，即強制性規訓導致的反抗與自願被規訓兩種情況的交錯，正是「工程惠安女」在這場婦女解放運動中的解放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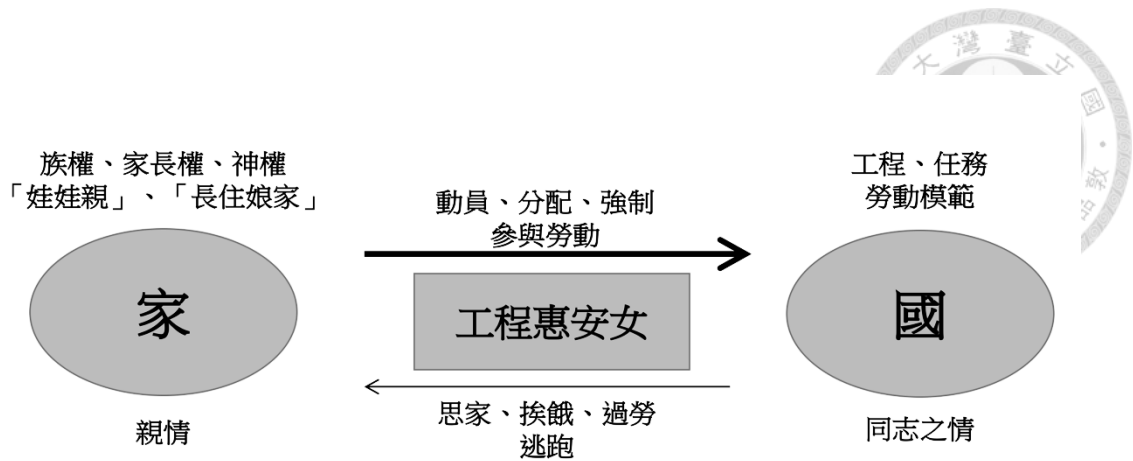


圖 29 「國」、「家」在婦女身體上的拉扯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婦女身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範和使用，的確是婦女解放的一種成果。但是從當時的形勢下客觀分析，大躍進時期中共所倡導、鼓勵的這種直接參與勞動的婦女解放運動主要目的還是在於國家對婦女的生產能力的徵用，即對婦女身體的工具化使用。我們看到了擺脫了家庭家長權、父權、夫權的婦女被放置到一個嶄新的政治空間下，她們賦予了新的政治任務和社會任務。對於「工程惠安女」而言，參與工程建設的代價就是接受國家的勞動規訓。勞動佔有了她的全部休息時間和生活空間，更進一步地充斥了她們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領域，將她們從肉體到精神全副武裝起來，鍛鍊成國家這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國家話語權力塑造出了婦女勞動模範這種理想的身體形象，從表面上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延續和進一步發展，但實際上，它更是國家權力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女性身體的又一次工具化使用。國家在惠安水庫這個工程中，可謂是名利雙收，既建造了大型的地方性水庫，又塑造了全國婦女解放代表，完成了「水利大躍進」和「婦女大躍進」的雙重政治任務。

「勞動光榮」與「婦女解放」的意識形態融合，「合作社」大集體分配制度改革，「黨團帶動」與「苦難回憶」的情感動員模式，促使廣大的惠安女主動或被動地進入水庫工程建設的權力場。識字教育、民歌傳唱，婦女的身體在工程場域中被激勵，被管理，被規訓，權力無所不在滲入每個婦女的身體。勞動競賽的鼓動，說則提供婦女解放的機遇，實則推動工程建設速度，整個工程場域成為了力量和技藝較量的場所。婦女們試圖透過公開的逃跑或隱匿的抗命，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然而，強制和抗拒逃跑以更強的力道在拉扯身體。這個時候，與其說工程是女性解放的空間，不如說是女性禁閉強制勞動的地方。



圖 30 工程惠安女的規訓與反抗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勞動力問題是經濟使用和政治干預兩個層面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女性進入工程的勞動場域，是一種另類的身體和思想的雙重規訓。如同 Foucault 所言：「這種對肉體的政治干預，按照一種複雜的交互關係，與對肉體的經濟使用緊密相連；肉體上基本上是作為一種生產力而受到權利和支配關係的干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當它被某種征服體制所控制時，它才能形成一種勞動力；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它才能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2003:167)。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任務前，國家權力將婦女身體放置到一個更大、更嚴密的戰略空間中，使得婦女成為工家權力工具驅使、利用的對象。宣傳與動員、競賽與獎勵、逃跑與強制，「工程惠安女」正是國家在工程推進過程中對婦女身體進行了規訓和塑造的結果，使得這一群體在短暫的時間內完成生活場域的切換和勞動場域的規訓。以「惠女」命名水庫，是以國家權威肯定了的惠水水庫工程的婦女特質，體現了國家對惠安女身體的再一次規訓與利用。然而，惠安女呢？除了名，她們到底經歷了什麼。下一章，將跳脫身體的社會建構角度，從身體的角度，探討在國家的身體規訓下惠安女的身體現實。

第四章 飢餓、閉經、傷亡：身體的現實

「那時候百分九十的婦女犯婦女病，勞動過度」——楊亞嘗

「工程惠安女」所呈現的勞動特性，不是參與普通的農田勞動，而是參與水利工程修建的高強度勞動。以身體作為線索來討論惠安女的勞動規訓，企圖將身體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為權力規訓、操控和對抗的對象。根據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工程惠安女」的身體塑造，只有在社會主義勞動（興修水利、農業現代化）與婦女解放（婦女翻身）的政治理念輸入，並且獲得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組織型態的支持之後，才能真正地發揮作用。這種工程的政治學在惠安女性那裡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身體比喻，叫做翻身。然而，惠安女的身體在工程中完成了勞動規訓，是否得到了翻身，是否得到了解放呢？本章試圖，跳脫國家的概念，直接關注到婦女的身體現實，即工程中婦女的身心健康狀況。

健康—無論從婦女權利、婦女地位還是婦女生活質量來看，都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健康的含義不僅僅是指身體沒有疾病，而包括身體、心理以及社會適應良好的狀態（高小賢，2005：169）。從今天我們所看惠安女水庫的文本中，我們只看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婦女如何進行偉大的勞動，卻沒有看到婦女因為勞動所造成的身體傷害現實。黃金麟指出，身體是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和結果的同時，不可忽略身體的生物需求和自然慾望—這些被建構論排除的成分—對社會建構產生的抵制作用（黃金麟，2009：18）。對於身體，我們要暴露它們，相信它們，肯定它們，承認它們，強化它們，絕不將它的生物性隱匿起來（汪民安，2003）。因此，本章試圖身體的社會建構面對惠安女真實的身體狀況，站在惠安女性身體的立場，察看惠安女在工程中的身體現實，以及主動與被動的身體經驗。

第一節：飢餓

身體首先體現為物質，然後才是精神的。飢餓是人必須面對的最基本現實，正是這樣的現實，讓食物成為有效的勞動規訓方式。飢餓是身體的本能，是身體永遠無法擺脫的對手，無論通過什麼途徑對它做出反抗，用不了多久，飢餓就會捲土重來，重新取得對身體的主導權，使得身體重新臣服對於它的統治（祝勇，2008：65）。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在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之下，吃多少吃什麼已經不是人能自己選擇的，大鍋飯的好處除了是「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的勞動規訓方式。



吃多少都是上面下任務，這邊生產隊送上去的，然後統一分配的。(吳延口述紀錄，2017/06/04)

到了 1959 年底，全國糧食短缺，困難時期，吃的非常差，但是勞動強度不減反增。並且在非常時期，吃的量都是嚴格控制的，地瓜幹三兩放在袋子裡，每個人一袋。

1959 年，吃三兩，今天晚上 7 點左右出工，要到明天早上 9 點鐘左右才能收工。草鞋穿在睡覺都忘記脫。就三兩，地瓜幹也三兩，米也三兩，吃地瓜葉，吃竹菜頭，在埔兜的時候，去跟群眾要好幾布袋的乾地瓜葉，弄來再加鹽下去洗，地瓜粉和一點點下去和，捏成一團一團，反正都要吃。(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1960 年就沒了，三兩地瓜幹，有時候有米，非常非常餓，但是也要一直幹。看到你沒在幹活，放個烏龜(畫在紙上)，插在你身上。(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當食物不可得，惠女們只能通過勞動來換取食物。然而，不是說多勞動可以獲得更多的食物，每個人的量都是一樣的。不足夠的食物，讓婦女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身體，一條腰巾、一條草繩，成為對抗飢餓最有效的方式。

拴個腰巾，為什麼要拴在腰上呢？那時候真的非常餓，用腰巾綁在腰上防止肚子餓。如果餓了，就再拉緊，這樣能助力。(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腰上都會綁草繩，餓的時候就用力再拉緊。要是時間沒有到，餓死你也要繼續跑，不允許你停下來。(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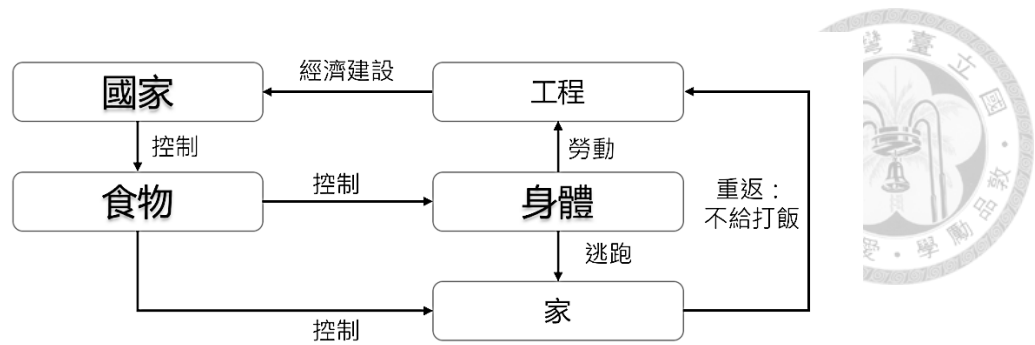


圖 31 飢餓的身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惠女們吃著貧瘠土地的地瓜，用身體勞動試圖逃離現狀，當飢餓成為常態時，食物便成為最有利的勞動規訓工具。事實上，不管勞動強度多大，婦女們最在意的事情是能不能吃飽？挨餓、不能吃飽成為她們想要逃離勞動的主要原因，而沒有飯吃，成為他們重回工程進行勞動的最終現實。

第二節：閉經

工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婦女特質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工程的勞動強度並不適合女性，然而廣大婦女正是在國家的號召和鼓動之下，主動被動地參與到這場工程建造中，付出的是沈重的身體代價。「在家正常，去水庫工地就斷經」的事實，體現出來的正是婦女的「工程不適性」，正是國家為了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控制，忽略了女性的身體真實狀況。

我就閉經了一年半，在家裡的時候很正常，去到水庫那邊就閉經。(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不斷的勞動競賽，促使許多女性全然不顧自身的生理條件和心理條件，紛紛加入其中。極高的勞動強度加上極差的飲食條件，讓許多年輕婦女都「患上閉經絕經」，有些人甚至是絕育。

那時候百分九十的婦女犯婦女病，勞動過度。我就是一年多沒來，那時候到省裡開會，到後面轉去北京開會，在北京火車站才來了月經。(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4)



有些因來月經也不管不顧，導致百分之五六十的婦女閉經，更有甚者落下終身殘疾（如喪失生育能力）³⁴。（張敏玉演講內容，2009）

根據楊亞嘗的回憶，當時有百分九十的女工都患上婦女病。在張敏玉的回憶中，有百分五六十婦女閉經。閉經具體的數量目前已經無法考據，但是勞動對婦女身體造成巨大傷害，絕大部分婦女閉經是不爭的事實，也造成了有些人絕育的後遺症。吳延回憶到當時不是「有經血排不出，那時候根本沒經血積在體內」。

那時候，大家大都斷經了，來也只有少數。吃不足，體質不好，像現在的人沒幾歲就生孩子了，那時候的人都二十七八歲還生不出孩子，沒血生育，到很多歲才生。像現在人有經血排不出是病，那時候是根本沒經血積在體內，沒那個身體條件，每天吃地瓜乾配酸菜蘿蔔塊。（吳延口述紀錄，2017/06/14）

在被動的身體層次，除了高強度的勞動以及極差的伙食條件，造成廣大婦女閉經還跟國家以及婦女本身對身體的忽視有關。事實上，大躍進期間全國婦聯規定了「四期保護」（經期、孕期、產後、哺乳期）、月經掛牌和「三調三不調」（月經期調幹不調濕、孕期調輕不調重、哺乳期調重不調遠）等保護婦女制度，然而，在執行中卻被批為右傾保守思想，人們認為「婦女與男子比起來有其一定的身體特點，在生產和生活上對她們適當地加以照顧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過分誇大這個特點，是錯誤的」（陳正人，1958）。導致合理使用和必要保護婦女的制度形同虛設。工地的領導特別是男幹部普遍缺乏保護婦女的意識，有時候不僅不照顧反而有體罰現象。

當時有一個東嶺的惠女水庫工人，懷孕了的，不敢說，大家認為她是偷懶不去做事，在草房躺著，就被拖去打針，後來大人小孩都死了。（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14）

³⁴ 讓生命之花在不屈中綻放，《惠女水庫 巾幗英豐碑》，2009：106。

婦女幹部大多能夠體諒婦女的痛楚，但是在任務面前，一般會適當安排輕活，實在痛到不行當你覺得不行的時候會讓休息一天。

就給他們安排比較輕的活，要是實在身體素質比較弱的，後面水庫的大隊指揮部有組織一些打草鞋的，就派他們去打草鞋。(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另外，婦女也普遍缺乏衛生知識以及存在較多的封建意識，有了月經常常滿不在乎或者羞於表達。

痛經誰敢說，不敢說。我是在潰壩搶救那天晚上就是剛剛好月經來，那天晚上就讓血一直流著直到早上，也不敢說，以前不像現在，都不敢說，暈倒了也不敢說這些，覺得很害羞。(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來月經的時候，以前是用破衣服破布撕開用，不像現在有衛生巾，月經來的時候，大腿溝會被擠得赤紅。布質差，加上大熱天流汗，到了晚上，用清水洗一洗，用類似爽身粉的東西拍一拍，隔天早上會比較清爽，但是很快就又會難受了，真的很難，有時候眼淚都滴下來了。(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14)

傷害最嚴重的是一些婦女為了完成生產定額或趕超先進，往往隱瞞痛楚和不適，導致生理上的惡性循環。特別是一些積極份子，認為自己是骨幹，在生產中不能不帶頭，必須趕在別人前頭。如柳姓女工「身體不好，患長期婦女病」，仍「日日滿勤」，「並在一千五百二十公尺運距上，單人推雙膠輪車，日跑 18 趟，行程一百六十二華里」³⁵。關於斷經的真正數量已經難以追蹤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閉經是惠女水庫工程女民工的普遍遭遇，我們很難想像，讓婦女身體的正常生理現象都無法維持的解放，是怎樣的解放。

婦女在工程不適應性，表現最突出的是閉經。關於斷經傷害的事實，應該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重原因交疊的。從被動的身體層次來看是食物匱乏、勞動過度、以及國家缺乏婦女保護意識所造成，從主動的身體層次來看，是婦

³⁵ 英模風采，《惠女水庫 巾幗英豐碑》，2009：55。

女缺乏衛生知識、存在一些封建思想，以及忍痛堅持上工所造成的。閉經給女性帶來的最大的影響對生理生命傳承的影響，表現在普遍的生育延遲，甚至是絕經絕育。



圖 32 閉經的身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三節：傷亡

由於數據的缺失，以及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的影響，目前幾乎難以接觸到大躍進時期水利運動傷亡的直接研究。同樣的，在惠女水庫的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眾多傷亡，目前也無法得到確切的統計數據。本研究試圖，通過口述歷史紀錄來呈現當時的傷亡狀況，試圖更加接近身體的真相，也探究婦女在傷亡的身體上主動和被動的經驗。

一、生病與受傷

1958 年 8 月份民工進場，但貧乏的生活條件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一直沒有改變。當時很多婦女剛到那個地方不能適應，每天晚上偷偷哭泣，一些人患了憂鬱症³⁶。(張敏玉演講內容，2009)

³⁶ 讓生命之花在不屈中綻放，《惠女水庫 巾幗英豐碑》，2009：106。

從婦女進場的那一刻起，傷痛（包括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就一直伴隨著婦女的身體。如上所述，勞動競賽在增強意識形態輸入的同時加強了婦女的規訓內化。在這樣的過程中，在勞動中受傷被國家建構成是光榮的事蹟。在《惠女鎖蛟龍》一書中，通過眾多的英雄事蹟，來建構「光榮負傷」的觀念。

為了惠安五十多萬人民的幸福，負這麼一點傷，也是非常光榮的事情，我不怕任何困難，一定要用比鐵還硬、比鋼還強的意志，堅持幹到完成任務。

（汪憶今、王順興，1962：103）

這樣的建構確實有其事實的依據。在口述歷史紀錄過程中，發現每個人幾乎都有負傷狀況下主動上陣的經驗。然而，仔細研究可以發現，這些負傷堅持崗位的經歷，通常與「勞動模範」的榮譽相伴隨。換句話說，「負傷上陣」在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勞動模範」的評選，促進了這種狀況的重複生產，大部分婦女認為「負傷上陣」是「積極」，是「先進」，是「具有高度共產主義風格的勞動婦女」的體現。

指甲都掉沒了。當時的護理員說，當天不要去做事了，我說不做不行，做事的時候膿水都流出來了也沒休息，都忍著。有叫我休息，但是我自己不休息，休息不了啊，一排三四十個人，我一個人休息就會影響到排里的其他人，別人會覺得說為什麼你能休息我就不能休息。那要是我堅持住，大家會覺得，手都傷成那樣了還在做，給他們做示範鼓勵他們。（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14）

柳秀秀在競賽中，右手被壓傷，送到工地醫院住院，但她第二天就偷跑出來，被塑造成為「具有高度共產主義風格的勞動婦女」。這樣的例子在《萬女鎖蛟龍》一書中不勝枚舉，許多民工以身體作為資本加入勞動競賽中。工地標兵許配「圍水壩處於緊張危險時候，她害病，幹部一再勸阻無效，她還冒著雨搶修兩天兩夜沒有闔過眼，吃不下飯，用頭巾拴緊腰身，堅持猛幹，腳又發生『沈底』，開刀三次，她忍受疼痛，繼續出工，沒缺過一次勤，在攻打日產萬方關的激戰中，許配帶病上陣，單人推車，在工地暈倒三次仍然不願下火線，終於超額完成 235%」。水上英雄張招治「當大壩臨時溢洪道堵口的緊張戰鬥開始時，招治同志突然生病了，中隊長和指揮員一再動員她休息，但這個頑強的

姑娘無論如何也要參加戰鬥，帶病上傳，連續激戰四天，在三千二百米的運距中，計駛船六十六載，超過定額的兩倍一，激戰中是如此，平時她也是天天超額，日日滿勤，曾創造了一擡六舟高產拖帶先進操作方法，超產四倍半，是『船運標兵』。



缺乏現代的工具，如此多人，勞動強度如此大，安全事故頻頻發生。我們在口述紀錄中，看到了另一個身體的現實。

到 1959 年真的有夠傷心，在大壩勞動，每次競賽都有去，穿萬里鞋，我鼻骨斷了。競賽，早上好吃的煮了吃了，那時候跟飛機要飛了一樣，下去要倒土的時候，鼻子摔到車後斗，鼻骨斷了。在泉州住了一個多月。(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單單我們惠女水庫，住了五個在泉州醫院。最可惜的，楊美英不知道怎麼補貼，從背上連土壓下來。我們去泉州看她的時候，她說「我這個腳，你拿斧頭來砍掉」。很多個殘廢的。當時惠女，全部打夯，只有一台壓土機，全部都是人工，獨輪車、板車，三兩天競賽一次，三兩天競賽一次。那是賣命，不是再賣什麼？(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那時候非常硬，傷風感冒都不能停，非常歹命。(艾亞抱口述紀錄，2017/02/20)

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前，身體的生產功能為國家所徵用，同時也看到了國家和婦女在「傷病」身體上的拉扯。裝病可以是一種規避勞動的方式，然而，最終的你能否休息還是掌握在醫生的手中。

不能休息，因為任務在緊張，吃了晚飯，有的勞動力比較弱的就偷跑回家，假裝頭痛，假裝不能出工，肚子痛，就要叫醫生去檢查，檢查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愛困跑回來了，所以才那麼嚴格，你要是想休息，生病了想休息，要醫生的請假條證明。(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感冒傷風什麼的哪裡可以看。醫生檢查說要休息，你才能休息，不然不能讓你休息。你要是沒有給醫生看，然後在草房躺，她會繼續把你抓出去，非常嚴格。(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2/16)



在醫療的權利關係中，患者永遠處於被支配、被規訓的地位上。當醫生是國家所把控的時候，患者身體成為國家所能驅使和控制的工具。

被撞到，壓到，手腳經常受傷，去醫療室上藥，可以休息一下，但不會讓你回家。有叫衛生員在檢查，受傷了就給你消毒上藥(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6/14)

在任務和勞動競賽之前，換句話說，是在經濟建設目標前，每一個勞動力都是非常重要。「休息條」成為可以休息的憑證，而對於身體而言，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傷，是無法獲得休息條的，總會有適合你的勞動可以做。

不能休息，要有休息條，要醫生打假條，不然不讓你休息，而且不讓你吃飯。強迫，都是強迫，不讓你吃。腳在溪底被割了，不給休息條，繼續下工地。剛割了，發炎，疼到要命。不給休息條，不能下水，就安排去打土。不給吃飯，要到吃不下要臥床才有休息條。沒有休息條，你就去做。(王荷棗口述紀錄，2017/02/21)

為了防止「裝病」的頻繁出現。縱使你生病有了休息條，食物也只能吃一半。如果是比較重的傷，也是嚴格限制休息時間的。

我跟你說，有的病號，要有醫生證明，才能吃一半。(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2/15)

手上傷口大概十公分，非常大跨地縫了五針，人鑽進車裡面，起來哭說我的肉不知道掉哪裡去，鮮血直流，那邊的衛生員縫，像現在不就得去大醫院輸液住好幾天。剛抽完線就要繼續幹。(艾亞抱口述紀錄，2017/02/20)



我高血壓請假回來，民工都知道，我要是要高血壓，臉上一直發紅。請假回來，去惠安看醫生，到惠安禮拜堂，遇到指揮員，說那邊要開除你的黨籍。我吃完三帖藥，就繼續去了，反正拖病都要去。(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高強度的勞動，負傷上陣，很多婦女留下了後遺症，伴隨其人生。

夫家的二姐也是去推車，胸骨被撞了一下，有傷，天氣不好就會疼，不怎麼能幹活。(吳延口述紀錄，2017/02/14)

你看我的腳這個水腫，走路不方便，都是當時在水裡浸泡的。(王荷棗口述紀錄，2013/10/06)

因為當時在水庫的時候，長期泡在水里，後面變成婦科病，回到家裡經血一直來不停，去看醫生，吃了六貼藥月經才停了，停了以後整個人就虛掉，後面整個人開始臉色發黃，又開始找各種醫生看。從水庫回來以後，整個人就一直在病，一直好不了。(楊亞嘗口述紀錄，2017/07/15)

事實上，到了後期，當「安全」也變成評比的項目之一，導致很多領導對於傷病都儘量的低調處理。

出了事故，你們這些領導不死也得死，叫去站，叫去批，批評你不注意。所以我這背上背了 11 個病人，每次出事，就背著跑，先掩護以來，免得被批評。要是出事，隊長是要跑沒路。(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二、死亡

死亡是禁忌，死亡的身體，是工程中最被隱匿的。目前沒有看到任何關於惠女水庫中死亡的文本紀錄，但是這並不代表「死亡」的不存在。在口述紀錄中，關於死亡的字眼慢慢浮現。



就是在競賽，這個大石輪拖過來，那個拖過去，中間沒有來得及閃開，就被壓死了，那是個事故，好幾十個人拖。指揮要是沒有注意，兩個大石輪就會相撞。(吳延口述紀錄，2017/02/14)

有一次，去大壩開會剛好遇見高產日，城關一個被石滾壓壓死。又一次，是去開會，高產日下雨，赤土坑挖地非常深，有一個掉下去死。還有一次，去南塘大渡槽，看見有人拆模板，掉下來死。損失的人相當多，都是事故。(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對於「死亡」事故的處理，只是從口述中得知，在當時人民公社的情況下，身體也是集體的，是國家的，沒有賠償。然而由於未能訪問到當時的指揮高層，對於這部分只能持保留態度。

當時損失的人，死就是白死，沒有什麼賠償，最多就是把屍體運回來。(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死就是死，有五毛錢能賠償？死完就送回來，還能怎樣？以前真的是太吃虧，死在那個社會。(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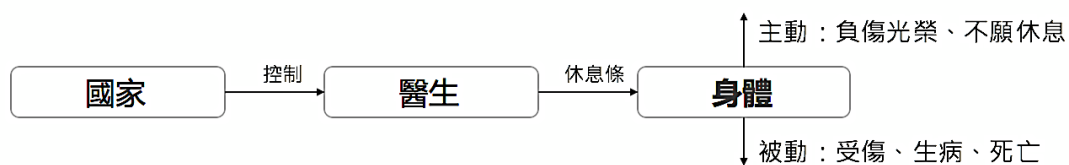


圖 33 傷亡的身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國家通過醫生取得了傷病身體的主動權，然而婦女所表現出來的狀態是複雜的，她們受傷、生病甚至死亡，但卻也不顧傷痛、不願休息、負傷上陣。

第四節 婦女的工程特性：男性化、階級化



從國家的立場，站在工程的角度，其具有婦女特質，讓其兼具「水利」與「意識形態」的雙重性格。同樣，從婦女的立場，站在身體的角度，其也具有工程特性，讓其面對的不僅僅是家務勞動，更是高強度的工程建造勞動。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勞動」被認為是「婦女解放」、實現「兩性平等」的重要方式。國家在運用婦女勞動力上，巧妙地建構方向性的男女對比，簡單地將「女性男性化」看成「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標誌，「工程惠安女」所從事的勞動，所經歷的故事，就是這種理想的極端化。整個工程場域像是一個「男女平等」的製造場，國家發展策略和婦女解放策略交織在一起，試圖製造出一個男性化的女性身體，體現出來的正是婦女身體嚴重的「工程」不適性。

一、女性身體的男性化

打、挖、運、夯，這些一向被認為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勞作，在惠女水庫工程中，成為廣大婦女每天的勞動內容。雖然婦女從事這些勞作，並非完全出於自願，但是在國家的宣傳引導之下，婦女的這些工程參與成為廣為流傳的英雄事蹟。婦女與男子進行比賽，以男子作為標準，不輸給男子，這種簡單的「男女對比」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衡量「婦女解放」的標準。

惠女水庫和灌區工程建設需要很多石料，又要打掉大量的亂石，當時急需技術打石員三千多人，而工地會打石頭的男工僅有八百多人³⁷。於是，工地黨委決定用戰地練兵、以女代男、在民工中培訓打石的方法，提出「一天苦學、兩天能幹、三天技術樣樣精」動員口號。然而，開山打石、炸藥爆破，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按照過去的舊習慣，女人是不能打石頭的，更不要說開山了，然而在惠女工地中，劉盛珍主動學會了打石開山，其中數十名婦女還成為開山能手。

青年吳銀妹的丈夫是個打石工人，他聽說銀妹要學打石頭，起初是堅決反對的，說這不是女人幹的事，並叫他的母親帶了一封信，到工地勸說他。銀妹當場問婆婆，當石工不好，你兒子為什麼去學石工。婆婆說，他是男人，你是女人。銀妹說，如今女人和男人一樣，在勞動中是平等的。婆婆無法，只好讓他學習。(福建日報 1963/11/22)

³⁷ 惠女的故事：開山女英雄，《惠女水庫，巾幗豐碑》，2009：42。

當時劉盛珍等 11 人要求參加開山打石時，男石工張水來譏笑說：「如果這些女人能學會，我讓她們從頭上跨過去」。許多人勸說她們還是壩區推車，但是姑娘們堅決要學習。剛開始學習的時候，要舉大錘，手上都會起水泡，但是她們還是堅持下來。學徒打炮眼每日定額是 1 米深，劉盛珍完成了 3.15 米，超額 215%，整個學徒小組平均超額 65.5%。學會了技術她們並沒有就此停下，而是大膽引用新的「葫蘆炮」方法，一個 4 米、大如井、式樣如葫蘆的炮眼，裝進炸藥 300 斤，炸開石頭 864 方，提高工效 38.4 倍，節省勞力 594 個工日以及炸藥 300 斤。她們的成功爆破，終於讓老石工們真誠拜服，工地快報稱讚到「開山中帼逞英豪，當今婦女賽男人」。這樣的簡單的「女性不輸給男性」英雄事蹟在惠女水庫工程不勝枚舉，並成為官方媒體宣傳和引導的對象。

在惠女水庫工地上，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廿二姐妹」飛車隊。她們曾經在同男民工的運土競賽中，連續三次打敗了對手。(泉州日報，196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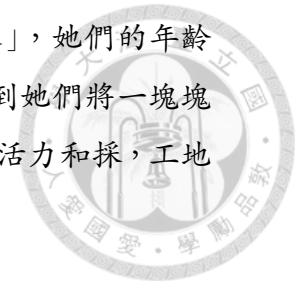
有一次幾個男民工自己抓了一只夯，要同姑娘們競賽，可是打不多久，這幾位民工累地滿頭大汗，堅持不下來，而姑娘們還是哼著歌子，若無其事地打著。(福建日報 1959/3/7)

此外，在官方的書寫的宣導中，人們常常用男性化的行為、氣質、言語來審視和評論男性。將普通「賢妻良母」重新塑造成為「開山女工」、「扛石女工」等「鐵娘子」的形象。這些「陽剛」之詞被披在女性身體之上，凸顯了女性男性化的意圖。並且這種「比男性厲害」的婦女身體塑造通過官方媒體的報到成功地滲透進婦女的印象當中，成為婦女的驕傲。

開山女工用繩子綁住腰身，用有力的雙手，舉起鐵鎚猛敲著石頭，詩云：山險何足怕，志比鐵還堅。高舉大鐵錘，劈開萬丈山。(汪憶今、王順興，1962：112)

打夯女工則揚起百斤重的石夯，兩人握夯柄，四人拉夯繩，「聲音壯美，動作整齊」。(汪憶今、王順興，1962：164)

周蜜、錢素等極為女同志不服輸組織了一支「八人母親隊」，她們的年齡分別在 28 到 46 歲之間，分別有著 2-4 個孩子。當大家看到她們將一塊塊巨石穩步扛上渡槽時，無不為她們堅毅的氣魄和煥發青春活力和採，工地到處傳揚「八母高空扛巨石」的英雄事蹟³⁸。



壩頂廣場「扛石的惠安女」雕像：兩個帶斗笠、裹花頭巾、穿短裝闊褲的惠女正扛著一塊花崗岩。她們一手握著擔具，另一手緊拉麻繩，赤足前行，臉色安詳。正是惠安女力量型與陽剛化的最佳再現。鼓勵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參與公共勞動，幾乎成為當時國家營造的唯一的婦女解放途徑，「工程惠安女」所從事的勞動，所經歷的故事，就是這種理想的極端化。

在論及女性勞動中，晚近的身體化（Embodiment）與去身體化（Disembodiment）的論述，同時指向了父權體系的主軸。雖然二者看起來是相反的，但其實其指涉都是指向性別權力的不平等。去身體化（Disembodiment），是企圖讓你忘記你是一個女性的身體。不顧女性身體的生理特點，一味讓女性承擔高強度地勞動，對女性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身體化（Embodiment）則是把你的身體變成男性的身體。所以，它是雙重否定的，它讓你感覺到你的身體，但是讓妳感覺到的是跟男人一樣的身體。這點在上述的惠安女身體的陽剛化、女性的男性化過程中，體現地淋漓盡致。在惠安女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實質上就是以否定有男女的差異，來創造平等。楊齊福、汪煒偉（2011：70）指出表面上看，「工程惠安女」的形象塑造，顛覆了傳統男性優勢的理念，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空間，踐行了婦女解放的理想。但實質上，女性身體的陽剛化，女性男性化，仍是以男性為中心，以男性為評判標準，是男性霸權的另一種表現。

二、女性身體的階級化

「工程惠安女」所體現出來的，正是國家在經濟建設和婦女解放政策上的複雜交織。然而，不能否認的事實，國家的初衷和最終目的上都是對婦女生產與意識形態功能的雙重徵用，並且階級化的婦女解放模式。在惠女水庫的建設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家對「社會主義女性身體」塑造的著力特別著力，以服膺婦女參與勞動的最終目的。

³⁸ 惠女的故事 深谷出天橋，《惠女水庫 巾幗豐碑》，2009：44。



(一) 階級翻轉

階級身體的區分在整個工程場域中，也是體現的。絕大部分婦女幹部都來自貧農家庭，有著被壓迫的過去的。而本來的富中農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則納入被管制的境地，稱為管制份子，然後由原來貧農階級的婦女來領導，頗有一種「階級翻轉」、「人民當家作主」的階級鬥爭成分在裡面。

我非常歹命，全延壽大隊，9個管制分子（壞成分），全部安排到我那隊。那時候說要管理管制分子，我是非常害怕的。那些當時都是地主、惡霸，都是帶人來抓壯丁的，雞鴨、鼎灶都都被搬出去。（張荷省口述紀錄，2017/02/16）

那時候我們中隊裡也有很多管制份子，都要我來領導，我就讓他們都去負責修畚箕，整個中隊將近三百個民工，那麼多畚箕，活不比工地輕鬆。（蘇姜口述紀錄，2017/02/18）

無可厚非，廣大婦女進入以階級為主要動員方式的組織之中，同時也意味著女性主體是工農女性，階級身體的區分也保持了婦女領導身分的唯一，都是來自貧農家庭。身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政黨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無疑帶有強烈的馬列主義婦女觀色彩。按照馬列主義觀點，婦女運動是人類解放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存在。早在中共領導婦女運動發端之時，其已經具備了鮮明的階級色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生產，與勞動相關聯的論述，決定了婦女的主體是工農女性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女性。

1964年因海外關係，大伯張炳煌去台灣，二大伯張炳南去新加坡，被勸退回鄉。（吳荷米口述紀錄，2017/02/15）

18歲預備黨員，因為台灣家屬，還有一個堂哥被抓去蘇北，所以沒有轉正（吳亞花口述紀錄，2017/02/22）。

在「成分」的管制劃分上，中國共產黨是十分嚴格。對於這個對台前線的小城，那些通過水庫建設當上幹部的一旦被確認為有「台屬」，直接清退。



(二) 階級解放優先於婦女解放

福建解放了，惠安的婦女解放了，她們擺脫了政治上的壓迫而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從此以後，擺在惠安人民面前的嚴重任務是消滅反動統治遺留下來的貧窮災難，興修水利，建設水庫，消滅乾旱和封殺災害，改變惠安的面貌。(福建日報 1963/6/4)

唯有推翻反動階級，消除貧窮，惠安婦女才能解放，這樣的邏輯將婦女解放在階級解放之後。在蘇維埃的革命中，無所不在階級革命還是處在領導的位置：婦女的人身解放問題被放置在階級跟革命中，才有意義和價值(黃金麟，2005：18)。無產階級解放是婦女解放的前提，沒有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婦女的真正解放，延續戰爭時期的婦女解放策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同樣還是處於領導地位。婦女需借助「國家」的解放、「階級」的解放而獲得「解放」，而其性別問題的進一步解決仍需要透過宏大的政治與社會改革來實現。(楊齊福、汪煒偉，2011：82)。

過去惠女們受著統治階級餓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受著暴風、乾旱和風沙的災害，而且受著各種封建陋俗的束縛，過著難以忍受的的痛苦生活。(人民日報 1959/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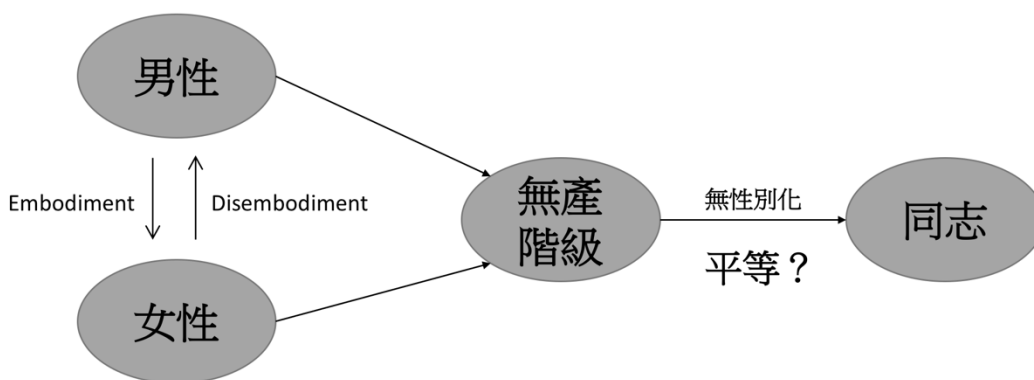


圖 34 男性化與階級化的性別解放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工程惠安女」身上，「夫權」的性別壓迫並不凸顯，婦女和男子同樣是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受害者。這樣的性別論述企圖將上面所論及「女性男性化」更進一步，以「無產階級化」的策略，將解放後男女的關係解釋為肩並肩作戰的「同志」，以此來建構「婦女解放」的事實。顯然這種在階級解放論述下與婦女解放的意涵相去甚遠，服膺於階級解放的婦女解放，不過是國家徵用婦女身體的一種說詞。這種性別解放模式，造就了「男女平等」的現象，然而這裡平等，是以男性為標準的平等，是國家對身體的平等利用，其中忽略的正是女性自身權力的擴展和女性利益的保護，惠安女進入到工程之中，從事超過婦女身體承擔的勞動正是深受這種模式的指引。

楊齊福、汪煒偉（2011：74）指出，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固然為中國性別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許多有利的平台，但其結果是造成了社會中的性別意識弱化。人們專注於解決社會的普遍問題而無暇照顧女性的權益。在惠安水庫的工程推進過程中，人們大書特書的是「黨的領導下的惠安勞動婦女向自然進軍的雄心壯志和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³⁹，注重的是如何利用惠安勞動婦女的雄心壯志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來改變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這是以婦女社會責任感的發揮來解決國家、社會和勞動階級發展中的問題，而並非是對女性本身問題的關懷。儘管人們也一再強調「婦女」、「女性」，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種性別意識往往通向了「無性化」，即認為「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兩性的平等權利在政治上得到確認」、「在生產、生活遺跡思想意識上的性別歧視已經大體消除，至多剩下一些殘餘」⁴⁰。

被再現的是以婦女為主力軍建造大型水庫的偉大事蹟。被隱匿的正是「婦女解放」背後，惠安女身體所遭受的現實。勞動競賽的鼓動和勞動模範的樹立，讓婦女主動或被動地進入高強度的勞動中。在「組織軍事化」和「生產戰鬥化」的號召之下，婦女們吃住在工地，夜以繼日地進行體力勞動。極差的飲食條件和極強的勞動強度，讓絕大部分的女性遭受斷經，甚至留下絕育的後遺症。還有被永遠遺忘的是那些沒有被紀錄的傷亡。飢餓、斷經、傷亡，無論政治社會如何建構，這樣的身體現實，使廣大惠安婦女自然無法與「解放」相聯繫，國家利用「女性男性化」來促進「男女平等」的「婦女解放」途徑，實則是對婦女身體的徵用，忽略了婦女身體本身的生理差異，整個身體已然成為國家經濟建設的工具。不斷的勞動競賽導致的後果直接傷害了婦女身體，也妨礙在社會上對兩性平等的全面理解。形式平等的結果造成了實質上的身體傷害與不平等。

³⁹ 惠女頌，福建日報，1963/06/16。

⁴⁰ 莊東賢 惠安水庫放歌，福建日報，1963/6/18。

國家關切的是「工程」的「婦女」特性，以此來完成惠安婦女身體的國家符號轉換—婦女解放代表，然而這個國家整合婦女、規訓婦女的過程中被隱匿的正是，「婦女」的「工程」特性，被忽略的婦女身體生理差異，在工程中被過度地使用，正是造成這場身體悲劇的真正來源。那些傷痛，那些後遺症，成為惠安婦女身體烙上深深的痕跡，成為惠安女身上的「工程鐫刻」。這種國家主導的工程鐫刻，催生了「工程惠安女」。

第五章 結語：在規訓與解放的夾縫中生存的

工程惠安女

「工程惠安女」是特殊時間和特殊空間下的特殊產物，以婦女為主體的大型水庫工程建設在全國，甚至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特殊性，呈現在惠安水庫工程的「婦女」特性與惠安婦女身體的「工程」特性上，其背後隱含的正是惠安女身體男性化、階級化、國家化的政治過程。相對於宏大的革命敘事中對工程和婦女進行討論，本研究則選擇了「惠安水庫」工程這個小尺度的案例，進而以「工程惠安女」來重新定義「惠安女」在大躍進時期的特質。本研究重點關注在工程建設中的身體實踐過程，將惠安女的研究從傳統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的研究，拉回到具體的工程實作的微觀尺度中來剖析，通過大量的口述歷史等相關資料的分析以及研究對象的互動訪談，呈現國家對惠安婦女身體的勞動規訓以及婦女在勞動實作中的真實身體處境，探討婦女身體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以及身體的「規訓與解放」的關係。以婦女身體作為線索來討論「工程惠安女」的塑造，將身體從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為權力控制和對抗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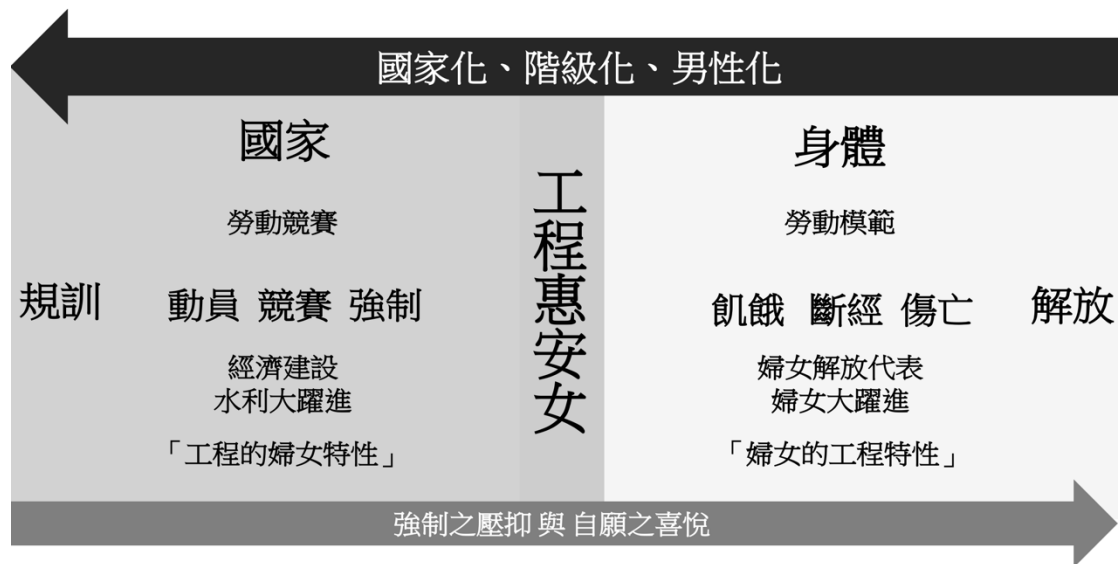


圖 35 「工程惠安女」的形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如前文所述，惠安女成為水庫工程建設主力軍，是國家「婦女半邊天」的政治環境以及惠安「十年九旱」的自然現實、「男工女耕」的社會性別分工傳

統多重疊加作用的結果。從惠女水庫到「工程惠安女」的形象符號的轉換，正是惠安形象的國家化過程，體現出了國家整合婦女人力資源、運用婦女、規訓婦女和管理婦女的過程，也演繹成國家塑造和宣傳女性的過程。然而，女性男性化、階級化的婦女解放模式忽略了性別的差異，導致了性別意識的弱化，婦女為此付出沈重的身體代價，形式平等造成了實質的不平等。本研究圍繞著兩條線索進行，明線「國家—婦女」的關係，進一步而言其呈現的是「國家—工程—婦女」之間的權力運作關係。而這個權力運作關係的落腳點，正是婦女的身體，進而可以發現本研究的暗線是身體的「規訓—解放」的關係，是「規訓—反抗—解放」的力量在惠安婦女身體上的拉扯，這是「工程惠安女」直接面對的兩個議題，結語部分將先總結兩對關係，最後回到「工程鑄刻」，試圖為「惠安女」提供新的解讀角度。

第一節 國家與婦女

惠女水庫的建造與「工程惠安女」的塑造，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控制的雙重結果。從廣大惠安婦女被動員進工程場域的那一刻起，我們看到一個帶著生產性與意識形態的「工程惠安女」身體正透過權力地行使浮現。在客觀的現實層面，當時中國農村的封建性格、貧富差距和相應存在的社會剝削，讓國家對身體的規訓成功施行，甚至成為身體的救贖。在主觀的權力操作層面，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推動，為了讓「婦女半邊天」、「婦女解放」成為事實，國家在勞動過程中用盡各種方法來規訓和利用婦女身體。在中共領導下，國家權力對婦女身體的侵入、組織、動員、訓練和使用，並通過勞動規訓把婦女身體納入權力的控制和運行的軌道，進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婦女身體的領導權」，使得婦女成為國家權力驅使的對象。

國家的主導下參與社會主義勞動，確實在最大限度內解放了的婦女，幫助婦女走出封建家庭，但它沒有把婦女交還給婦女自己，而是交給了國家。如同 Joseph W Esherick (1995) 所說的，只是從一個支配關係取代另一個支配關係而已。動員、競賽、強制的的身體規訓，飢餓、斷經、傷亡的身體現實，「工程惠安女」傳遞出來的，正是國家意志和婦女個人意志的緊張互動關係。惠女水庫的建設所反映出來的是國家對婦女身體和思想的雙重支配，並非完全源自於女性自覺，自然無法無法被視為「婦女解放」的標誌。當然國家的政治力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一些原本不合理的封建社會性別制度進行了衝擊，受到了女性的歡迎，但這無疑是相當有限的。本研究認為，「工程惠安女」所呈現出

來的問題，是大躍進時期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模式中，對馬克思婦女解放理論的教條式理解，以及執行過程中忽略男女差異的身體使用所共同造成的。

跳脫這場大躍進惠安婦女運動，本研究要叩問的是國家主導下的婦女解放是否可能？事實上，在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婦女解放與國家的利益、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王政（2005：522），指出國家和婦女解放「在本質上隸屬於兩套不同的論述體系，但在各自獨立的表述系統里成為互相可利用的資源，在共同認同的現代性向度上構建自己的規劃和理想」。國家與婦女解放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契合，如果國家注重營造促進婦女主體意識覺醒的環境，是有可能達到國家建設與婦女解放的雙重目標。然而，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婦女自身政治意識是相當薄弱的。

事實上，廣大的惠安婦女參與這場運動的最大初衷，不過是對「水資源」的渴望，以及改變一個地方貧窮落後現實的願望。總體而言，中國的農民對國家政治並不感興趣，或者說，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人們首先要面對的是溫飽問題，人們傾向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各種事物來進行評斷，崇高的意識形態宣傳無法引起她們的熱情。在口述紀錄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民工在意的是「水」，而對「婦女解放」無感，甚至不知道。至於通過勞動來促進「男女平等」，不過是屈服於威權政治的結果，只是停留意識形態宣傳的層面。

第二節 規訓與解放

規訓與解放這兩個互斥身體向度，不管在哪個時期，總是以不同的力量拉扯著身體。「工程惠安女」所包含的「工程的婦女特性」和「婦女的工程特性」，正是身體的規訓與身體解放相互交纏的複雜特質。表面上看，「工程惠安女」的形象塑造，顛覆了傳統男性優勢的理念，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空間，踐行了婦女解放的理想，解放了婦女的身體。實質上，女性身體的男性化、階級化，仍是以男性為中心，以男性為評判標準，是男性霸權的另一種表現。在有關身體解放的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女性身體若要走出國家的論述體系，進入本體建構的層次，必須確認身體的「屬己性」，然而「工程惠安女」在身體屬己性的向度上呈現非常複雜的樣貌。本研究試圖從國家、家庭、婦女三個尺度來為「工程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作一個暫時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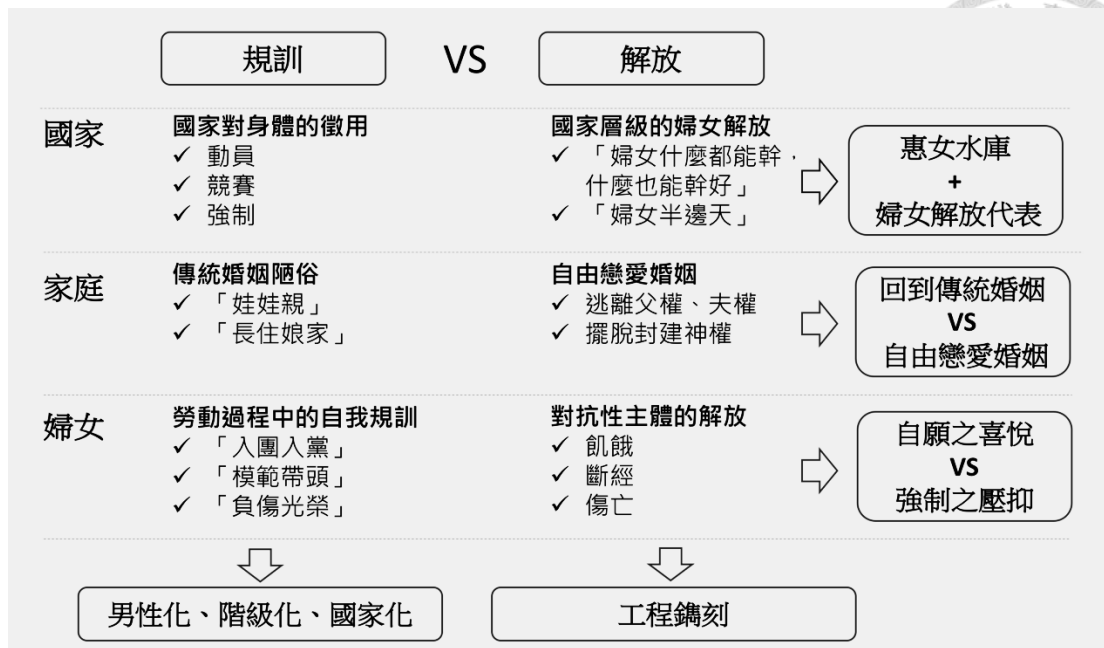


圖 36 「工程惠安女」身體的規訓與解放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國家尺度。規訓——國家把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焦慮投射到婦女身上，婦女身體同國家經濟發展網綁在一起。通過動員、競賽、強制的規訓，女性的身體成了國家可以調配、控制的公有資源。解放——「工程惠安女」成為國家層級婦女解放的代表，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婦女什麼都能幹，什麼也能幹好」、「婦女半邊天」的最佳寫照。

家庭尺度。規訓——惠安地方所存在的「娃娃親」、「長住娘家」的婚姻陋俗，以及貧困生活現實，讓許多婦女走向「集體自殺」和寄希望於神靈的境地。解放——通過工程建造，婦女走出了家庭，參與了社會勞動，某種程度上逃離了傳統的父權、夫權，擺脫了封建神權。

婦女尺度。規訓——在人民公社集體組織的形式下，婦女在工程勞動中，通過勞動競賽與獎勵、身體的文化和武化規訓、新民歌的激勵和規訓中完成了自我規訓的轉化，建立起了「入團入黨」、「模範帶頭」、「負傷光榮」的價值取向，形成了的兼具意識形態和生產功能的溫順的惠安女身體。解放——在勞動場域中除了規訓，還有對抗，婦女試圖通過「裝病」、「逃跑」，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然而，規訓與強制以更大的力量拉扯著身體，造成了飢餓、斷經、傷亡的身體現實。

並無法簡單地將國家、家庭、婦女三個尺度進行切割，總體而言，惠女水庫的完成和「工程惠安女」的塑造，國家完成了地方水利大躍進和國家婦女解放大躍進的政治任務。然而，回到家庭婚姻尺度，惠安女表現出來是「重回傳

統婚姻」和「自由戀愛婚姻」交織存在的狀況，國家在解放惠安婦女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娃娃親」、「長住娘家」的婚姻陋俗在惠安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90 年代，可見「婦女解放」在家庭婚姻層面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在婦女的尺度，「工程惠安女」所體現出來的解放是相當有限而且複雜的。工程場域的勞動過程中，自我規訓的轉化和對抗主體的解放，同時拉扯著身體，其表現出了「自願之喜悅」與「強制之壓抑」交織的狀態。

許多婦女雖遭受身體傷害，但卻高度肯定這場運動的身體解放。這正是葛紅兵與宋耕（2005：138）所指出的身體在國家面前的最大困境，「它受到國家政治的規訓，常常成為國家政治的最堅定支持者」。事實上，許多人把身體自覺地納入國家政治地一整套邏輯中，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身體如果得不到國家政治的滋養、撫育、規訓及認可，他們的生命似乎就沒有意義。這種規訓讓婦女身體感到欣喜和愉悅，使婦女相當程度上成為自願規訓的主體。這種「強制之壓抑」與「自願之喜悅」的疊加，即強制性規訓導致的反抗與自願被規訓兩種情況的交錯，正是「工程惠安女」在這場婦女解放運動中的解放困境。無法否認，「工程惠安女」塑造過程中某種程度上的女性自覺，她們主動地想要擺脫原有綑綁在婦女身上的族權、家長權以及封建陋俗。然而，她們的主動慾望選擇了將自己綑綁在國家上，甚至成為必須接受的「規訓」歷程。

沒什麼可怨恨的，黨對我也很關心，也給了我榮譽，我很感恩，我一個女的，能這樣我已經很知足了。我常常說，再紅也紅不過我對黨的紅，一心一意為黨沒有怨言。我自己身體不好，劇烈運動下身體不好也是正常的，不是說被害的（楊亞嘗口述激勵，2017/07/15）。

事實上，當我們重新回到工程後的現實，特別是從性別平等、婦女解放、婦女真實的生活狀況來看，她們傳達出來的信息是相當混亂的。楊亞嘗在惠安水庫工程修建中，找到自己的真愛，同另一位男幹部自由戀愛成婚，成為佳話，並回到生產隊擔任隊長、村委書記一直到退休；張荷省 16 歲結婚，一直參與勞動，直到 28 歲才回到夫家；18 歲結婚後，19 歲去修建水庫後留在水利局工作，25 歲被夫家叫回去；吳荷米因為台屬關係從水利局下放回來，一直守著自己不幸的婚姻。大部分的婦女，則是主動或者被動地回來完成約定的婚姻，如吳延、吳亞花等人的夫家托人帶話說要她們回來夫家幫忙，不要繼續留在水庫，而未能繼續留在單位工作。「工程惠安女」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20 世紀 50 年代這場以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為主體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複雜性與局限性。

第三節 工程鐫刻

《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⁴¹。鐫刻，指的是將銘文刻或畫再某種堅硬的物質上或石頭上。廣大的惠安婦女，從被動員進入國家主導的工程場域那一刻起，工程就開始在她們的身體鐫刻下深深的痕跡，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身份，甚至她們的命運，緊緊地同工程聯繫在一起。本研究提出「工程鐫刻」的概念，從身體與思想塑造、身份地位改變、生命傳承干擾三個方面，察看工程對惠安女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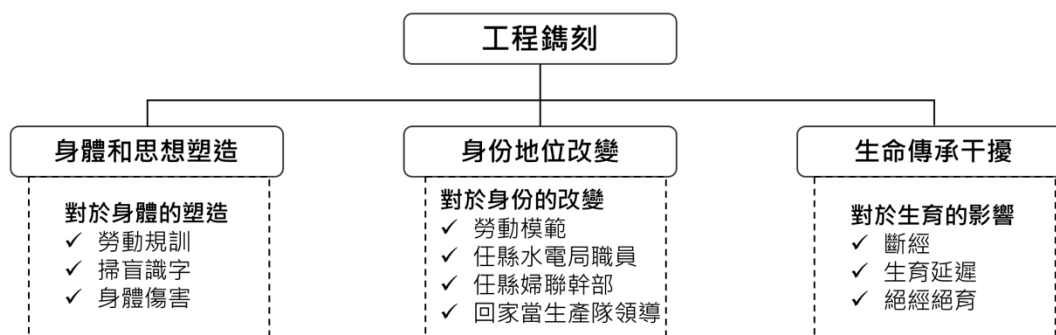


圖 37 惠安女的工程鐫刻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首先，身體和思想的直接塑造。國家透過宣傳動員、勞動競賽、掃盲識字、體操練武、民歌傳唱、強制等勞動規訓手段，對身體與思想進行雙重塑造，促進兼具生產性與意識形態效果的惠安女身體生成，促進規訓的內化，讓身體認同黨，認同國家。儘管思想上不是每個惠安女都能做到國家所期待的「覺悟」，但身體的傷害卻是共同的，飢餓、閉經、傷亡的身體傷害伴隨著每一個身體，這正是工程對惠安女身體直接的鐫刻。

其次，通過勞動競賽產生勞動模範，培養團員、黨員以補充國家的水利、婦聯幹部，在參政層次上改變了惠安婦女的身份身份和地位。在全國層級，全國婦女解放代表的地位，讓惠安女在中國婦女解放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在地方層級，現在惠安水利局、惠女水庫管理局的百分六七成的職工是當時留在水電局（後改稱水利局）的女民工的後代。另外，也有一部分黨員，成為惠安縣婦聯的幹部。然而，在四萬多名民工中，黨員的數量只有兩百六十多人，工程對於女性政治地位的改變是相對有限的。留任公職的並不多，並且有很多人因

⁴¹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eb.cgi?o=dcbdict&searchid=Z00000097570>

為婚姻而被迫回到原來生產隊。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水庫工程的建造，婦女們的身體與思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回到合作社，擔任起領導，有效地帶領生產。工程對惠安婦女身份地位的改變雖然有限，但是已在最大限度上撼動了傳統的性別關係。

最後，工程對女性身體最大的傷害，莫過於干擾生命傳承。百分九十的女性斷經，從口述紀錄中得知，普遍的生育年齡從 20 出頭延遲到了 28-30 歲。甚至造成了很多人絕經絕育的狀況，工程在惠安婦女身上鐫刻深深的痕跡。

總庫容 1.26 億立方米，總幹渠 52.6 公里、2 條幹渠總長 30.23 公里、11 條支渠總長 91.36 公里，當時的灌溉渠道通到全縣每一個存在，實際有效灌溉面積達到 8.42 萬畝。雖然，並沒有讓每個地方都實現「吃白米飯」的願望，但是至少了「十年九旱」、「聽天由命」的狀態。根據阿嬤們的回憶，地瓜再也不會枯死，放水以後，每年地瓜都好大塊。雖然還是地瓜縣，但是至少開始能夠有充足的地瓜吃飽。工程鐫刻了惠安女的身體，同時也改變了惠安的落後面貌，工程的影響伴隨著這一代惠安女的一生，並影響了世世代代的惠安人。

這場轟轟烈烈的水庫工程建造，留給她們的是「工程鐫刻」的種種。整體的婚姻自主、教育自由和經濟獨立，乃至婦女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並沒有在這個「婦女解放」的過程中獲得截然的改善。國家關切的是「工程」的「婦女」特性，以此來完成惠安婦女身體的國家符號轉換—婦女解放代表，然而這個國家整合婦女、規訓婦女的過程中被隱匿的正是，「婦女」的「工程」特性，婦女身體差異被忽略，在工程中被過度地使用，正是造成這場身體悲劇的真正來源。身體與思想塑造、身份地位改變、生命傳承干擾，工程在惠安婦女身體烙上痕跡，成為「工程鐫刻」。顯然「規訓」與「解放」之間，在個體上傳遞出來的訊息是非常混亂的，關於「工程惠安女」的想像和建構我想會始終處在爭議之中，這不是一篇論文數萬字可以界定清楚的，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

第四節 研究侷限與未竟行動

由於研究者的研究經驗不足、時間相對緊湊、論文的篇幅有限導致本研究無法鉅細靡遺地展開撰寫，主要呈現在研究概念界定、研究資料獲取、研究內容偏重身體、中西婦女解放模式對比缺乏等問題。同時，也遺憾尚未能為這些還存在的高齡工程惠安女們爭取到相應的權益。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去完成未竟的行動。



一、研究侷限

(一) 研究概念界定：婦女、女人、女性

婦女、女人、女性事實上並不是一組可以完全對等的詞彙，其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歷史。然而，由於研究者的經驗不足，本研究並無法直接處理這三個詞彙，而是直接使用官方所採用的「婦女」這個概念來進行書寫。

(二) 研究資料獲得：缺乏直接檔案資料

本研究採用的文本資料，最多的是惠女水庫管理局編的《萬女鎖蛟龍》、《惠女水庫巾幗英豐碑》和眾多報刊資料，比較偏向官方的紀實和宣傳作品。然而，由於政治原因和時間原因，論文撰寫未能獲得直接的檔案資料。

(三) 研究內容：偏重身體層次的工程鐫刻

「工程鐫刻」體現著工程對惠安婦女身體的影響，它是包括身體塑造、思想塑造、身份地位、生理生命傳承等的影響，但在論文撰寫中比較偏重身體塑造層面，而未能非常細緻地呈現其它層面的「工程鐫刻」。

(四) 中西婦女解放模式對比缺乏

本文處理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婦女解放模式，還未能跟傳統西方資本主義的婦女解放模式進行對比。

二、未竟行動


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我希望能為這些被研究者做點什麼。除了能夠帶她們重返水庫，最想做應該是為她們爭取權益。事實上，她們認為到了這個年齡（80歲左右）再活也不過幾年，之所以要爭取權益，是因為心中的不甘，不甘帶著那些「工程鐫刻」離開人世。

當然，在與惠女水庫領導溝通過程中，也會發現存在非常多的困難。首先，這專項的錢從何來？需要多少？目前還存在多少當時的民工？如何進行認證？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等等的問題都是未來行動應該努力的思考問題。


參考文獻



- Best, Steven & Kellner, Douglas, 1991, *Postmodern Theory :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ow York: The Guilford. (張志斌譯, 2011, 《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
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Deleuze, Gilles, 1986, Foucault.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楊凱麟譯, 2000,
《德勒茲論傅柯》。台北：麥田)。
- Esherick, Joseph W, 1995,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45-76.
- Foucault, Michel, 1972,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 Gallimard.
(林志明譯, 1998, 《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
-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Édition
Gallimard.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
北：桂冠)。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余碧平譯, 2002, 《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Wang Zheng, 2005,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 (3): 519-551.
- 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 1965, 《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4,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作編譯局, 197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辦公廳, 1965, 《中共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
社。
-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 1988, 《中國婦女運動文獻匯編(1949-1983)》(第二
冊)。北京：中國婦聯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 1981,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
198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 1999,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 吳志軍，2006，〈試論 1957 年冬 1958 年春農田水利建設運動〉，《北京黨史》(1)：12-15。
- 吳超，2013，《社會主義勞動地倫理意涵》。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吳綿吉，1988，〈惠安婦女長住娘家習俗述議〉，《東南文化》(2)：131-134。
- 李小江，2000，〈50 年，我們走到了哪裡？—中國婦女解放與發展歷程回顧〉，《浙江學刊》(1)：59-65。
- 李巧寧，2004，〈1950 年代中國對農村婦女的社會動員〉，《社會科學家》(6)：146-148。
- 李麗敏，2000，《惠安女子教育的歷史、現狀與展望》。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汪民安編，2003，《身體的文化政治學》。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 汪煒偉，2009，《再塑造女性：惠安女性形象變遷研究（1949-1966）》。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汪憶今、王順興，1962，《萬女鎖蛟龍》。泉州：惠女水庫管理局（2007 年整理出版）。
- 周冰、付伶俐，2012，〈苦難回憶與情感動員—大躍進時期文藝文本織構技巧探析〉，《名作欣賞》26：48-51。
- 林惠祥，1962，〈論長住娘家風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過渡〉，《廈門大學學報》(4)：24-44。
- 邱國盛，2009，〈20 世紀 50 年代上海的婦女解放與參加集體生產〉，《當代中國史研究》16(1)：70-77。
- 姜鍵、姜蘭，2001，〈婦女解放的現代詮釋〉，《社會科學戰線》(5)：266-269。
- 段學敏，2013，《惠女水庫工程的女性主義批判》。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 范子謙，2015，《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陝甘寧邊區婦女身體與形象的塑造》。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夏杏珍，2012，〈新中國歷史上兩次群眾詩歌運動—「大躍進民歌」和「天安門民歌」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56-64。
- 孫月冬，2002，〈試論中國前 30 年婦女運動地失誤與教訓〉，《淄博師專學報》18(1)：28-30。
- 恩格斯，1991，《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
- 祝勇，2008，《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高小賢，2005，〈銀花賽：20 世紀 50 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4)：153-171。

- 張志永，2010，〈錯位的解放：大躍進時期華北農村參加生產運動評述〉，《江西社會科學》(4)：151-156。
- 張靜如編，1997，《中國共產黨通志》(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莊笑娘，1993，《惠安婦聯志》。泉州：惠安縣婦女聯合會印。
- 郭志超，1997，〈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稽考：惠東文化之謎試解〉，《廈門大學學報》(3)：109-114。
- 陳正人，1958，〈進一步發揮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偉大作用〉，《新華半月刊》(23)：28-29。
- 陳明珠，2006，《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 陳國強，1989，〈福建惠安崇武的衣飾與族屬試探〉，《廈門大學學報》(2)：125-131。
- 陳國強，1990，《崇武人類學調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國華，1999，《惠女的奧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陳雅萍，2011，〈解放與規訓——殖民現代性、認同政治、台灣早期現代舞中的女性身體〉，《戲劇學刊》(14)：7-40。
- 傅惠玲，2008，《20世紀20-30年代的惠安地方軍事化與鄉村社會——以民團互動為討論中心》。廈門大學碩士論文。
- 惠女水庫管理局編，2009，《惠女水庫 巾幗豐碑》。泉州：惠女水庫管理局。
- 惠安縣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1998，《惠安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揭愛花，2012，《國家、組織與婦女：中國婦女解放實踐的運作機制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曾文法，蔡思成，1992，《惠安縣水利電力志》。泉州：惠安縣水利電力局。
- 湯耐爾，2014，《解放的困境：大躍進時期上海婦女和國家建設》。復旦大學碩士論文。
- 程淼淼，2015，《近代婦女身體解放進程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黃金麟，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社。
- 黃金麟，2005，《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社。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台北：聯經出版社。

- 
- 黃曉華，2005，《身體的解放與規訓——中國現代文學身體意識論》。武漢大學博士論文。
- 楊大春，1995，《傅柯》。台北：生智出版社。
- 楊詳銀，2004，《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齊福、汪煒偉，2009，〈民國時期惠安女集體自殺現象〉，《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7)：90-96。
- 楊齊福、汪煒偉，2011，〈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設運動中的女性〉，《婦女研究論叢》(3)：70-82。
- 葛玲，2014，〈大躍進水利個運動與糧食短缺——以皖西北臨泉縣河網化運動為例〉，《黨史研究與教學》(6)：12-20。
- 葛紅兵、宋耕，2005，《身體政治》。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
-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1948，《福建統計年鑑》(1947年版)。福州：福建省政府秘書公報室。
- 劉維芳，2008，〈中國婦女運動「大躍進」始末〉，《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5)：103-108。
- 蔣炳釗，1989，〈惠安地區長住娘家婚俗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3)：193-203。
- 蔣炳釗，1998，〈惠東女是否是少數民族〉，《福建學刊》，(5)：66-70。
- 曉亮，1959，〈勞動競賽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學術月刊》(4)：1-7。
- 藍達居，1995，〈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惠東人文研究〉，《廈門大學學報》(4)：19-24。
- 藍達居，1997，〈歷史傳承與族群互動——福建惠東女現象試析〉，《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47-50。

附錄一 口述紀錄提綱



一、2017年2月口述紀錄提綱

(一) 基本狀況

1. 姓名、年齡？
2. 家庭狀況、身體狀況？
3. 當時參與到水庫工程時的年齡？家庭狀況如何？
4. 當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普通民工？領導幹部？

(二) 工程概況

1. 都參加過哪些地點，哪些部分的勞動？
2. 為什麼要叫「惠女」水庫？
3. 後來水有引到村里？對於農業生產作用大？

(三) 工程勞動參與

1. 是如何被動員去參加的？自己報名？被安排？
2. 剛去習慣嗎？一去就開始勞動？
3. 當時住在哪？怎麼住？住宿條件如何？
4. 當時都吃什麼？能吃飽？
5. 當時穿什麼？衣服？鞋子？
6. 每天都做些什麼工作？
7. 當時有受傷？生病？
8. 勞動競賽的狀況如何？有沒有受到表彰？
9. 艱苦的時候，有沒有逃跑？逃跑後會被懲罰？
10. 圍水壩潰壩那天在那裡？從事什麼勞動？

(四) 工程感受

1. 對於這次勞動感受如何？前後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2. 政府後續的照顧和補貼？

3. 對於「惠女精神」的理解？
4. 以自身感受？這場工程建造後，覺得「婦女解放」了嗎？



二、2017年6月7日口述紀錄提綱

1. 你當時為什麼會想去修水庫？家人會同意你去這麼遠的地方修建水庫？上面領導是怎樣動員你的？
2. 如果是群眾大會，都有哪些形式的？大會上都講些什麼？哪一句讓你下定決心要去參加勞動？
3. 如果家人不同意，你是怎麼說服家人的？或者說領導（生產隊隊長之類）是怎麼說服家人的？
4. 後來條件那麼艱苦，你為什麼還要繼續去？

三、2017年6月12日口述紀錄提綱

（一）婦女主體

1. 為什麼去的都是婦女？村裡面都只剩下女的為主？那時候的男的都不在家還是？父親、兄長、弟弟都在哪？做什麼工作？
2. 傳統的家庭生活為何？是你期待的生活嗎？
3. 那時候，你是如何看待勞動的？勞動光榮？勞動是解救婦女的方法？

（二）受傷與斷經

1. 有受傷嗎（小傷、大傷）？受傷後是什麼心情？受傷後怎麼處理？會繼續勞動嗎？
2. 有斷經（月經）嗎？那時候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斷經會進行調養還是得繼續拉動？

（三）競賽與逃跑

1. 是怎麼進行競賽的？競賽中，為什麼會那麼有幹勁？
2. 有沒有不想勞動，或者在勞動中偷懶的狀況？偷懶會被發現？

3. 那時候，有想要逃跑嗎？
4. 後來，(1959/5/1) 開始有工資（每天 7 毛錢）以後，是選擇回家，還是繼續留下？原因是什麼？
5. 最後是怎麼回來的？家裡人要求回來？工程完成回來？



四、2017 年 7 月 15 日口述紀錄提綱

(一) 斷經與管理

1. 經期、孕期、產後、哺乳期繼續上工的人多嗎？月經期間很痛可以請假嗎？上面有什麼規定嗎？
2. 作為領導遇見這種狀況怎麼辦？有沒有經期還執意參加競賽之類？

(二) 身體與國家

1. 很苦很累的時候會想逃跑嗎？會怨恨國家嗎？
2. 怎麼看到國家讓大家到這裡勞動的作法？會覺得是國家在強迫身體勞動嗎？還是覺得國家在促進廣大惠安婦女解放？
3. 你覺得那個時候，自己的身體是一個什麼樣的身體？痛苦、愉悅？身體痛苦，精神愉悅？你會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身體？

(三) 婦女解放

1. 那時候，精神上的感受如何？覺得解放？
2. 那時候在工地會講婦女解放？怎麼講？以你自身來講，你覺得有解放嗎？為什麼？怎麼樣的解放？

附錄二 田野的聲音：重新審視惠安女

張和婷



前言

作為一名惠安出生的新世代女性，理解惠安女，實質是理解自我的一部分。哥哥的這一次「工程惠安女」論文研究，為我理解這個婦女群體，理解我的祖母，我的母親開啟了一道窗。從 2013 年的《烏潭記憶》紀錄片拍攝，到 2017 年的田野調查，我參與了這個研究的整個田野調查過程，希望我以女性角度的觀察與口述紀錄能夠為這本論文的撰寫帶來幫助。在研究過程中，哥哥也發現他作為一個男性研究者，在「女性田野」，特別是女性生理方面進行口述紀錄的侷限。於是到了 2017 年 6 月、7 月的三次補充田野調查，由我自己來進行，當然這三次的調查，給我帶來非常大的震撼，讓我重新審視了「惠安女」這個女性群體，接下來我想談談我的幾點感受。

印象落差：惠女精神的背後？

田野中，給我的第一個感受就是對「惠安女」認知上的落差。在我還沒接觸到惠女水庫工程的時候，對於惠安女的印象，是停留在一個勤勞能幹的形象宣傳上，知道惠女勤勞能幹，卻不知道她們是怎樣的勤勞能幹，都做過些什麼事情？知道小岞、崇武的惠安女有著獨特的衣著風格，以為只有穿著惠女服侍的惠安女才是電視上所說的惠安女。而事實上，晚近以「服飾」進行區分的認知，讓整個「惠安女」群體的範圍變得相對狹隘，整個惠東半島的其他女性，只是因為服飾風格的不顯著而被忽略。

我第一次接觸到惠女水庫是在大一，那時候正好跟著哥哥在做一個關於惠女水庫的小型紀錄片。不過對它的瞭解同樣還只停留在一個表層的狀態，並沒有深入接觸。直到後面參與了論文地田野調查，獨立完成了後續的幾次補充口述紀錄後，才開始瞭解到這個工程的背後是一個什麼樣的婦女群體在支撐在努力。並且，通過和當時參與修建的惠安女阿嬤們互動談話，真切的接觸到當時惠女水庫發生的一些人、事、物。開始知道，惠安女的勤勞能幹是一種什麼樣的勤勞能幹，以及如今我們整個縣的惠女精神是如何積澱形成的。惠女水庫，是年輕時的惠女阿嬤們用一把把鋤頭扁擔，一個個簸箕推車，在堅持和忍耐中堆出來的，她們把最好的時光留在了修建水庫這件事上。



艱苦歲月：精神和身體的矛盾？

口述紀錄過程中，可以發現惠女阿嬤們的回憶中有一個共同的發聲點，就是「非常艱苦」、「非常歹命」。然而，這種「艱苦」不是說不情願、被逼迫的精神艱苦，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體艱苦和環境艱苦，艱苦的食宿條件，艱苦的勞作條件。「身體上所遭遇的艱苦」與「精神上的滿足」，呈現一種矛盾的鬥爭狀態，身體儘管受傷，儘管被限制在工地勞動，但是她們在精神上卻是滿足，甚至是驕傲。

而提及惠女工程時期的女性身體遭遇，除了吃不飽、挨餓，除了受傷、生病，作為一個女性來講，對我震撼最大的是田野中惠女婆婆們關於「經期」這一段的描述，這是哥哥在這次田野中的一個限制，自然也成為我的田野調查重點。但並不是說，對我就完全沒有限制，只能是說我作為一個女性，相對來說，限制沒有這麼多。因為一開始聽到要幫忙問經期這一部分的時候，我自己也是覺得有些難為情的，畢竟問的對象是一群七八十歲的奶奶輩們，怕會無意間冒犯和增添她們的負擔和尷尬。但是後面發現，這些擔憂大多是手中月鏡中花，比起尷尬，這些在經期所經歷的遭遇更讓她們印象深刻並且願意傾吐，還能清晰的描述到，來經期當天所經歷的事情以及當時的感受。雖說講到這一部分的時候聲調明顯降低了，但語氣是凝重的。「孩子啊，以前不比現在。」這樣類似的描述我聽了不下三遍，這是一種發自內心最真實的感嘆，是我以前不比現在，這也是身處在現在的我們無法理解與想象的。

經期是女性較為敏感脆弱的一個時期，而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下進行的高強度工作，甚至是用破衣服破褲解決經期的到來，超出了身在 21 世紀的我們的接受範圍，再加上痛經和閉經，其中任何一個，對於一個女性的身體影響都是一輩子的，這種傷害是工程在廣大惠安女的身體上烙下的深深痕跡。

身體遭遇：婦女解放？

全國解放之初，大談婦女解放？到底是解放了什麼？我是疑惑的，這是一種綁架式的口號宣傳還是實實在在的身心解放？「不敢請假」「不敢休息」「不敢說」「很多逃跑的」「軍事化集體化」這樣的描述在我看來不是解放，聽起來更象是一種勞動力的壓榨和剝削，自由都沒有了，何來解放一說。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感染，利用一個時代環境的迫切性去催生一種時代的使命感，讓這些惠女阿嬤們在精神層面的表述上相當的一致，「惠女水

庫是惠安人要吃水的」「是要造福子孫後代的」「勞動是光榮的」「為勞動犧牲也是光榮的」，從這些阿嬤的話語中，感受到的是她們的正向力量，至少是在對待惠女水庫這個存在，不管是自願報名的人還是從眾跟隨的人。封建舊束縛綁住了婦女的雙腳，惠女水庫是把綁在婦女腳上的繩結打開了，卻用另外一種方法重新綁上了。因此，在我看來，這種解放更象是一種精神宣揚式的被動式解放，而不是從惠安女自我意識上的解放，也不是身體上的解放。然而，惠安阿嬤們身上所表現的這種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惠安女：成為怎樣的我？

「閩南地區的婦女是不是地位都很低？」、「聽說吃飯都不能上桌是不是真的？」、「要一直做事是不是？」，這是來自非閩南地區對於惠安女以及她們所處的閩南環境的理解，普遍認為閩南地區的婦女地位偏低，需要長期從事家庭勞動。從我自身的經歷上來看，這正是在惠安，女性從小被強調和建構。「查某人（女人）就應該是怎樣？要怎樣？」，這是對我和哥哥們最不同的建構。作為一名惠安女性，我們所處的社會，所處的家庭環境在不斷地塑造著我們。而不同的家庭環境也在折射出不一樣的女性成長，比如對待勤勞的方式，對待讀書的與否等等。

「惠安女是不是很適合當老婆啊，聽說很能做家務？」、「要勤勞，不勤勞會嫁不出去」，「娶個老婆做家務」，這樣的擇偶方式在閩南一帶的部分地區仍為常態，說明了一直以來婦女解放在惠安地區的侷限。以做家務能力為標準去衡量一個女性是否具備良好婚配的條件，這是對惠安女勤勞品質的一種狹隘理解，勤勞的方式並不只有「做家務」這一種，「勤勞」≥「做家務」，這種把女性阻擋在家門以內的勤勞方式只能是在某個程度上阻擋女性的視野。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然而當一個人長期只接觸到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這種選擇相當於別無選擇。「女孩子讀那麼多書乾嘛，趕緊找個好人家嫁了吧」、「女孩子讀再多書，最後不都還是要嫁人」，「重婚嫁，輕讀書」，這樣的女子讀書無用論至今尚存，甚至是被認可。

種種的歷史與現實的社會原因形成了對閩南地區一種深深的刻板印象雖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希望看到的是，人們對新時期下的閩南地區以及惠安女有一種同樣新的理解。惠安女勤勞能幹的精神質量並不能成為惠安女必須辛勤勞作的理由。過分的惠女精神解讀反倒是一種精神壓迫，每個人，都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個體而不應是群體式捆綁，要取其精，去其粕，又不失個人特色。